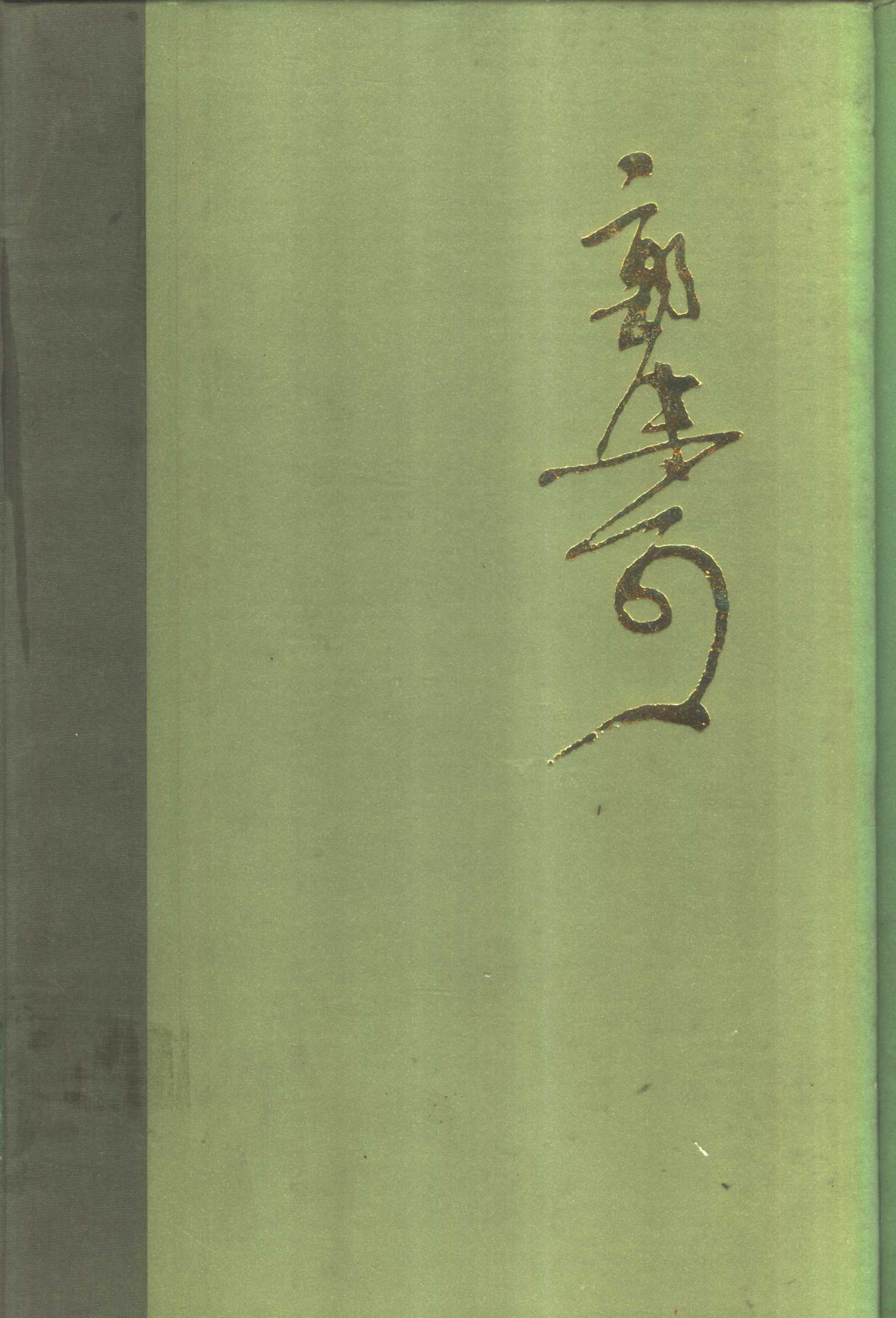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一卷

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

我的童年　黑　猫

反正前后　初出夔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一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 $\frac{1}{2}$ 插页5
字数218,000 印数1－3,500
199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432-1 Z·70
定价 10.75 元

四川省嘉定府官立中學堂　為

給發修業文憑事照得本學堂現居甲三班第二學年第四學期考試完畢學生郭開貞本學期總平均分數列入優等相應給發修業文憑須至文憑者

學科	分數	學科	分數	學科	分數
修身	三十五	經學	九十六	國文	五十五
英語	九十八	歷史	八十七	地理	九十二
算術	一百	幾何	八十五	植物	七十八
生理	九十八	圖畫	三十五	體操	八十五

總計分數九百十四分　平均分數七十九分

臨時考試平均分數八十一分

總平均分數七十八分五

本學生現年十六歲係　樂山縣人

曾祖賢琳祖明德父朝沛

右給學生郭開貞

監督秦昌緒

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　日給

第拾壹號

一九〇九年在嘉定府中学堂就学时的修业文凭



一九一二年与乐山小学同学的合影，左起：吴尚之、作者、陈衡浦（？）、张其济（伯安）、李茂根



一九一二年与四川高等分设中学堂同学摄于成都

（二排左一为张其济、左二为作者）

第十一卷说明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

《我的童年》写于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发行，题为《我的幼年》；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幼年时代》，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一九四二年八月以《童年时代》为名，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反正前后》写于一九二九年，同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一九三一年名为《划时代的转变》，由上海现代书局改版印行。

《黑猫》写于一九二九年，最初收入一九三〇年九月上海仙岛书店出版的《黑猫与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一年八月香港强华书局以《我的结婚》为题刊行。

《初出夔门》写于一九三五年，最初收入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不二书店出版的《豕蹄》。

以上四集于一九四七年四月辑为《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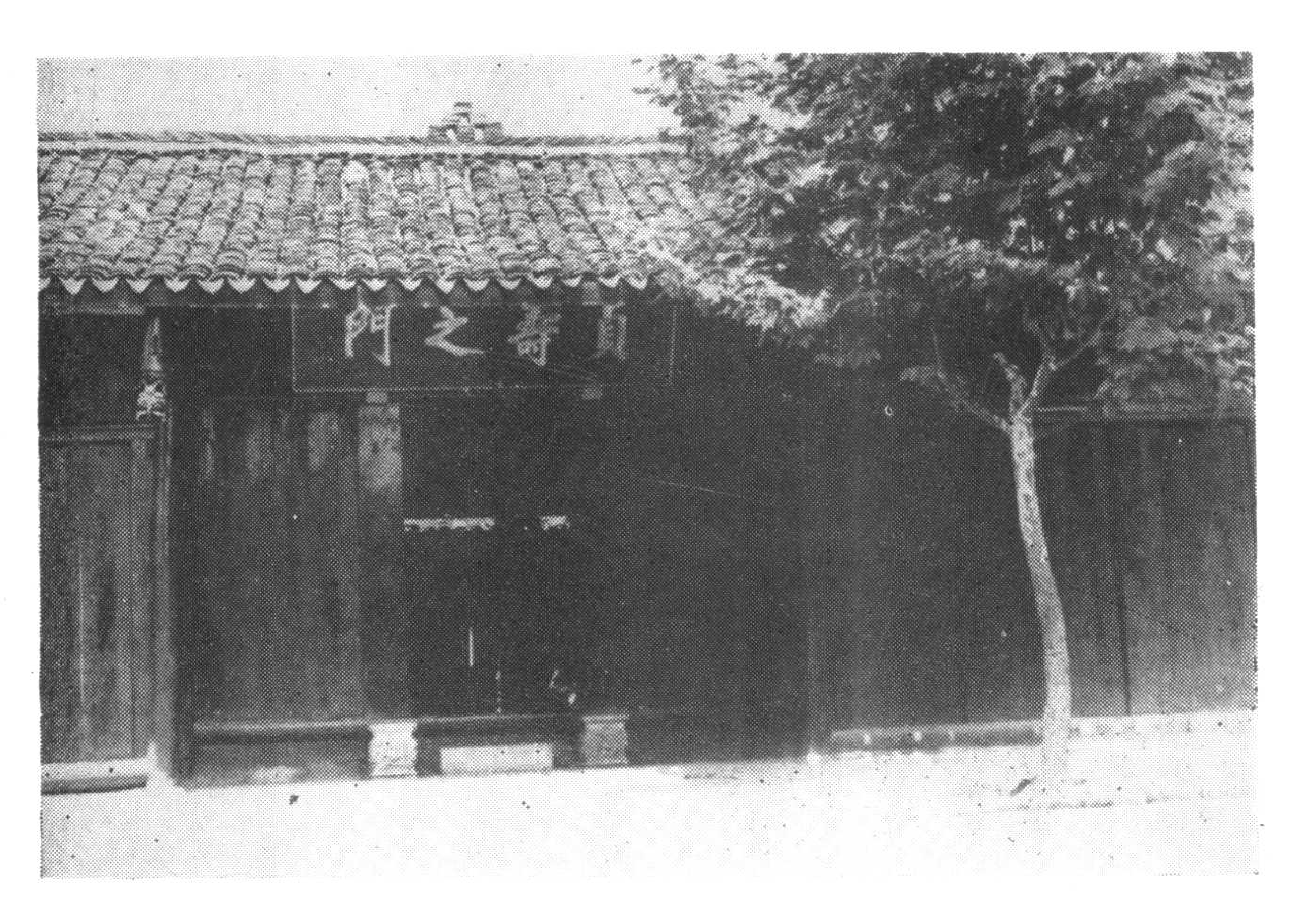
本卷据一九五八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六卷版本编入，并根据各集初版本及其它版本作了校勘，重大改动处加注说明。



作者的父亲郭朝沛



作者的母亲杜邀贞



座落在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

第十一卷目录

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

序……………………………………………………………… 3
我的童年……………………………………………………… 5
反正前后…………………………………………………… 161
黑猫 ……………………………………………………… 277
初出夔门…………………………………………………… 317

少年时代

沫若自传·第一卷

序

这里所收集的是民国二年以前我自己的生活记录，是把《我的童年》(一九二八)、《反正前后》(一九二九)、《初出夔门》(一九三六)几种合并在一道的。写的期间不同，笔调上多少不大一致，有时也有些重复的地方，但在内容上是蝉联着的，写的动机也依然一贯，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

中国社会的蜕变是过了时的，这使我们这些出水的蜻蜓，要脱皮真是艰难。象我自己脱了五十多年，一直都还没有脱干净。难保不会僵绝在芦梗上？

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假使我们自己做了些阻碍进化的路，害了下一代的少年人，那倒是真正应该忏悔的事。自己扪着良心自问，似乎还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不过假使我真的做了，那我恐怕也不会忏悔了。

自己也没有什么天才。大体上是一个中等的资质，并不怎么聪明，也并不怎么愚蠢，只是时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平常人四处碰壁。我自己颇感觉着也就象大渡河里面的水一样，一直是在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地流着。

但我丝毫也不失望。无意识的时代过去了，让它也成为觉醒意识的资料吧。觉醒着的人应该睁开眼睛走路，睁开眼睛为比自己年轻的人们领路。

郭沫若 1947年3月13日

我的童年

（1892—1909）

前　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阬底挖出土来。
我不是想学 Augustine① 和 Rousseau② 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 Goethe 和 Tolstoy③ 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28年12月12日

① 作者原注：奥古斯丁（353—430），非洲迦太基人，中世纪哲学家，著有《忏悔录》、《神国》等书。

② 作者原注：卢骚（1712—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著有《民约论》、《忏悔录》等书。

③ 作者原注：歌德和托尔斯泰。〔歌德（J. W.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著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及自传《诗与真》等。　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及自传性作品《童年·少年·青年》等。——注释者〕

第一篇

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① 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

① 据《乐山县志》卷十一明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嘉定旧称海棠香国"。

"绥山毓秀，沫水锺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①，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②。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③。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象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

---

① 据《乐山县志》卷十二，一七八六年（农历丙午）大渡河泛滥；一八四六年（农历丙午）岷江大水，嘉定受灾。当地人称前者为"老丙午"。

② 一名福安寺。

③ 安磐，字公石，又字松溪，号颐山，四川嘉定（今乐山）人。明弘治进士。正德时任吏、兵二科给事中。嘉靖年间，因"大礼之议"触犯世宗，受廷杖并除职为民。死后万历初追赠太常少卿。著有《颐山诗话》、《易扁》等。安磐福安寺碑已残，碑文载《乐山县志》卷三。

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象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被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被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

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①。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象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

① 明清科举制度乡试每三年进行一科，遇有朝廷庆典，常破例加考，称为恩科。据《乐山县志·选举志》，清光绪庚子年恩赐举人为陈希贤。

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他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阬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阬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复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

河，更好象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

事情发生了以后开了好多粮子①到我们街上来，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的热闹。但在我们小人们以为热闹好玩的时候，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他们便要剿灭我们沙湾场，说沙湾场一场的人都是窝匪。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

全街的绅粮们不知道告了多少饶（恐怕还送了不少的“程仪”），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许专抄杨三和尚的家。杨三和尚的家是在场上，就在我们住家的斜对面。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许了专抄杨三和尚的家，但他们的头脑真是聪明，他们要叫差人点起火来，就来烧毁那杨家的房子。这和烧毁全场有什么区别呢？栉比着的街房中无论怎样有灵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烧毁一家？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顶戴。他们朝衣朝冠的屡次求情，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毁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一般的人说，这是青天大老爷们的无量恩德，同时不用说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铜顶子的光耀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周折，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杨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说是壮观了。堂皇的一列三间一连三进的房子，连拆带烧整整费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边上，好象火烧连营八百里一样连烧了二十几

① 作者原注：当时称兵为粮子。

大堆。我们小人们不消说很愉快，老人们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高谈他们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他们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门一步的女人们、四乡附近的农夫们，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热闹。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羼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揽生意。那简直就象五月间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们乡里人说：五月里王爷菩萨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萨大约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祇。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①，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们的天颜，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满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②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

---

① 作者原注：乡里人说幸灾乐祸为"看肖神"；大约是十二肖神和人的祸福很有关系的原故。

② 张献忠（1606—1646），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崇祯三年起义，几度率义军进入四川，崇祯十七年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

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象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璁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象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甚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象《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么时候，死在甚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产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甚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①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① 作者原注：乡中土匪绑票用的专语，男为财神，幼为童子，女为观音。

我的父亲[1]在年青时候采办过云土[2] 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甚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甚么地方送来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3]。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

① 即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
② 作者原注：云南出产的鸦片烟。
③ 阳历为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①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②。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③，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④，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

---

① 即杜邀贞（1857—1932）。

② 指长兄郭开文（1878—1936），字橙坞，号成武；次兄郭开佐（1888—1963），号翊新；长姐郭秀贞（1881—1952）；次姐郭麟贞（1884—1951）。

③ 据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杜邀贞“以咸丰丁巳七年九月，生于贵州开州城内公寓，长于四川乐山安谷乡响水滩”。

④ 即杜琢章（1814？—1857），号宝田，四川嘉定人。清咸丰二年恩科三甲进士，历任贵州龙泉知县、广顺知州、修文知县，后调任黄平州知州。

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①，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②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象是云南人③）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④

---

① 据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杜邀贞嫡母为谢氏，生母为史氏。

② 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以及《乐山县志·人物志》和《乐山县志·烈女传》亦有记述，细节略有不同。

③ 据郭开文等撰写的《先妣事略》："刘媪本黔人"。

④ 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总之我母亲是与忧患俱来的人，从小时候起便受着灾难；听说我们川南现在是讨赤最力之乡，大约因为我一人的关系，恐怕又已经'赤化'了九族罢？管他妈的！牙齿总有要牙齿偿还的时候！"该书出版后，上海国民党检查机关以此段及《后话》中最后两句"词句不妥"为由，将本书查禁。一九三三年上海光华书局将这两处文字删去，并附"声明"于正文前："本书原名《我的幼年》，前以上海特别市党部命令指出本书二十页内一段及后话内之最后二句词句不妥，暂停发行，兹本局特将以上二处删去，并改名为《幼年时代》，特此声明。"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甚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象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象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

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儿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①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②，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③。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甚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④，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有，但不见效的

① 即郭贤琳，字玉楼。

② 指郭贤惠。

③ 作者原注：长年工人的意思。

④ 作者原注：放在自由空气里面的意思。

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贯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甚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甚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展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

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①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象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②，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③，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青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甚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时候，好象甚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象甚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

① 即郭明德，字秀山。

② 即郭朝瀚，字怀璞。

③ 即郭朝瀛，字仙舟。

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性成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① 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② 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三

我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我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兄弟之间遭忌的重大原因。他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大的

---

① 即郭开运（1895—1971），号翊昌。

② 即郭朝沂，字慎封。

私房的积蓄。但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记忆可以证明是冤屈。

这已经是我十岁时候的后话了。闹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终竟分析了，但又并不是彻底的分析。我们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没有分，有可以进现钱的五六口盐井没有分，有好几家租出去的铺面和糟房没有分。盐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执掌，田地、房廊归三伯父掌管。我们就仅仅得了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析议成定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言的苦闷了半天。我们人口又多，那时我们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读书，用度又很不小。这当然是使我父亲苦闷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母亲和我和我的兄弟两人，把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打开，把我们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们逢年过节赏给小人们的赏钱，多则百文，少则五文，都是用草纸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层红纸的——一封一封地取出来。有些红纸都已经翻黄了，我们把它一一地解开来，总共算凑积成了三十几串钱。这要说是我们的私房，我们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但就只这一点的积蓄也成了父亲的再起的资本。

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逼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竟不能不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几串现钱，另外又在我们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族曾祖那里借来了二百两马蹄银来做资本，重新又过起年青时候所过着的生活来。但是，实在也奇怪，不几年间我们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父

亲时常对我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但我恐怕应该说是：吗啡有眼，酒精有灵罢？因为我们父亲的营业，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国全国的人无论有产无产都只好吸烟吃酒来麻醉自己的，更透辟地说一句：是应该感谢帝国主义者的恩德！

我这样说也不是有心要诽谤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处在那样的社会，处在那样的时代，他当然不能生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意识。但父亲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流害，他早已把这行营业中断了。

父亲的天分好象是很卓绝的。他早年失学，关于学问上的问题当然说不上来。但他实际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无师自通的中医，一方面得着别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象很有坚决的自信。关于算术上的加减乘除，我们用笔算，他用珠算，我们总快不过他。后来因为我在外国学医，他来信笑过我，说是学医何苦要跑到千万里外的外国去。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阴郁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满脸的愁容。他因早年过劳和中年失意的关系，心身两方都好象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他的神经系统我恐怕有时是有点反常罢？在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两件往事。

是父亲年青的时候。有一次年关看看快要到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带收了账回到嘉定城，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在城里也了结了一些残务，大概是午后二三点钟的时

候。想留在城里过夜，时间未免过早。但要动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的。走黑路是他年青时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踌躇了一下也就决定动身回家。但走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酆都庙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来了。

酆都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那儿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儿有一座奉着酆都天子的酆都庙，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时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扫墓，我们有走过酆都庙的时候。那庙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鸡脚神无常。那个地方在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中真正就象是酆都①一样。

父亲走到了酆都庙了，天上虽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胧地有点月光。纵横离家只有十五里路了，所以他依然放下决心走路。

他走到离家十里的鞋儿石了。这儿是一座颓废了的关口，地位是在一个颇崄峻的斜坡上，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河水在冬季枯涸的时候，关下是要露出一片很远的沙碛的。

父亲走上鞋儿石了。头上有微微的丝雨，朦胧的月光。他忽然听见在远远的沙地上有奇怪的叫声，据父亲说，那是鬼叫。

父亲说："我听见那鬼叫的声音在那远远的河边上。我的毛根子撑了几撑。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说：这鬼朋友可怜我一个人走路太孤独了，公然来陪伴我来了。

"吓，真是稀奇！待我说口没落脚，那鬼的叫声突然到我

---

① 作者原注：旧俗相传为阴界、冥府。

脚边上来叫了！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耸然起来。我车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见甚么，那声音又往远远的河边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脚根子上来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边去叫了。就这样每走三步，它总要叫唤一声，但也并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来，任随它跟着我叫。

"就这样，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陈大溪（这儿离家只有五里路远），我自己不免着起急来。我想，它跟着我走倒不要紧，万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里作起怪来怎样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头又想：它既是那样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来，它也可以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样办。我说：朋友，多谢你送了我一程。我现在快要到家，你也请回去安息罢。

"吓，奇怪，真是奇怪！"这依然是父亲自己的话，"我就这样说了两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叫唤了三声！——但是，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叫了。"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而且不仅说过一次。那样严格的父亲，他当然不会向我们儿辈撒谎的。小时候我为这个问题很费解：我们当然不信有鬼，但是父亲却亲自听见鬼叫。

还有一件是在我们九叔母死了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做头七还是二七①，那时候是要烧冥钱的。同时也要烧"车夫"，是在黄纸上印着的车夫，准备把冥钱运往阴间的苦力。

① 旧俗人死后每七日祭亡灵一次，称为"做七"，至七七四十九日为止。

七的法事已经做过，冥钱已经烧了，我们小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父母的居室是与九叔的居室对称的，中间夹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婶的棺材。

父亲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九婶的居室门口有异样的叫声。那儿是放着烧了冥钱的铁锅的。父亲很诧异。他点起灯出来一照，但又甚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起初怕是甚么老鼠在叫了，"父亲说，"但我转身回到房里，刚好要脱衣裳的时候，那怪声气又叫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奇怪。我又点亮出去一照，但那声音又没有了。就这样往返到第三次，那声音又叫起来，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来问他。我问他听见甚么声音没有？他说他睡模糊了没有听见。我问他，烧冥钱的时候车夫忘没忘记烧？他也答应得不明确。后来我们便四处寻找，果然在外边的酒缸上有一卷车夫原封原样的放着。我说，啊哈，这真难怪得了！赶快把车夫来烧了。之后，那声音也就停止了。"

这也是父亲亲自对我说过的，而且也不仅说过一次。这更使儿童的脑筋得不出答案来了。在这儿不惟有鬼，而且还有阴间。做贿赂的冥钱既有效力，车夫也和现世的苦力一样。天地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而是父亲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口说出的。

但这些在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的。很明显，是我们父亲有一时性的精神上的异状。两种都是幻觉，特别是幻听的一种。

前一件事情的解释是他的精神已经很疲劳了，夜间走到

酆都庙那种富有超现实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胧的月，这在乡里人的迷信上认为是出鬼的时候。有这几种原因尽足以构成鬼叫的幻听了。父亲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种“呼之使来，唤之使去”的把戏，结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向外边的投射罢了。

第二件的解释也是同样。父亲当时的身心状态是怎样，我现在不十分明了。我想大概也是因为甚么事情疲劳了罢。那没有烧的车夫，他在无心之间一定是早已看见过的。只因为忙于他事，没有提到意识界上来。但到夜深人静时，潜意识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么一番的周折。

父亲是有这样一时性的幻觉的，照他那异常苦闷、异常严格的风貌看来，或许还有点轻度的 Epilepsie① 罢？但是原因是怎样，我却不甚知道。

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们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她有一个白皙的三角形面孔，前头部非常的发达，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她自己本身没有异状，但她异母的兄弟姊妹们里面却是很鲜明的有精神病的患者。

我所知道得最详细的是她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舅。他这人的确是患了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他年青时听说是很聪隽的，八股也做得很出色当行，挂过水牌②几

① 作者原注：癫痫症。

② 用于暂时记事写后可用水擦去的粉漆木牌。这里指官府在水牌上公布准予应考人的姓名。

次，但几次都没有进学。就因为他有一种怪脾气，总爱冒犯场规。譬如他把文章做好之后，自己太得意了，提起笔便圈点起来。这在当年的考场中是极端犯禁的。又譬如他默写“圣谕”或“四子书”①，一默写总是任性写一长篇，超过了所要求的限度之外。就这样，不怕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和主考者时有夤缘，但终把他超拔不起。他这毛病后来简直成为永住性的了。

在我小时，他一年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一两次。他来的动机总是为了要点生活费。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们母亲把杜家的祖坟山上的风水一个人占尽了，所以只发我们这一家。因而我们家里的钱，他也可以来要求点余润。

他的面貌和我母亲差不多，只身材是极端的矮小。他一天到晚都在念《金刚咒》，走路是非常迂缓的，走不两步便把眼睛闭起，捧起佛来，口中念念有辞：

金刚金刚弥陀弥陀，
四轮四乘四大天王，
八轮八乘八大金刚，
勅勅如律令哑哑呸。

我们小时候觉得他非常滑稽，时而跟着他学，但他也不责备我们。我揣想，他的眼前怕时常有甚么鬼神的幻影出现罢？他相信那样简单莫名其妙的咒语有辟邪的魔力。

---

① “圣谕”，指清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颁布的用以“化民成俗”的十六条上谕，每条七字，共一百一十二字。　“四子书”，四书之别称，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他很会谈鬼，小时候晚上放了课总爱去请他说鬼。他的资料多半是取于《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① 等笔记。他说起鬼来都很有条理，很有兴会的。我们听的人不消说也很有兴会，尽管是听得毛骨竦然，但总要无餍足地找他说鬼。

这种神经系统上的缺陷或者是由舅氏的母系传来的罢，因为在异母妹的我们母亲身上却没有这样的痕迹。我们的兄弟姊妹八人也没有甚么异常的状态。

母亲的资质很聪明，不怕她幼时就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有一首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②

这是一首唐诗，我始终能够记忆的，但我总没有机会去考查这诗的作者和题名。——其实这并不是好稀罕的诗，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亲手很巧，很会绣花。她总是自画自绣。乡里人很夸赞她。但她画的荷花上，荷叶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们后来笑她，她说："我是全凭一个人想出来的，那比你们有甚么画谱、画帖呢。"

母亲的性格当然也是自负心很强的。

---

① 《子不语》，清袁枚著；《阅微草堂笔记》，清纪昀著。均为笔记小说集。

② 唐韦承庆作，题《南行别弟》，见《全唐诗》卷四十六。

家庭中的长辈，除父母而外，影响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时候，祖父母已经过了世。伯叔辈有他们的僻见，虽然同居，和我很少发生关系。家中还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岁才死了的。她和我相处的日子很浅。多少有点关系的要算她的百岁坊的建立罢。

她的百岁坊建立的时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坊表立在乡场的北端，刚刚成为了沙湾场的门户。那建筑工事的本身，有许多文字和雕塑的装饰，这或者在我后来的文艺的倾向上有点潜在的作用。

工事的开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没有。最初是去浮土，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一层一层的用大石、细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充实起来。再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砖砌成一座很高、很庄严的华表。

坊上用的砖是自已烧的。特别在远处请来了有名的匠人，砖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这当然最能使我们小孩子喜悦了。烧砖的地方可惜是在离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过那塑像怎样构造，在做小孩子的当时真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家里的规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许一个人走出离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简直就和我们现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样的困难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来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临河的崖岸刻着有许多佛像，虽然并没有上千，但也有好几十个。小时候并没有考查过那是甚么时候凿就的，可供考证的资料除佛像的本身外甚么也没有，没有碑铭，

也没有寺院。这些东西在古时应该有的，但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是连痕迹也没有了。佛像已经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经过了很久的风化，有的面目已很模糊，有的更连影子都没有，只剩着一个空的石龛了。这或许是唐代的旧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凿成大佛岩的影响，有甚么苦行的大师到那儿去驻锡①，才在壁上刻出来做纪念罢？这当然是我一人在这儿发出的空想，但要真正决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实也并不困难，由佛像的样式可以考出，由地层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会实现以后的考古学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儿又有许多匠人在砖上塑像。我小时是怎样的想去参观哟，但我们家里不许可。我们当时的家塾生活，不消说也是没有星期的。

四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儿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

① 锡，僧人行路时所用的锡杖。驻锡，意为住留。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甚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象弹词，但又不十分象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

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象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象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象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

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扑作教刑"①，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片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

① 语见《书·舜典》。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

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象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们家塾里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难受。单跪土地还不要紧，先生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把一条板凳来顶在你的头上，家里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还有牙齿，那真是又重又痛。但这还不够的时候，先生还叫你顶水。在板凳的两端一头放一碗满满的水，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颈子，长跪着动也不准一动的。动了一下，水如戾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惨受“笋子炒肉”的非刑了。

从前的做官的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他们一做起官来便在百姓的头上报仇。他们的严刑峻法不消说是“青出于蓝”的了。当然，象我们这样超过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种教育的应用我们也用不着太说远了，就在上海的所谓文明都市，就在我们自己的目前，不是还有铁锯分尸、钉板抓背、硫酸灌头、电流刺脑，各种各样新发明的花样吗？……

在家塾里所受过的非刑中，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种更残酷的便是"诗的刑罚"。这东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发蒙两三年之后，先生便要教我作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已经是够受的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甚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甚么音律对仗呢？但是做不出也还是要叫你做，做到后来，公然要做试帖诗①了。甚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鹭'得'飞'字"之类的诗题。你看，这是不是就和巫师画的神符一样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时候，这样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为在温室的栽培里，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开花。但我们所受的不仅不是温室教育，尽可以说是冰窖教育。就是应时也怕开不出花来，那里还能早期呢？那种痛苦，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复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甚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

这就是所谓"诗刑"。这"诗刑"怕足足受了两三年的光景，

---

① 作者原注：唐朝以来科举的诗，多以古人的诗句命题，前面加"赋得"二字。这种诗或五言七言，或八韵六韵，谓之"试帖"。

这是怎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呢？不过在为受这“诗刑”的准备上我也算得到过一点好处。

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读诗不消说就是为的是做诗的准备了。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些虽然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甚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还不能说是十分的安全。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这或许是后来的感情也说不定。

五

庚子之变，资本帝国主义的狂涛冲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国的万里长城。在一两年前还视变法为罪大恶极的清廷，也不能不企图依照资本社会的模型来改造自己的国度了。

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在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这是必然发生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消说便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家塾教育的方法上来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

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谢的，便是我还没有受过八股的刑具。甚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头上来的，我在几希一发之间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样地应该向着甚么人道谢的呀！向着甚么人呢？——向着帝国主义者罢。

帝国主义的恶浪不消说是早冲到了我们那样偏僻的乡间。譬如洋烟的上瘾、洋缎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实在已不计其数。不过使我们明白地认识了那种变革，就是我们小孩子也意识到了的，是无过于读"洋书"了。

真正的"洋书"不消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读的资格。我们除圣经贤传之外，开始读了一部《地球韵言》①，一部《史鉴节要》②。这两部在当时是绝好的启蒙书籍，是用四言的韵语写成，对于我们当时的儿童真是无上的天启。

一直到癸卯年实行废科举而建学校的时候，这个变革才一直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闱过后，不久就有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③在省城里产生了出来。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五哥进了武备。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象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

---

① 清张士瀛著，世界地理启蒙读物。

② 全名《史鉴节要便读》，清鲍东里辑，中国历史启蒙读物。

③ 高等学堂，一九〇五年开办，今四川大学前身。 东文学堂，一九〇四年开办，主修日语，一九〇六年并入游学预备学堂。 武备学堂，一九〇三年开办，一九〇六年停办。

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① 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这些书籍里面，《启蒙画报》一种对于我尤有莫大的影响。这书好象是上海出版的，是甚么人编辑的我已经忘记了。二十四开的书型，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异常浅显，每句之下空一字，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每段记事都有插画，是一种简单的线画，我用纸摹着它画了许多下来，贴在我睡的床头墙壁上，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

书中的记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仑、毕士麦的简单的传记②。小时候崇拜他们两个人真是可以说到了极点。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③，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毕士麦没有拿破仑那样动人，但是我很高兴他爱狗。我家里也有三条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着它们相随，自己也就象成了东方毕士麦一样。

---

① 《启蒙画报》，一九〇二年创刊于北京，初为月刊，次年改为半月刊。《经国美谈》，日本驻清大臣矢野文雄著，中译者雨尘子。　《新小说》，文艺月刊，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后改在上海出版，一九〇六年停刊，共出二十四期，梁启超主编。　《浙江潮》，综合性月刊，一九〇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共出十二期，后两期只见广告。孙翼中等主编。

②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仑第一，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这篇传记，题为《法帝拿破仑逸事》，在《启蒙画报》第二年内连载。　毕士麦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chönhausen, 1815—1898)，通译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③ 约塞芬(M.R.Josphine, 1763—1814)，通译约瑟芬，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第一称帝时立为皇后，一八〇九年被废。

还有一篇《猪仔记》①。这是一篇小说体裁的文字，叙述外国人虐待中国工人。内容我现在不大记忆了，好象叙的是一位不学好的青年把家财荡尽了，被人骗去做了猪仔，卖到美国的甚么地方去开垦。沿途不消说受了无数的辛酸，卖作农奴之后，在外国人的监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艰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钱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钱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剥削去的。地主有种种恶毒的制度、圈套来束缚工人。譬如让他们赌钱吃烟，使他们永远是穷到一钱不名，做终身的奴隶。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无限的虐待，已经弄得来三分不象人，四分不象鬼了，自已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农场里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视察。这位留学生原来就是那猪仔的老同学，两人无心相遇。学生虽已不认识猪仔，猪仔却还认得学生。到这儿学生才把他赎回了中国。

内容大概是这样。这里虽然充分地包含着劝善惩恶、唤醒民族性的意思，但从那所叙述的是工人生活，对于榨取阶级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点上看来，它可以说是中国无产文艺的鼻祖。

这文章从资料的性质上看大约是留美学生做的罢？处理材料的态度也很象受了一些美国作家Jack London②的影响，但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书中也好象是没有姓名的。同样性质的文章我在中国的近代的文学里很少看见。中国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学生渡美，美国留学生中也有一些文

① 在《启蒙画报》第二年内连载。

② 作者原注：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

学青年，中国工人的生活好象全不值他们一顾的样子。中国先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也不少，但没有看见过有一篇描写工场生活的文章。

这部《启蒙画报》的编述，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念着它。近来中国也出了一些儿童杂志一类的刊物，但我总觉得太无趣味了，一点也引不起读者的精神。或者我现在已经不是儿童，在儿童们看来或许又有别样一种意见罢。以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办好，可惜中国人太不留意了。

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脩身、国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算数学》①，是甚么教会学堂出版的东西，我们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来教我们。我们从加减乘除一直也就学到开方了。那书所用的亚剌伯数字都是楷书，我们运算时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亚剌伯数字来运算，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

促成这样的变革的自然是时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们那种偏僻的乡陬，在周围邻近乃至县府城中都还不十分注意的时候，我们独能开风气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过来，这儿却不能不说是人力了。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

① 美国狄考文著，中译者邹立文，上海益智书局出版。

过人的地方。象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峻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但他能以尖锐的角度转变过来，他以后便再没有用刑具来打过我们了。在当时我们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①。两者的文章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发明。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我以后也好象又聪明了一些，先生隐隐地在把我当成得意门生看待。

助成了我们家塾革命的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大哥，郭橙坞。他是十三岁便进了学的人，天资当然是很不弱的。不过他几次秋闱都没有及第，在最后一科失败之后，他突然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成都是一省的都会，接受外来的影响自然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响直接传达到我们乡里来。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我们的妹子和侄女②也都跟着沈先生读

---

① 全名《东莱左氏博议》，宋吕祖谦著。

② 作者有两个妹妹，三个侄女。两个妹妹是：郭蕙贞（1897—1938），字馥芸；郭葆贞（1899—1970），字畹秋。三个侄女是郭开文的三个女儿：郭琦（1897—1985），原名凤鸾，号珩媖；郭瑜（1898—1960），原名孔鸾，号嫘婢，曾任峨眉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郭琴轩，原名翠鸾，号琼娟，一九〇〇年生。

起书来。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乡里的蒙学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

蒙学堂的先生姓刘，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开办的师范养成所的第一批学生。他也是很热心，很能忠于职守的一个人。由他的一来，我们乡里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们的沈先生只有这一点他没有采办，但他叫我们去参加了刘先生的"洋操"。那时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集拢来参观。

那时候叫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奇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可不知道它们究竟是那一洋。这个秘密在现在的我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办学的当时，请来的日本教习特别多(其中连日本的皮匠师傅都聘请来了)，聘金特别的贵，就象这样骗小孩子的体操都用日本教习来教，连那样基本的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办学人的外行，也可见中国人的办事草率了。但尽管那样，我们倒是感觉着很浓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时候已经考上了东文学堂，在那儿学习一年便要送往东洋去留学，所以他只有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东文学堂的教习不消说重要的都是东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回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

到了我们家里。东洋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萨”；一个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耙烂”。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当然也不懂。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萨约那罗”①。

使我惊异的是这两位东洋人非常的吝啬。他们有一个宾铁罐子，大概装过饼干的，上面有些油画，我欢喜它。有一天我们同他们一同往韩王庙去钓鱼，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装鱼。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话，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拿这个罐子去装鱼，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两位东洋人照样的说了那一句话。不知道是我学舌学得太不象，还是我大哥仅学了半年的日本话还没有升堂，那样的一句话完全没有打响。我简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给他们放还原处去了。

但是要说他们完全没有听懂我所学说的那句话吧，好象也不见得。晚上回来了，在灯下吃了晚饭。我大哥在陪着他们谈话，我也坐在那儿旁听。他们有时候又说到了我身上来，我以我的直觉晓得他们说的是我刚才学舌的那回事。我看他们的一个，就是那“佛菩萨”，指着茶碗说“Chawan”(查汪)，指着椅子说“Isu”(以死)，除此以外，便加拉加拉的，我就弄不清楚了。后来大哥回到父亲房里的时候，他谈起这件事情。他说，那东洋人的意思是说他教我说那样长的一句话不大好，教

---

① 作者原注：日语“我”、“你”、“谢谢”、“再会”的音译。

小孩子学日本话最好取那发音相近的来教；就譬如茶碗和椅子之类云云。这样我自然可以懂了。但我们大哥说，他也佩服那两位东洋人，一个空的罐子就把给小孩子做玩具也并不破费的，但他们却吝啬着没有给我。他很失悔教我去说了那一句话。

东洋人吝啬不仅这一点。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好几天，我们也很有礼貌的款待了他们。他们回到成都以后，隔了好久给我们送了四本日俄战争的画报来。这使我们父亲也佩服着他们的慷慨了。

不过东洋人的一来也为我们乡下开通了不少的风气，最显著的是我们父亲从那时候起便开始吃生鸡蛋了。这在以前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放年假的时候，大哥也回来了。他那时候已经毕了业，在明年的正月里便要出洋留学了。由他的宣传号召，同县中跟他同去有十几个人。他的意思很想要我同去，但父母不肯。为这件事情也很争执了一回，但总没有成功。我自己后来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是跟着我大哥同出了东洋，我一生的路径当然又不同，或者已经是成了一位纯粹的科学家罢？未曾实现过的事体，当然是徒费想象，但至少我这以后的生活是应该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的。

就在那第二年的正月元旦，我那时和我的父母是同寝室的，我很早的便起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还在“挖窖”①。大哥也

① 作者原注：我们乡里的习惯元旦是要迟起的，俗间叫作“挖窖”，就是挖金窖的意思。

起的很早，他走进房来了，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和我两个谈话。

——“八弟，”他问我，“你是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喜欢出东洋？”

我说：“我当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想学甚么呢？”

我却答应不出来：因为我当时实在不知道应该学甚么，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么好学。他代我答应道：

——“还是学实业的好，学实业罢。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

其实实业的概念是怎样，我当时是很模糊；就是我们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罢。不过富国强兵这几个字是很响亮的，那时候讲富国强兵，就等于现在说打倒帝国主义一样。我当时记起了我们沙湾蒙学堂门口的门联也是“储材兴学、富国强兵”八个字。

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放脚问题来了。大哥又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

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

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

——“混账东西！”

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

——“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

这真是晴天里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

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

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两个时代。单是对于“野蛮”两个字的解释，轻重之间便有天渊的悬殊。

除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人，我在这儿还要费几行文字来叙述。大哥年青时分性格也很浪漫的。他喜欢做诗，刻图章，讲究写字，也学过画画。他有一部《海上名人画稿》和一部《芥子园画谱》①，这是我小时候当成儿童画报一样翻阅过的。

《名人画稿》是工笔画。那里面有一幅公孙大娘舞剑器图，这和我在唐诗上读过的《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相印证，使我非常爱好。又有一幅美人图，是在一簇芭蕉之中画着半堵圆窗，一位美人掩着半边立在那圆窗里面。②书是连史纸石印的，当然没有着色，但那题的诗句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这真真是富于暗示的题句了。这红的一点不消说我可以想得到是那美人嘴上的樱桃。

大哥写的是一手苏字，他有不少的苏字帖，这也是使我和书法接近了的机会。我们在家塾里写的是董其昌的《灵飞经》③，还有那俗不可耐的甚么王状元的文昌帝君阴骘文。《灵飞经》还可以忍耐，但总是一种正工正楷的书法，令人感觉着

---

① 《海上名人画稿》，一作《海上名家画稿》，清张熊等九人的画册。《芥子园画谱》，一作《芥子园画传》，清王槩兄弟编绘。

② 此二图为清沈心海绘。《公孙大娘舞剑器行》为杜甫诗，原题《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③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书画家。《灵飞经》，道经名，唐锺绍京节录其文，书为小楷帖，此帖真迹曾为董其昌所得。

非常的拘束。但一和苏字接触起来，那种放漫的精神就和从工笔画移眼到南画① 一样了。

苏字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师都是写的苏字。这个倾向好象一直到现在都还支配着。这本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在这儿也表示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封建制度逐渐崩溃，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象古代那样的幽闲，生存竞争的巨浪也渐渐险恶起来了。所以一切的生活过程便必然地要趋向于简易化，敏捷化。苏字的不用中锋，连真带草，正合于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命运。

大哥的诗、书、画，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好象没有一样可以成家。他后来到日本也学的不是实业，结果是为时流所动学了法政回来。去年我脱险回武汉的时候，他自重庆写信慰问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惊叹时代的进行真如电火一样迅速了!

六

在我十岁前后，和外界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化一样，我身体的内部也起了剧烈的变化。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甚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

那最初的征候怕是在七八岁的时候罢？那时候我们的家

① 中国画画派之一。明董其昌等把中国画分为南北两派，以唐王维为南派之祖，并奉为正宗。

塾还在三伯父家的屋后。三伯家和我们不同居[1]，他的家在街面上，和我们相隔有两三家门面，但在后边是由一院空地相联系着的，在这空地上我们另外新建着一座学堂还没有完工。

三伯父的后院里面有一个花园，四围是有几笼竹林。峨眉山的山脉横亘在墙外。

有一天上午，读书读厌了，我借口向先生说要去小解——这是我们当时的唯一的偷懒手段。在家塾里读书是没有休息时间的，笔直笼统地要坐到把书读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已的大小便，是没有松一口气的机会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们的解放者，我们自然要尽量地来麻烦它们了。先生骂我们有一句口头话，便是"懒牛懒马屎尿多"。但是骂尽管是骂，多也未见得真多，而懒总尽管是要懒的。只要松得一口气，那时候真是达观，便是"呼我为牛便为牛，呼我为马便为马"了。

先生允许了出去小解，但并不往厕所里去，却走到园子里来。

时候是暮春天气，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园门口来，看见我们的一位堂嫂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下面。她在那儿了望。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子。带着乳糜色的空中，轻松的竹尾不断地在那儿动摇。堂嫂的两只手掌带着粉棠花的颜色。我在这时突然起了一种美的念头，我很想去扪触那位嫂子的那粉红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这个念头也不敢走去实现。

---

① 《沫若文集》第六卷此句作"三伯家和我们同居"，今据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改正。

这位堂嫂是和我们同居的，我们三哥（大伯父的长子）那时也在家塾里读书，三嫂当然也是感着春闺的寂寞，希望在这儿和三哥邂逅的罢？但她那知道我那时那样的一个孩子也起了一个怪异的念头。

我立在园门前踌躇了一下，我也没有惊动她，便又转回家塾里去了。

这个回忆我始终觉得是我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

但到后来实际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是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移徙到新的家塾里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虽然没有教我们的体操，但是听随我们自己学习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对，仅隔着一道篱栅。在篱栅的左端有一道石门，石门外边便是一带的田畴了。

校园中在石门的旁近有一株很大的桑树，那虽然并不是庭园性质的树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里人爱惜着没有斫伐它。

我们就在那石门和桑树之间安上一根坚硬的竹木，这便成为我们的铁杠了。倚在桑树上又竖了一根竹木，以备我们学习猿升式的攀援。

就是那竖的一根竹木坏了事。

猿升式的运动是以两手和两脚夹着竹杆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只用两手，我们最初学习当然是两手两脚的。竹木过粗，攀援的时候很费力气。攀上了顶了，总不免要用两脚

把竹杆紧紧地夹着，以防坠落，以便在上面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为在那上面休息得过久，竟很怪异地感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过后，异常的感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个苹果一样滑落下来。

就这样发觉了这种怪味之后，我便要时常来贪享这种快乐了。把竹杆当成了自己的爱人。

但是竹杆过高过大，未免太吃力了；后来在三伯父的园中又发现了一株还未十分长成的枇杷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两枝对称的横枝，刚好可以托手。枇杷树虽还稚嫩，但因木质坚实，也尽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于是乎这枇杷树又夺去了那竹杆的爱宠了。

就在这样的时候不凑巧的又发现了几种奇书。

自从大哥出了东洋，我在他的书橱里面发现了一部《西厢》，一部《西湖佳话》，还有一部《花月痕》。①

《西厢》是木板的小本，有些不甚鲜明的木板画。关于《西厢》的知识在各种机会看旧戏的时候，耳濡目染地一定得过了一些，但和真正的原书相接触的，这要算是第一次了。自己也晓得是小孩子不应该看的禁书，便白天托头痛把帐子放下了来偷看。那时候大约是暑天，因为先生已经回去了。

词调是不甚懂得的，但科白却容易看懂。因此，蛛丝马迹地也把前后线索可以看得明白。甚么“莺莺不语科”，“红娘云

---

① 《西厢》，即《西厢记》，元人杂剧，王实甫著。《西湖佳话》，一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短篇小说集，清古吴墨浪子辑。《花月痕》，长篇小说，清魏秀仁著。

小姐，去来，去来"，"莺莺行且止科"等等，很葱茏的暗示，真真是够受挑发了。到了那时候，指头儿自然又忙碌起来，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达到了它的第三段的进展。从此以后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连《西湖佳话》那样的书也含着了挑发性，《花月痕》那样的书，也含着了挑发性了。断桥情迹的幻影，苏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①弄得人似醉如痴了。

我偷看《西厢》，后来被我们大嫂发觉了，她去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把我责备了一场。但是责备有甚么裨益呢？已经开了闸的水总得要流泻到它的内外平静了的一天。这种生理上的变动实在是无可如何的，能够的时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刺激性的东西。儿童的读物当然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回想起来，怕我们发蒙当时天天所读的甚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负很重大的责任罢？

淫书倒不必一定限于小说，就是从前发蒙用的《三字经》也可以说是一本淫书。譬如说：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儆。

象这样好象是含着勉励的教训话，其实正是促进儿童早意识到性的差别。又如那些天经地义的圣人的典礼，甚么"男女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长幼不比肩"之类，这比红娘、

① 《断桥情迹》是《西湖佳话》中的一个短篇；苏小小是《西湖佳话》中《西泠韵迹》一篇的女主人公；秋痕是《花月痕》中的女主人公之一。

莺莺的“去来，去来”，所含的暗示不还要厉害吗？近来听说还有些大人先生们在提倡读经，愚而可悯的礼教大人们哟！你们为你们自己的儿女打算一下罢！

第二篇

一

一九〇五年科举废止了。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开办高等小学。

小学是设在城北的草堂寺的，还在建筑中便开始招考，招考的时期好象是九十月罢。

科举初停，一切都还是旧时的习惯，我们乡里有十几个人去投考，差不多各人的父兄都亲自送子弟入城，就象遇着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样。

我当时也是应考者的一个，我的父亲也亲自送我入城。我们一共包了三只船，一同驶下嘉定。

从大渡河下嘉定是一船下水，假使是在暑天水大的时候，只要三两个钟头的光景。是在小水天，那就要五六个钟头了。

我们从清早动身，坐到午后三点钟的时候，远远看见有座很高的塔隐隐约约地从水平线上耸立出来。塔影渐渐鲜明了，在那右边又可以看见一座。前一座是嘉定城内高标山附近的塔，后一座便是正对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上的塔了。嘉定城一带红墙的影子也渐渐地在大渡河的左岸现了出来。高耸着

的飞甍跃瓴的城楼，黑耸耸的森严的城门洞口，这在自然中长成的乡下人是第一次看见的。

我们同船的长辈向着我们说：

——“凡是初进城的人，进城的时候要向城门洞口作三个揖。”

这句话我们分明晓得是在开玩笑，但在心境里面总挟着几分怀疑，好象进城的时候真正是非作揖不可的一样。同时在他们长辈的心中，也怕同样地怀着了一种对于悲壮美的屈服罢？不然他们何以会拿作揖的话来向儿童们开玩笑呢？人力的伟大！这把城墙偶像化了。无论任何大小县城都有城隍庙供奉城隍老爷，这不和小儿要向城墙作揖的心理是一样的吗？——城墙的壮美是四川普遍的现象，出省以来这种观感便缺少发动了。北京城的城墙究竟不愧是首都的关系，那的确是很雄壮的建筑。

我下府城其实也不开始在这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到过一次杜家场——我母亲的娘家。那时候我还只有一个兄弟，他还在吃奶。我们去的时候不消说也怕是赶的下水船罢，但这个记忆我一点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我们走旱路的时候，母亲乘着肩舆，我们兄弟两人是一人坐一个箩兜被一人担着。在田土里面走过，看见青青的菜叶。那时候一定是秋天，我记得是摘过胡桃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太阳还有不小的力量，母亲把她的换洗衣裳来挂在扁挑的两端，一头笼着一件，就这样便刚好构成两个小小的圆锥形的天幕。我坐在这样的一个天幕里面觉得非常有趣，我时常从那衣缝的门

口掉头去望母亲或者看别的事物。我总这样好动，挑的人只是诉苦。

那时候的我，怕至多也只有四岁罢。那时候的确是到过嘉定的。

我们的大舅住在城里，住在他的大女家中，我们叫她是张大姐。她的家在做木炭生意，同时也在卖煤球。我们有一位哑子的白痴的大表兄就是她家中捏煤球的工人。他的头非常庞大，那显然是一种水脑(Hydrocephalus)。他的白痴的原因就是在这水脑的关系上面了。他虽然是白痴，但他非常地爱我们，他看见我们便带着一种很亲密的痴笑，口中只不住“啊啦，啊啦”。

母亲的异母的二姐嫁在珠市塘的张家，我们叫她是张二姨娘。二姨娘的家在城北的外城之内，已经带有几分乡村的风味。家的前面是一片草坪，听说那便是珠市塘了。草堂寺就在家后不远的地方，从那儿有一沟溪水向珠市塘流来。

右手是一片岩窟，在那时候住着一个年老的女丐，我觉得她好象那童话中的熊家婆一样，她好象是吃人的一个女魔。

张家门口悬着一道立匾，写的是“太仆寺卿第”的几个字。这太仆寺卿是怎样的官职，我到现在也莫名其妙。听说我们二姨爹的大哥是李鸿章① 的好朋友。他的二哥或是三哥好象做过江苏的巡抚，他们的家本是煊赫过一时的。但在我小时

①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末大臣，洋务派首领。

去的时候已经是颓败得不堪了。颓败了的原因便是一时死了那两位撑天的台柱。

那两位有势力的兄长一死，全家就象冰山一样溶解下来。二姨爹自已在家里起了一座私塾，靠教读糊口。他还有一位兄弟张十爷，这是很有名的一位疯子。我小时看见过他在大暑天穿着皮袍，拿着一柄光框子的团扇，有时又戴着一副光框子的眼镜。他的病症的确是一种躁性狂(Mania)，但他狂的原因是怎样，我可不甚明白。他这狂病不消说也遗传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名叫张杰，仅仅小我一岁的光景，我们后来是在小学里同过学的。

——“张杰，张杰，你有胆量吃沙么?”

——“怎么不敢。”他说着便在操场上杓把沙来，接接连连地吞进肚里。

我们嘲笑他：“你这人真蠢！那好不卫生！”

他还扬扬得意地说：“昔时蚩尤，兄弟九人，铜头铁臂，以沙为食。夫蚩尤以沙为食，乃臂可铁而头可铜，何不卫生之有?”

他总是这样的调门。他有一回吃屎，别人笑他，他又要举出越王勾践尝粪的典故了。他的文字颇清通，也证明他的脑髓并未完全失掉作用，不过有时发作起来便莫名其妙。后来终竟退了学，更好象是跳岩死了的。

这位发狂的老表还算是我们二姨爹的子侄中的好的一个。还有几个我不认识，他们终年在外面浪荡，把钱用完了便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东西偷完了又下板壁，下屋顶上的

瓦。到我们后来快要离开嘉定城的时候，二姨爹家里的中堂已经只剩下几根梁柱了。

那回我和母亲进城的时候，便住在这珠市塘的二姨娘的家里。这儿的确是比张大姐的家要舒展得多。

我记得那时候草堂寺正在唱戏。有一位张狗儿，他是在二姨爹家里走动的，大约是他们族上的人。他背起我去看过戏。戏场里的人很多，背在背上也看不见台上的戏文，他便把我跨在他的项上。

戏台上右边的台口上坐着一位戴野鸡翎子的女人，正在临镜梳妆。一位年青的公子在她的左手边偷看她，渐渐移到她的背后；那女子大吃一惊掉头回顾，那当然是因为镜子里面现出了一位男子的影子了。女子一掉头，男子又赶快躲藏了。就这样一隐一显地往复了好几次。台上的乐器也就时抑时扬地帮助这种动作的律吕。

这是川戏《游金河》的一个场面。——这不消说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戏的情节我现在也记不的确了，约略是一位贵家的公子在金河弄舟，舟复落水，被神人引到龙宫，与龙王公主配合成亲的故事。那场面便是与龙王公主初次见面时的光景了。奇妙的是这场光景在幼儿的脑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忆。

我们住在二姨娘家里，那张大姐说起了闲话来，在第三天晚上母亲生了气，便临夜赶回杜家场去。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隔着了那条大渡河。从城北到东门乘船，势必要穿城而过。我们母子三人同坐在一乘轿子里。母亲在轿门外插了三

灶香，一面走，一面唤我们的名字：

——“八儿，讶出回来哟！元儿，讶出回来哟！”……就这样返复地呼唤着我们，这是怕我们的魂魄在黑暗中被甚么鬼魔骇出了躯壳，所以不断地在替我们招魂。这是我们乡下人的一种迷信。这种迷信好象是有世界性的，我们假如读过德国诗人歌德的《魔王》(«Erlkönig»)的时候，我们一定便要生出一个联想。一位骑在马上的父亲怀抱着一个幼儿在夜中走路，魔王来诱惑幼儿，幼儿看见了那魔王的尾巴，听见了那魔王说话。父亲几次替他排解。但等他走到自己的中庭，幼儿已经死在怀里了。

母亲一面叫着我们，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不消说我是没有看见魔王的尾巴，也没有听见魔王说话，不过在那黑洞洞的轿中站着，时而又穿过两面都是封火砖墙的阴晦的窄巷，也觉有些阴气逼人。

象这些事体——《熊家婆》的女丐，《游金河》的场面，赶夜路时母亲的招魂，封火砖墙的阴森，——虽然很模糊，可确确实实是留在记忆里的。那凌云山上的塔，高标山上的塔，赭红色的城墙，黑魃魃的城门洞口，应该是在幼儿的眼里显现过的东西，但不知怎的关于这些易惹注意的物象却偏偏一点记忆也没有。

我就这样在一九〇五年进城的时候，就象第一次才看见了这些事物的一样，起了一种很大的惊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时的惊异怕也不过如是吧。

——我现在想起《熊家婆》的故事来了，那大约是在二姨

娘家里听得来的。那的确是德国的Grimm① 童话里面的《红帽子》(«Rotkäppchen»)的古语。红帽子姑娘的母亲叫红帽子姑娘送点心和葡萄酒到林子里的家婆家去，在路上遇见了一匹老熊② 诱惑她去采花。老熊先跑到家婆家里去把家婆吃了，那老熊把家婆的衣裳穿起，装起家婆来，这便是所谓熊家婆了。等那红帽子姑娘跑到时，她又被熊家婆吃了。——我所隐约记得的熊家婆的故事好象就在这儿截止。但在德文原文上还有一段后文。狼把红帽子和家婆吞了之后，便在床上睡熟了，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夫走过，发现了它，用剪刀把狼的肚腹剪开，红帽子和家婆又活了转来。红帽子还赶快去运一个大石头来装在狼的肚腹里面。等狼醒来，要走也走不动，终被压死了。

《熊家婆》的故事我相信一定是从这《红帽子》转化过来的。二姨娘家里人早在江苏一带往来，这种外国的童话，或者由英文的翻译，或者由德国的原文，很有可能由他们输入到了我们嘉定。但可惜我的记忆并不甚强，终竟只记得一点模糊的影子。

二

考试的规矩差不多完全和旧时的科举一样。因为科举初

① 作者原注：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童话作家。〔即格林兄弟：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注释者〕

② 作者原注：德文原文是狼。

停，而且小学毕业的资格在当时是秀才，所以有不少的年老的童生投考，年在三四十岁以上的都有。

考的地方就是从前的考棚——这在后来改成了嘉定中学校。差不多有一两千学生拥集在考棚的仪门前应考。点名。点了名进去是左右两列很长很大的敞廊，夹着一个很宽很大的草地。敞廊里面横设着一排一排的案桌和板凳。案桌是在两边的石板桩上放着一个长而厚的木板构成的，在最外面的一个石桩上编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① 的字号。

考题是一道国文题和几道数学，我老早就把卷缴了。抢食了场中的面包之后，和一些小学生们把考案移在一个石桩上，一人骑着一头，便一上一下地闹起轩轾戏② 来。

头场揭晓了，在将近两百名的考取生中我考的是第二十七名。在同乡的几个人中，我最年少，我也最占上列。父亲真是欢喜异常，就好象小考的时候我已经挂了水牌，立刻便可以成为秀才一样。

复试的情景也约略同样，结果我在正取九十名中考上了第十一名。别人很夸奖我。我父亲替我谦虚，其实他自己也是暗暗得意的。很阴郁的父亲平时不大肯笑，但在我考上了小学之后，他时常带着笑容。在城里带着我走了好几处亲戚人家。

我们那位疯癫识倒的大舅说：杜家的一门风水传到五姨娘（这是指我们母亲）那里去了。

---

① 语见梁周兴嗣《千字文》。后人借用这一千字的顺序作编号。

② 即跷跷板游戏。

我们的张二姨爹说：八老表和大老表一样，年少成名。

我自己真是不免有点肉麻，我不知道怎么会受他们那样的夸奖。

在我考试期中我们时常去游城内的高标山。山在城的西部，那和它的名字所指示的一样，实在是高标在一切之上。从那儿可以俯瞰城市，从那儿可以眺望四方的远景，从那儿可以看见嘉定城就象一个楔子一样，楔在两条河的中间。

一条是从我们的故乡流下来的大渡河，那在城的东面流过。

一条是从成都流下来的岷江的支派——府河（大约就是平羌江），在城的东北角上与大渡河汇合。

大渡河的流水是比较湍急的，府河便十分平缓。两河合流的地方就好象府河是被大渡河冲断了的一样。就在这合流处的北岸有一带浅山，那便是凌云九峰了。这把大渡河的水势障着，使两河合流后的河水不能不折向东流。

正当着大渡河口的凌云山的崖壁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石佛。那是唐朝时候一位海通和尚修的，很深很阔地把山崖凹陷了进去。这在当年大约是为减杀水势的原故罢？但就在那样功利的目的之下，竟凿就了那么一座伟大的佛身，作为永远的装饰。唐代封建文明的进步的确是可以惊人的。

石佛坐北向南，正整地和峨眉山觌面。峨眉山的山脉远远地横亘着，成为天然的屏障。

两河合流后的一段江水大约就名叫青衣江罢？明朝时候

有一位乡贤（他与王阳明[①]同时，是为谏刘瑾[②]受廷杖处死的，在高标山上有他的祠堂，好象姓彭，名字我不记忆了[③]），他有两首即景诗是：

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遥闻戒夜钟。
闲借竹床听梵放，月华初到第三峰。

这首怕就是在高标山上做的，在空气很清澄的时候，凌云山上大佛寺的暮鼓晨钟，不消说可以听见，就是木鱼的声音也隐隐地可以传来。

林竹斑斑日上迟，鸟啼花暝暮春时。
青衣不是苍梧野，却有峨眉望九嶷。

这首大约又是在凌云山上做的了。在凌云山上有这首诗的一个石碑，是倚立在大佛寺的门前的。这在从前听说被农人们运去做成了石桥，被王渔洋[④]发现了，又才收复了转来。

---

①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人。明哲学家。有《王文成公全书》。

② 刘瑾（？—1510），本姓谈，兴平（今属陕西）人。明武宗时宦官，镇压异己，恃宠擅权，后以谋反罪被处死。

③ 这位乡贤不姓彭，而是安磐。作者在《我的故乡——乐山》（载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羊城晚报》）中引用下文第二首诗时写明，诗的作者是“明末的诗人，嘉定人安磐”。高标山麓有四谏寺，祀明世宗时嘉定四贤——安磐、徐文华、彭汝实、程启充。

④ 王渔洋（1634—1711），名士祯，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清代诗人。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等。据王渔洋《蜀道驿程记》载，这两首诗是安磐《松溪四绝》中的二首。

这两首诗真可算道尽了嘉定城周围的那种氛围气。

嘉定城的确是有几分旧式的诗的趣味。王渔洋的《蜀道驿程记》上说："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① ——这可不是四川的嘉定人对于他的故乡的阿好语了。

考试过后，我们同到蒙学堂的刘先生的家里去，他也是送我们入城考试的一人。他的家就在凌云山的背后，我们便先上凌云山去游玩一回。

从迎春门出城走到府河边上，渡过河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篦子街。在街的东头就是登山的道口了。

临河的山道在岩壁的半腰作平缓的倾斜而上。山石是赭红色的，清洁的泉水在路畔的细涧中流泻。临河的一面有蓊郁的丛林，只能听见水声，看不见河面。依岩的一面都是岩壁。岩壁上有所谓"蛮洞"（其实是汉墓），有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壁，有一个周年不断的滴泉汇成一个小小的清池，池后向前倾斜的岩壁上面大书着一个"龙"字。——这或者就是苏东坡② 的诗上所说的"龙泓"罢？

苏东坡有一首诗好象就是在这凌云山上做的，我只东鳞西爪地记得几节是：

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

① 语出《乐山县志》卷十一明陈起龙《重修凌云寺记》："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云，古志之矣。"

② 即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有《苏东坡集》等。

虚台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①

苏东坡是在凌云山上读过书的人，就因为他那“载酒时作凌云游”的一句，岩壁上也有一处刻着“东坡先生载酒时游处”的九个字的②。

在这题壁的附近，约略在登山的半途上，那伟大的石佛的颇顶便从岩畔突兀了出来。

石佛的颇顶刻着螺髻，从山路可以跨到头上去，一头都是很滑的青苔。那头顶的面积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光景。

大佛的顶上古时原有佛阁，在明末时候被张献忠烧毁了。佛阁的遗址只在两旁的石壁上留着了几个笋头穴。佛身从前也是金身，过了露天生活几百年，现在是一身的杂草了。

佛的右手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走到半途，路便断了，这在古时怕就是走进佛阁的通路。由佛阁应该再有阶梯可以一直达到莲台的脚底的，那儿有一个小小的草坪。

大佛寺就在石佛的背后不远。更朝山上走，在那最高峰上便是苏东坡先生的读书楼了。此外还有甚么人的注易

① 此诗题为《送张嘉州》，全诗共十六句。

② 该处石刻为“苏东坡载酒时游处”八字。

洞①，有郭舍人的尔雅台②，一座凌云山尽足够骚人墨客们一日的游玩。

三

小学是在一九〇六年的春正开学的。

所有的学生都在堂里寄宿，我们从乡里进城便一直搬进学校。

这就草堂寺所改修的学校，我要算是前度刘郎。从前的戏台毁灭了，那儿成了学校的正门，和一带办事人的居室。戏台前面的广场成为操场，面着一片银白的细沙。左边是自修室，右边是寝室，正面的大殿便改成讲堂了。

学校的背后是一片荒山，同时也就是一片荒坟。建筑在那荒山上的外城便天然的成为了学校的后墙。学校左翼的尽头处有一道城门名叫得胜门，这是证明那外城在平定了一次内乱之后修的，听说修后还不很久，大约是李短鬏或者蓝大顺起事时的事罢。③

小学生活的第一学期，我虽然经过了性的觉醒，但还没

---

① 据《乐山县志》卷三、卷四：凌云山阴有"注易洞"，明州人安佑尝读《易》于此。又，凌云寺右侧，有宋州守吴秘"治易洞"。

② 郭舍人，汉武帝时人；尔雅台在凌云山旁乌尤山乌尤寺内，相传为郭舍人注《尔雅》处。

③ 一八五九年，李短鬏（李永和）、蓝大顺（蓝朝柱）、蓝二顺（蓝朝鼎）在家乡云南昭通结盟起义，翌年率部围嘉定未克。解围后，嘉定府加筑外城，自得胜门起，过嘉乐门、经涌泉门，至萧公嘴止。

有完全失尽我自己的儿童生活的天真。因为是过渡时代的学校，学生的年龄相隔很远，三十岁上下的成年要占过半数以上。我的年龄算是最幼的一起，体操的次序我是站在倒数第三的。

第一学期的课程，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入校不久，校长陈济民①先生便辞了职，他到离城三十里的流华溪公立小学校去当校长去了。他为甚么辞去官立去就私立，这儿当然有种种的暗潮存在；但这种暗潮的内幕，我们当时可无从知道了。

最令人害怕的是绰号名叫“老虎”的监学易曙辉②先生，他教了我们一些乡土志。这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门功课。他把嘉定城附近的名胜沿革很详细地教授了我们，同时还征引了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这虽然是一种变格的教法，但于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却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听他的功课是一种苦事。在一点钟之内，坐在凳上，他不许你动移一下。你要略略动移一下，他便要大发雷霆了。学校开办后，“扑作教刑”的古制虽然废了，但他依然还是要打人的。

他是一位副榜，从前教散馆的时候也就可怕得有名。他的“老虎”的绰号就是从那时候得来。但在我们小学生中又把它音变而为“老鼠”了。他的眼睛很近，根据“鼠目寸光”的成

---

① 陈济民，名润海，四川乐山人。清末举人。曾任四川省城法政学校教习，辛亥革命后，任乐山县议长。

② 易曙辉（炜）（1876—？），字晴窗，四川乐山人。清末副榜举人。曾任嘉定保路同志会副会长、《乐山县志》纂修。

语，我们又号他为“寸光先生”。但是事实上我们之怕他，实在比老鼠怕猫还要厉害。他的面色就象戏台上傅了粉的奸臣一样。两个皙白的面庞，一个大红的酒糟鼻，一副玳瑁圆框的近视眼镜。他一叫唤起来，真是有咆哮生风的虎威。

但就是这样一位可怕的先生，他不久又病了，一直到了暑假都没有回校。

结果只剩着两位先生。

一位是帅平均①。他是本县的廪生，是以本县的官费最初送出东洋的。他是那时候日本人特别替中国人办的骗钱学校宏文师范毕业的学生。他担任的教课是算术、音乐、体操、读经讲经。

他的算术真是可怜，除了照着钞本教了我们一些就象图画一样的罗马数字以外，他演起习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

他学的是甚么柔软体操，教了我们许多日本式的舞蹈的步法。

他的音乐最是自鸣得意的，他按会了风琴，教了我们好几首“吾党何日醒”的爱国歌。

这些便是他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学问，县里人费了不少的公费特别派遣人到日本去学习得来的一点成绩。帅先生已是中年，又没有甚么科学上的准备知识，当然也怪不得甚么，不过日本人惯会办学校来骗中国人的学费，这是公然的秘密。

---

① 帅平均（1865—1952），字镇华，四川乐山人。

帅先生的授课比较有趣味的还是他的读经讲经。第一学期中他整整地教了一篇《王制》，这是使我和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礼记》中的《王制》是钉饾不可卒读的，但他把它分成经、传、注、笺四项，以为经是仲尼的微言，传是孔门的大义，注笺是后儒的附说。就这样把它分拆开来，也就勉强可以寻出条理了。

帅先生说：这不是他的发明，是得自他的"吾师廖井研①"的传授。这"吾师廖井研"的五个字在一点钟里面他怕要说上一二十遍。因此他的绰号也就成为"巫师吊颈"，再反过来便成为"吊颈巫师"。廖井研就是四川井研县的廖季平先生了，他是清朝末年我们中国的一位有名的经学家。他是张之洞、王壬秋②的门下生，听说张之洞有些学说是剽窃他的。譬如《公》、《谷》、《左》③三传一家说便本是廖季平的创道。他的根据是公谷双声，羊梁叠韵，同为卜商的音变。《论语》孔子有"启予者商也"④的一句话，启予就是左丘。子夏丧子失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所以左丘明就是卜商。

廖先生的经学多半就是这种新异的创见。他以离经畔道

---

① 廖井研(1852—1932)，名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居士，四川井研人。近代经学家。著有《今古学考》、《古文考》等。

② 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末大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有《张文襄公全集》。　王壬秋(1833—1916)，名闿运，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曾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有《湘绮楼全集》。

③ 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④ 语出《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

的罪名两次由进士革成白丁。就在宣统年间清廷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还受过当时的四川提学使赵炳麟①的斥革，把他逐出成都学界，永远不准他回到成都。他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康有为②的《新学伪经考》，听说也是采取了他的意见。

廖先生大约现在也还健在罢？他的著作极多，他的弟子可以说普遍于四川。帅先生是他的一名高足。帅先生很尊敬他，在我们当时看来，觉得他就好象是一位教祖。

帅先生的功课就是这几门，但这几门是并不吃力的学问；就是应该很艰涩的经学也因为他的教材有趣，我是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的。

剩下的还有一位刘书林先生。他是成都附近的什邡县的人，也是一名廪生。他这人非常的温和，在小学校中能够和学生接近而且没有绰号的，就只有他一个。他担任的是历史、地理、作文。

就因为这样的原故，在第一学期中，我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场上玩耍。在操场上抛沙作戏，在操场上打兔子洞，在操场上翻筋斗。不到上灯，没有上自习室的时候。

除在操场里游戏之外，我们还有一件更专心的工作，便是毁坏偶像。学校本是寺院改修的，正殿和后殿依然存在，一些

---

① 赵炳麟，字竺垣，广西全州人。清末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宪政编查馆会办。

②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著有《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偶像都是垂下了帘幕的。在后殿的右手边有一座送子观音院，当中塑着三尊送子娘娘，下面塑着许多站像。观音院本是有木栏围着的，把木栏的柱子拔去一根便可以容一人进出。我们起初只是在院里作戏迷藏，或者爬上莲台去把送子娘娘头上顶着的红绫带子取下来。后来我们在偶像里面发现了一个秘密。

有一个站像，是一个裸体的男孩，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这帽子原来是可以揭下来的。我们把帽子给它揭下，在它的头顶上发现了一个小洞。原来那孩子的肚腹才是空的。把水从头上灌下去，水便从玉茎里流泻出来。这不消说就是从前的和尚对于祈求子息的人的一个骗钱的工具了。

这一个发现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我们开始推倒那些偶像，更向它们洒起尿来。后来经施主们提出抗议，更在木栏外筑了一道板壁，我们便无从进去了。

在第一学期中我有一个极好的朋友名叫吴尚之，他和我同年同月，只比我长得几天。他的身材比我矮小，看来就象我的弟弟一样。

他是城里人。他的家就在月儿塘的丁东街，在城内是很有名的地点。那是在文庙的附近。文庙前面有两叠半圆形的泮池，池畔是砌着红石栏干的。就因为这泮池的原故，在那文庙附近的区域就叫着月儿塘。在泮池前面不远有一眼异常清冽的井，井内流泉的滴落时常丁东有声，因此便名叫丁东井。那丁东街又是因为丁东井得名的。

尚之的性情很驯静，他的面貌、言语、行动，都带着一种驯静美。他的性格可以说和我是相反的，但我们却是非常亲密，比兄弟骨肉间的感情还要亲密。

我认识他是在入小学校以前，还是在考小学校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到高标山去，无意之间就走到县城隍庙的背后去了。

县城隍庙的后部是一所有名的蒙学校，那后面的敞场里有秋千，有铁架，有浪桥。有许多学生正在那儿游戏。

我立在高坡上看望他们。那时有一位很驯静白皙的少年从那草地走上坡来。他穿的是青洋缎的马褂，葱白竹布的长衫，我一眼看见他就好象接近了一个很清净的存在一样。他比如就象一个水晶石，隐隐含着有一段冷意，但这是很有含蓄的一种冷意。

我看见他，他也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彼比都没有招呼，不消说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姓名的。

这位驯静的少年就是尚之了。后来他对我说，我们的初次会面，他也和我一样，是留在记忆里的。那回他是由学校里回家。

因这样的一见倾心，我们不久便同了学，而且还同在一个自修室里。这不消说是很容易给我们一个亲密的机会。但我们是怎样亲密起的，我却一点也不能记忆了。

他喜欢研究地理，最爱画地图，而且画得非常精巧。他比我用功得多，白天是不大肯在操场里面闲耍的，毁坏偶像的玩意儿他也决不肯做，但他时常肯和我“奋飞”。——这是我和他

两人之中的一个暗语，我们在夜间上自修室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声“奋飞”，我们便先后偷出学堂门，在城内去游散一两点钟回来。没有假单是不得出学堂门的，但我们和那门口的张稽查串通了，我们答应他给他买些咸牛肉、豆腐干或者落花生回来下酒，他是不阻碍我们的。

我们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奋飞”。奋飞出去做些甚么呢？大概是吃酒的次数多了。

尚之家里也是卖酒的。在玉堂街小十字口上他们开了一家酒店。我们便在那儿附近买些白斩鸡来下酒。嘉定城的白斩鸡是最有名的，那是很简单的一种做法，把鸡在白水里囫煮，煮熟后切成肉片拌以海椒、酱油。就这样简单的烹调法，却是最可口的佳肴。做这种小生意的，在嘉定城里差不多处处都是。雪白的鸡片，鲜红的辣油海椒，浓黑的酱油，……这样写着都禁不住唾涎的津津分泌了。

礼拜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里人并且得以在家里过夜。休假的时候，我们总是时常在一道，登高标山，游凌云山，进西湖堂，城内城外尽有供我们游玩的地方。同一的地方，我们每次去游玩，也不会生出厌倦。

晚上他要回家，我也不得不回学堂了。我送他回到丁东街，他总又要回送我一程。我们在月儿塘那个空地里面，送来送去的，总要送好几次。

礼拜，我一早起来，便要跑出学校了。跑到甚么地方去呢？不是跑到玉堂街，便是跑到丁东街。找着尚之时，又是一天的游玩了。遇着下雨或者彼此有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便要

彼此感觉着痛苦，彼此都写起信来。等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你拿给我看，我拿给你看。

我们决裂的时候也有，并且是容易决裂的。到那时候便彼此不说话，这样地闷过一天或者两天，便又用纸条子写起信来互相责问。责问的结果大家把意思疏通了，便又豁然地好起来了。

这样的情景，我们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种同性恋爱的心理一样，但是我们的相爱确是比恋爱更严肃。在旁观者看见我们，也有不少的人疑我们有甚么关系的，在我们当时的那些卑劣的同学们当中，这种揣测怎么也是难免。

那时候的那些同学们，不知怎的，大概都是一种变态性欲者。面貌稍微端丽的人，他们都要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看你，他们都好象把你当成了女性的一样。一种不好的很普遍的习惯便是见了你咳嗽，这和一般下流人，见了年青的女子走过身时，向她咳嗽是一样的意义。

还有一种更下流而且在我们当时的同学中非常普遍的怪现象，便是“偷营”的事。这是在夜半深更乘着别人睡熟了要想去亵渎他的一种勾当。这在当时的小学生中稍有面首的差不多都人人自危。

我记得，那是在第一学期的暑期试验的时候了。有一位姓杨的同学，他有一天晚上约我半夜去唤醒他，他要起来温习功课。我照着他的约束去唤醒他的时候，他真可怜！在那样热的天气，我们差不多甚么都不盖的，他却是拥着很厚的棉被，在脚的一头而且还是用带子来捆了又捆的。他睡得很熟，

但一头都是汗珠。我看见这样的情景起初很奇异，但我立刻觉悟到他是在严防“偷营”的了。

就是吴尚之咧，在当时也有人向他起过异心的。那是在第二学期中的事了。有一天晚上已经点名进了寝室，在九点钟摇铃熄灯前的十五分钟里，我从一间寝室的窗外经过，窗内有几个人正在聚首商谈，谈的就是怎样去暗算尚之的事。

那时候我和尚之不知道又因甚么事情决裂了，我不好直接去告诉他，我便托了一位姓蔡的同学去和他说：叫他今晚上睡觉谨慎些。

不知道是传话的人传错了，还是尚之听错了，他竟疑我要去偷他的营，这把尚之气坏了，和我竟有两三个礼拜不谈话。

当我们恢复了交情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叫那位姓杨的小同学来叫我进他的自修室去。那时候他已经和我不同班，我们是不同自修室的了。他说：“你对于朋友很忠心，你很好，刚才你和你那几位同乡谈话，我派了侦探去听来。”

他派的侦探就是那小同学杨君了。

原来我的几个小同乡也疑我和尚之有甚么丑恶的关系。他们那天晚上在饮茶室里问我，我极端的否认，而且还责备了他们几句。

我和尚之是结拜成了兄弟的。这种结拜的风气在小学生中很盛行，但是交谊的笃挚却没有人赶得上我们。

我小时候的记性颇好，尚之也很不弱。

我记得是第一学期的学期试验的时候，刘先生讲的历史

是《十六国春秋》①。那一些胡人的名字，是非常难记的。

尚之和我藏在一间没有人的自修室里面。我们彼此拿着书本暗记。我们分十行一次，十行一次的竞争，结果是只读一两遍便两人都记得了。

在那一回他吐了一口血，这使我非常惊骇。我们那时候当然是一点医学常识也没有，满以为他是过劳把血累出来了的。我觉得非常地对不住他。但是尚之说：他时常有这样的毛病，不要紧。——照这样看来，他当然在年幼的时候，就是得着肺结核的险症的了。

在第一学期中的生活只是“玩耍”二字，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学期试验的成绩我竟占了第一名。这使全堂的人都出乎意外了。

天大的风潮激发了起来。

第一，我是贪耍的一个孩子，平时毫不用功，何以会有那样的成绩？

第二，我在家塾里是相当受了科学的洗礼来的，同学的老学生们当然无从知道。

第三，我的高列损伤了那些老学生们的尊严。

第四，学堂的校长辞了职，监学病了，只剩着很软弱的帅先生，很温和的刘先生。

老学生们爆发起来，他们竟不惜加我以无上的污名了。

当时我还未满十四岁。我有一个丰满而白皙的面孔，因

① 后魏崔鸿著，已佚。今传本为明屠乔孙、项琳据古籍汇编而成。

为发育好，身体很健康的原故，两颊上晕着红潮。还有我们家里的习惯和城里的风气不大协合的，我们那时候还有辫子，我们家里是要用红头绳缠的。这在平时也就常受城里的学生和老学生们揶揄的了。到风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残忍性便尽情地发泄了出来。

他们举出代表去包围帅先生，他们要查卷子。代表在教务长室和帅先生谈判的时候，一大群的人便围在窗外，大家你一声我一句的乱吼。

——“不公平！不公平！”

——“可惜我们的面孔不好看呀。……我们也去买根红头绳子来缠辫子罢！买点粉来打罢！……搽点胭脂罢！……”

起初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些甚么，我还走去看热闹。

一位姓徐的老学生，他那时候已经有三十二岁，一把捉住我的右手。他说了一声“你好呀！”捉着我总是不放。怕有十分钟的光景罢，我的手指都麻木起来了。好容易他把手放了，我的右手颈上显出一轮一轮的血痕，就象带了几副紫藤手镯一样。

榜也扯了，卷子也考查了。他们又找不出甚么不公平的证据出来。把那位帅先生从教务长室赶到校长室，从校长室赶到会客室，无论如何要他改榜。那帅先生逼得没法，也就只好扣了我几分分数。因为我在端午节请过一礼拜的节假回家。我被降到第三名，一般老学生方才把气平下去了。

四

——“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

受了侮辱的小学生暑假回到他的故乡，他所苦心惨淡地筹画的便是暑假后怎样去洗刷他的耻辱。

他晓得那些老学生们是很卑怯的，他们只是欺软怕硬。他的计策便决定了：暑假过后他要专门和他们所惧怕的先生们反抗，特别是那帅先生，那是他恨入骨髓的。

在他的意思以为那帅先生也是欺辱了他的一个。

端午节请假回家，原是学校准许了不扣分数的：因为城厢附近的人三天的节假中可以回家，而且平常的礼拜六和礼拜都是准许回家的。离城过远的人占不着这种便宜，所以才给了那种特典。但是那帅先生却被老学生们胁服了，终竟扣了我的分数。

扣分数是不要紧的，但那些老学生们所借口的不是说他徇私，不是还加了我一个不堪入耳的污辱吗？他不惟不惩戒他们，而且还屈服了；还岂不是自己承认是徇私，并且证明他们所妄加于我的污辱是事实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到下学期去总要报仇！

就这样我决定了报仇的方针，在暑假过后又进城上学。

第二学期的学堂比第一学期要算是大有起色了。

易先生当了校长，他的病也好了。

前任的校长陈济民先生也回到了学校里来，他专门担任国文。

这位陈先生是一位举人，他是再滑稽也不过的。但他的滑稽是包含得有针刺的滑稽，大家都有些怕他。

他是把包慎伯的《艺舟双楫》① 拿来作教材的。讲的是奇偶急徐、起承转合的文法。文法的引例是《尚书·尧典》，这可以说是非常的艰深，但是在他讲来却是津津有味。不过程度太浅、全然不感觉趣味的人也怕是有的。因为在他那样有趣味的钟点里，偏偏有人睡觉。象遇着这样的时候，那陈先生的滑稽性便要发挥出来了。

——"O-ho, O-ho! ② 去了，去了。"

他偏着头，斜着眼睛，用这样的腔调形容那打瞌睡的人。那打瞌睡的人不消说是把头垂着就象风中的向日葵一样，东偏西倒，前颠后拐的。

陈先生一形容着，满堂的人便要笑起来。那可怜的人还是笑不醒的时候，陈先生便要打开讲堂门连呼学堂的老杂役李华：

——"李华！李华！你赶快抬一架床来，给某某先生睡觉。"

满堂的人轰堂大笑起来。——象这样的轰堂大笑，原因不必是一样，在陈先生的教课时间里总要发作一两次。

陈先生教课非常亲切，他改国文每改一个字或者添一个

---

① 包慎伯（1775—1855），名世臣，安徽泾县人。清学者、书法理论家。著有《安吴四种》，《艺舟双楫》为其中第二种。

② 作者原注：鼾声：阿呼，阿呼！

字，他都要很详细地替你说出理由来。他是一个理想的小学教师。

他本是一位举人，他的专门学识是《大清律例》①，但关于这项，我们没有受过他的教益。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行了一次分班考试。因为嘉定府在第二年便要开办中学了，要在小学堂中预先抽一班人出来提前毕业。

分班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我考的第三。那是易先生出的题，易先生看的卷子。这回可没有人说闲话了。

分班的标准不消说就在这国文程度的高下，但是还有一个附带条件，而且可以说是重要的条件，便是年龄的大小。年龄大的人虽然文字不好都可以升入预备班，年龄小的人那就不免有些危险了。

那一次照易先生及其他先生们的意思要把我降到乙班的，是刘书林先生替我力争，才得保持在甲班里。事实上年龄虽比我稍长几天而体格却小过我的吴尚之，他虽然考的第七，但也降到乙班去了。

尚之降到乙班，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共通的痛苦。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学堂，但我们的生活势不能不渐就分离了。

自从分入甲班以后，我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叫张伯安②。他的左眼是瞎了的，一脸都是天花的斑痕。

---

① 清代法典，乾隆五年颁行。

② 张伯安(1892—？)，又名其济、泽安，四川乐山人。作者表兄弟，即杜邀贞二姊之子。曾任乐山教育局长。

他失了的一只眼睛听说就是出天花的原故。

他是一位数学的天才。在小学校的当时，凭着自己的力量，他已经通晓代数了。

他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和我差不多完全没有关系。在第二学期中，是怎么突然亲密起来的，我现在也不记得了。他是二姨爹族上的一位侄孙，我们最初的接近好象是在二姨爹的家里。

伯安比我要大一两岁的光景。他和尚之是同小学的，在前原是非常的亲密，但在学校的第一学期中，他们也因为甚么事情决裂了。他们绝了交半年，经我的调解，又才把他们的交谊恢复了起来。我们三人真真正正学起了桃园结拜的故事来了。我们的结义愈添愈多，由三人添成五人，由五人添成七人，在中学堂的时候竟添到二三十人①。有许多人，我现在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我同伯安交好之后，我们的聚合便集中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在高北门外。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江湖上掌码头的大爷，是很可以号召一两万人的。就因为这样喜欢交游的原故，他们的家业非常空虚。不久他的父亲死了，他的伯父也相继死了，剩着许多兄弟姊妹，全靠伯安一个人支持。后来他虽然勉强从高等学堂毕了业，但他终没有机会出外发展他的禀赋。在我们四川的那样个井底天里，可惜埋没了一位天才。

第二学期中把原有的学生分成两班之外，还招了一班丙

① 《沫若文集》第六卷此处作“二十三人”，今据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改正。

班和一班半年毕业的师范班。许多老的学生也转入师范班去了。

班数一加多，教员也不能不添聘，我们便得到了好几个新的教员。

有一位是杜少裳①先生，他是一位廪生，也是由日本宏文师范毕业，在暑假期中才回来的。他这人很聪明、很敏捷、很漂亮，一般人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水晶猴子”。他是易先生最得意的人。他教我们甲班的数学和物理。

还有一位是王祚堂②先生，他也是一位廪生，是成都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的。他的性格和杜先生刚好成一个对照。他很温厚、很寡默、很朴素，而且很矮，我们叫他是“地藏王菩萨”。他教我们甲班的历史、地理。他却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

这两位先生来了之后，便把刘书林和帅平均两位先生挤到乙班去了。但是帅先生依然在教我们的读经讲经。他讲的是《今文尚书》，以孙星衍③的《伏生今文尚书》为教本。我们在家塾里读的《尚书》是梅赜④的《古文尚书》，经他的解释我们才知道经学中有今文派、古文派的辨别。事实上帅先生所给我的教益是很不少的，但我因为上学期受了侮辱的关系，我

---

① 杜少裳(1880—1936)，名明煇，四川乐山人。曾任川东道尹。

② 王祚堂(1873—1914)，名秉基，四川乐山人。曾任川南宣慰使，第一区省视学。

③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清经学家。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等。

④ 梅赜，一作梅颐，字仲真，东晋西平(一说汝南)人。晋元帝时，曾献《古文尚书》。

怎么也不能满意他，无论遇着甚么事情我都要和他反对。

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们我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就是最令人害怕的易老虎，我也犯过他几次的逆鳞。

学堂后面都是乱葬坟的荒山，因此学生间有许多人怕鬼。终日锁闭着的寝室，在晚上点名进去的时候差不多是谁也不敢走前头的。晚上大家都进了寝室后的自修室，也差不多谁也不敢一人留着。荒山上大约时常是有鸱鸟啼饥的，那样的时候大家便要以为是鬼在叫了。

有一回礼拜六的晚上，大家都进寝室去了。我和尚之两人在自修室里留着。（从第二学期起，礼拜六的半日休假废止了，城内的人也不能不在堂内寄宿了。）易先生突然走了进来，他是有几分酒意的，大约又是和几位名下士在渝州公所撞了诗钟回来的了。

——“啊，你们两个小学生还胆大，不怕鬼啦。”

尚之说：“我们不怕，易先生，你怕不怕呢？”

——“我怕？”他反问一声，“哈，哈，哈，哈，鬼倒要怕我啦！邪气是不敌正气的，象我这样的人是‘清明在躬，志气如神’①，鬼那里敢来近我？哈哈哈哈哈……”

我说：“易先生，你的见解还没有升堂入室。”

——“唔？”他把两只眼睛白着。

---

① 语出《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

——“我们学过物理学的人，晓得鬼神这样东西是根本没有的。”

——“哈哈哈哈哈，现在的学生要打老师的翻天印了。”

这回真是出乎意外的他一点都没有生气，他说完了后还把手来在我们头上摩了好几下。

学堂里的饭桌是长方形的，两端各坐四人，中间放一个饭甑。座位是依着体操的顺序坐的，所以我们的一桌是最后的一桌，刚刚缺少一个人。

上半年把我的手捏出了好几个指痕的那位徐老童生，因为他的祖母或者母亲过了世，他来校得很迟；食堂的顺序已经编好了，他便只好和我们同桌。

这位老童生是一位饕餮，饭量既佳，吃菜更不让人，吃了这一边的，还要吃那一边的。我们把他厌恨极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小学生约定：我们每次盛饭都要盛得很少很少的，彼此轮流地把饭瓢把持着不使落在他的手里。这样十二分幼稚的计划公然把那位老童生难着了，等我们把菜抢干净了，他始终只吃得一碗饭。

饭后他公然跑去告了我们，这倒是出乎我们的意外的。

易先生把我们七个小孩子叫去和徐老童生对审，在办事人会食处里面。窗外站满了看热闹的学生。

——“你们为甚么不把饭给他吃？”易老虎很严厉地诘问我们。

——“那个不把饭给他吃呢？饭甑是放在桌子当中的。”有一位同学这样回答了一句。

那徐老童生说："你们把饭瓢占着不把给我啦。"很可悯的一种声调。

窗外哄笑起来。

——"你们这些东西！笑甚么！"易老虎向着窗外发起虎威来了。看热闹的人跑散了一批，但转眼又聚集了拢来。

——"你们为甚么不把饭瓢给他呢？"

——"饭瓢少了倒是有的，八个人只有一个饭瓢啦。但是他太不聪明啦。饭瓢轮不到他，他用碗可以啦。"又有一位同学这样回答。

——"你们这些小东西！你们才聪明啦，你们不怕短命！（窗外又嗤嗤的有些笑声。）你怕我不晓得，你们这些小东西在作鬼啦！"

窗外又大笑起来。

老虎又向窗外发了一次威，窗外的人又骇散了。但不久又聚集了一批。

——"我们实在抢不赢他，他平常非常抢嘴。今天他没有抢赢我们，便来告我们。"这是丙班的一位小学生说的，这却把我们站在易老虎面前的人都说笑了。

易老虎自己也好象是忍俊不禁的，但他总放不下脸来。他大约是要借一种高压手段来保持他的尊严罢，出乎意外的他却给了那小学生一个耳光。小学生哭起来了。

我忍不住了。"易先生，你这未免野蛮！"

——"是的，野蛮！野蛮！"窗外的人同声的叫起来了。

——"野蛮校长！野蛮校长！——那有在这文明时代还

要打学生的！——太无人道了，蔑视了我们学生的人格！……"

窗外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闹作一团，易老虎还要起来咆哮，但他看见他的虎威完全倒了，他怫然地站起来走进了他的房里去。

易先生当时便退出了学校，他偭言要辞职，这把一学堂的人都闹翻了。教职员去挽留，老学生举代表去挽留，那天下午没有上课，一直闹到晚上。

易先生被挽留住了，第二天清早他又来了。

那回我记了一次大过，其余的六个人罚了两个礼拜的禁足。

自从这一回反抗过易老虎之后，我在学生里面的威势完全树立了起来，我算成为了学堂里的一个小领袖了。虽然有极少数的老学生和我仍不相能，但他们已把我没可如何。他们的目的只在分数，他们是尽力要向教职员讨好的，除了死咬着课本之外，学生间的一切的行政事宜他们都全不过问。

这一学期的生活和第一学期的生活差不多便有天渊的悬殊了。因为要想征服一切，所以总极力想摆脱小孩子气，有意识地想装成一个大人。于是乎不良的倾向一天一天地显著起来。

酒是吃得更多了。嘉定城外沿着府河的边上有许多豆花店，这便是我们每星期的常会地点。雪嫩的豆花——这和豆腐一样的制作，只是比豆腐还要简单，还要好吃。豆浆熬熟了，加以亚尔加利①，凝集起来，加以相当的压力，就在锅里便

① 作者原注：化学名词 alkali（硷）的音译。

成豆花。四川境内这种卖店是最普遍的。

雪嫩的豆花拌着辣油海椒的豆油，这和白斩鸡一样是极平民、极可口的一种食品。

烟也吃起来了：因为吃烟是装大人的要素。于是便学吃水烟，学吃叶子烟。——那时候香烟还没有传到我们嘉定。晕了，我不知道吐过多少回，但是我终于吃会了。

我们那时候吃水烟是并没有水烟袋的。家里自然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余钱来买烟袋，同时也无须乎烟袋：因为有一种极简便的烟袋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是甚么呢？就是把帐竿头子削一节下来，在节疤上凿一个小孔，这便是我们那时候的烟袋了，这种东西容易藏躲，先生也查不出来。

还有一件最笑话的事，便是要梳一个长搭辫了。在从前有搭辫的时候，梳长搭辫便是成了人的记号。这种搭辫是组成了一副三绺的青绦，末梢有流苏的。但是我的头发太短，因为我们家里的习惯要到十二岁才准蓄发，怎么也搭不上绦子，便只好买了一组假发来添上去。但这种的装扮是不敢回家的，到年假回家的时候，把这些通同取下来，又缠着头绳回去。

五

年假期间在家里做了些甚么事情，我现在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受了帅先生的启发把家塾里的《皇清经解》① 来翻阅了

① 一名《学海堂经解》，清阮元汇编。

一些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阎百诗的"伪尚书考"①（题名我不甚记得清楚），他把梅赜的《古文尚书》的伪撰，差不多一字一句地都把出处找了出来，把它暴露了。这真是一种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是最爱挑剔别人的秘密的，这一点可以说恰如所好。

把《史记》读了一遍的也怕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等，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

《伯夷列传》里面我发见一句话，所有的古代注家差不多完全是解错了的。那本是一句极简单的话，但在传中是极重要的一个文字上的关键，假使讲错了，那全盘的文字便通不过去。但是古时候的人一方面讲错，一方面拚命地极口赞颂那篇文章，我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真是觉得好笑。

太史公的《伯夷列传》那决不是在替伯夷作传，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种论说体，伯夷的传只是那文中的一个插话。那篇文章的主要眼目是在论身后名的能传与否的因数。许由、卞随、务光②，与伯夷、叔齐一样，是让天下而不受的，但是何以

---

① 阎百诗(1636—1704)，名若璩，山西太原人。清经学家。"伪尚书考"题为《古文尚书疏证》。

② 许由，上古高士，相传尧让君位与他，不受而遁，隐居箕山下。卞随、务光，均夏时高士。据《庄子·让王》载，汤克桀后，以帝位让卞随，卞不受，自投稠水而死。汤又让务光，光亦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

伯夷、叔齐得以传于后世，而许由、务光之伦不传？这便是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代以后重儒，三代以前的人能传与否要看儒家称道他与否。对于伯夷、叔齐，孔二先生是极力称道的，所以他们便得传于后世。然而与夷、齐同样高洁的许由、务光等等，何以在儒家的六艺①里面不见记载，而孔二先生也不见称赞呢？要说都是莫须有的人，但是许由的坟分明在箕山上，太史公（或者是他的父亲），都是亲眼看见过的。

对于这些问题，他找寻着了两个因数：一个是人的好恶关系，一个是时代的清浊关系。

许由、务光的思想和生活是一种超现实的，所以见称于道家而不见称于儒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从吾所好”。这是人的因数。

许由、务光生在唐虞盛世（古来的传说是这样），因此不甚稀奇；伯夷、叔齐是生在天下散乱的时候，所以特别出众。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是时的因数。

有了这两个因数便可以知道夷、齐何以能传，由、光何以不传。虽然他隐隐约约地在骂孔二先生有点畸重畸轻，但他不敢直说出口来，只是细细地分析出了上项的原因，便总括一句，“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这就是对于上文的“夫孔子叙列古之仁圣贤人若伯夷、吴太伯之伦详矣，以余所闻，由、

① 即《诗》、《书》、《易》、《礼》、《乐》、《春秋》。

光谊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的答案。“彼”是指的伯夷、吴太伯，“此”是指的由、光。这在文脉上十分明晰，但因为在这一问一答的中间插进了一段伯夷、叔齐的传说在里面，这把古今来的注疏家、批评家便完全弄昏迷了。他们都解释为“其重道义，其轻富贵”。这真是有点滑天下之大稽。

那传末落尾的两句：所谓“岩壑之士趋舍有时”，这是把“时”字的因数点醒了出来；又有所谓“后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乌能施于后世”①，这所点醒的是“人”字的因数。他如“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的“此类”，所指的也就是许由、务光了。

年假过后回到学堂里去，前学期的成绩公然还是第二，这更增加了自己的自负心。所有一切不良的习惯不消说又要继续起来。我的懒惰、散漫、骄傲，差不多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讨厌。这时候又是性的烦闷非常猖獗的时候，自渎的行为差不多一天有两三次。

有一种顶奇怪的心理便是觉得自己太丰满，总要想再瘦削一些，希望如象尚之那样的瘦削。要想自己瘦削便不免愈见自戕，以为这样是促使自己美好的唯一的妙策。

我脸上的红晕不知道几时已全盘消去了。

就在这时候学堂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打击。

学校在第一学期中星期六是有半日休假的，城内的学生还可以回家留宿。自从第二学期起，这个制度便废了。学生

① 语出《史记·伯夷列传第一》："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们都要求复活，尤其是城里的学生们。

我们举代表向办事人要求，甲班的代表就是我。

我们要求，要求不遂便同盟罢课。

这样一来风潮便渐渐扩大了。

学生里面当然也有不少的卑劣分子，私下和办事人串通。办事人便定下了一个奸计，他们要召集学生谈话。全堂的学生召集在一个大讲堂上，易老虎走来又用他的严威向学生们警告了一场。他说："学堂在礼拜六是可以放假的，不过替你们的学业和健康设想，才把这个制度废了。你们一定要要求放假，以后也可以照办。但你们这同盟罢课真是大逆不道。"他又说："我晓得这也并不是你们全体的意志，只是有一二败类在里面怂恿；这一二败类要希望你们指摘出来，不然就要全盘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对得起自己的父兄！"

他威胁一阵又劝诱了一阵，都没有甚么效果；是那水晶猴子的杜先生出来提议，他说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法罢，那个是这次的罪魁，让学生们投票选举。

这样一来学生方面便全盘失败了，开票的结果除少数白票外，我竟以一百几十票的多数当选。当堂宣布死刑，我受了退学的处分。

由学校把行李一切搬了出来，在城内的一家客栈里面凄凄凉凉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真是不免有无限的凄凉，甚至于有落泪的时候。但是我的凄凉，我的落泪，并不是对于我自己的后悔，宁是对于同学们的卑劣、办事人的阴险的一种失望的悲愤。

我在学生里面主持，办事人方面分明很明白的；要斥退我便直截了当地斥退好了，为什么要经过那样一道手段，使学生们都成了一群卖友的人？在办事人方面斥退我或者真是出于一种苦心，但是这样的苦心在我自己是怎么也不能够谅解。

我被斥退了，我决心不回家，我想要上成都去，张伯安、吴尚之都在替我经营盘费，预算在城里要担搁一两天才有着落。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就在我被斥退了的第二天下午，我的父亲突然进城来了。父亲也落在我住着的客栈里。我是住在那客栈的官房里的，父亲走进房来，本是忧郁的面色，被忧愁和不快的情绪紧锁着，愈见严重得可怕。我不晓得父亲会来，头上是依然辫着长搭辫子的，父亲一看见我，便将就我头上的发辫来做皮鞭在我身上鞭打了几下。“你这不成材的东西！”他骂了我一声，便沉默着倒在床上睡着了。

原来一切的经过父亲已经早知道了。学校在要斥退我的那一天，已经专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去。杜先生直接写了一封信去给父亲。父亲看了信便立刻赶来了。

斥退！这是最严重的刑罚，在当时就好象由秀才革成了白丁一样。父亲是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的。

父亲来的消息一到，杜先生就在那天下午走来拜访。杜先生是我们母亲的一位族孙，但他和我们大哥相好，他叫我们父亲是“世伯”。

据他的说明，学校当局斥退我，是想玉成我的。说是“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成大器”，我经过这一次挫折，只要我能够悔悟，学校是要收回成命的。

父亲听了这一般话，当然又欢喜得一点。

晚上王畏岩先生来访。他是县视学，是一位副榜。他那时候已经是我们五哥的岳父了。他的说话更是客气。他说："八世兄高明有余，沈潜不足，只要稍微柔克一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的斥退不消说他也是表同意的了。

父亲第二天还到学堂去拜会了易先生、陈先生，是带着我一道去的。自己的儿子被人斥退了，心里的不高兴说不出口来，反转要向着人陪不是，向别人道歉，做父亲的这种苦心我是很能够推察的。因为是要挫折我的意思，父亲更决定了一种计划，要带我到各地的亲戚故旧处去显示，就好象犯了罪的人要绑着街上示众的一样。

最初到的是流华溪，我们大伯父是在后山盐厂上的。在这儿我们的亲戚故旧很多，最集中的要算是文昌宫的公立小学校了。那时候李肇芳先生在当校长，我们的沈老师也在当教习，另外还有一批新进气锐的人在那儿主持。因为处于竞争的地位，同时又以私立的原故，一切的措施总觉得比县城官立的高小更要来得自由。

父亲一到流华溪便把我引到小学校去，父亲的意思不消说是要大大地使我在稠人广众中受辱一番。但是结果是和父亲的期待完全相反。

地方小，薄有的文名已经噪于遐迩，又加以遭了斥退，我一到文昌宫，在学生当中便起了一个很大的激动。我的一个胞弟那时已在那儿念书，我到我兄弟的自修室里，由他引我到各处去参观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簇拥着我，表示着无上的敬

慕。我在他们里面就好象是一个凯旋将军一样。

我是一位来客，吃饭会话都是和先生们一道，这在无形之中更显得有一层优越。

但我的快心还不仅这一点。

我遭斥退在流华溪早已传遍，但不十分明了当时的情形，经我把闹风潮的原因和学校当局的办法报告了之后，一切的先生们都反对易先生们的办法，当时便联名写了一封信去质问易先生，信中很带有非难的口吻。末后还附带一段：年少的光阴绝不可任其虚掷，闻有收回成命之说究系何时？若尚迟迟无期，便准备把我收入文昌宫学校作为特别研究生，免使我长久失学。

这封信，父亲很主张不寄，但是终竟专人送去了。这好象是一个哀的美顿① 书，当局者都是很紧张的。

父亲的意思本来想把我带到五通桥杜家场绕道回家的，李肇芳先生们不赞成，他便作了罢论。李先生们的主张，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他们说：年青人不可使他太受耻辱了，阻止了他的竞争心、向上心。我觉得这真是正确的见解。由这个见解当然可以引导出一个教育方针，便是儿童教育就应该利用他的竞争心、自负心，从积极的一方面使他能猛勇向上，性情就流于骄傲也是不要紧的。总要使他有如象拿破仑一样的见解："不可能的字只有愚人的字典里才可以翻出"。

李先生们把父亲留在流华溪了，他们要等到易先生们的回信来再作第二步的进行。

---

① 即拉丁文 Ultimatum 的音译，意为最后通牒。

李先生和我们大哥同是郭敬武① 先生的弟子。郭敬武就是这流华溪的人，他和廖季平同学，也是一位汉学家，同时并长于辞章。李先生在流华溪要算是他的继承者了。这李先生后来在中学校当过我的先生。我在后边还有机会叙到。

李先生们的信到了嘉定起了一个很大的反应。不久回信就来了，回信的意旨也颇坚持着一种教育的主张，但是事实上是屈服了，学校里叫我立刻返校。

那时是二三月间的时候，我揣想易先生们的意思怕至少要停我半年学的，因为他们起初便不想要我进甲班，不想要我早进中学。但经流华溪的一反对，便很狼狈地立刻召我回校，我心里暗暗含着隐笑。同时我父亲在这时候也才展开了他的愁容。

易先生们的教育主张失败了，我自己便是一个铁证。

我停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学，跟着父亲又回到学校。

斥退牌取消了，另外换了一道“悔过自新准其复学”的牌示。一切都是虚伪，——为办事人敷衍面子的虚伪。——这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示。

学校里面又招了一班丁班了。有一位姓吴的，一般人都叫他是“吴弟儿”，很有姿首。他在操场里游戏的时候，一般人都要去和他亲近，但他却是很有戒备的神情。我才回学校的一天，在后操场里面去看他们游戏，便先看见他。他的确是很美貌。他那双眼睛非常敏活、非常浓黑，睫毛是很长而密的。

---

① 郭敬武(1858—1913)，名峯修，一字敬五，四川乐山人。著有《文山龛诗文稿》。

他的脸并不皙白，宁可说是嫩黄，是一个瓜子形，但怎么也觉得可爱。

我从操场里走过，从另外一边的坡路走下自修室的时候，他跟着我走。走到那坡坎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他抢前几步来握着我的左手——他那柔嫩而温暖的手。

他含着笑望着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郭君？”

我说：“你怎么会认得我呢？”

他说：“那牌上不是有你的名字？”

我那时觉得真是荣幸，我得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报偿，把所受的一切的耻辱都抛流到那东洋大海去了。

自从遭了一次斥退之后，我的性情愈见有意识地反抗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

——“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

这样的想念怎么也离不掉我的心坎。我愈见懒，愈见散漫，愈见骄傲。我清早睡起懒觉来了，就是点名的时候我也不肯起床，起来之后床也不理，帐子也不挂，这样的一直经过了一个学期。

自己一不良，不良的朋友便走来依附。我因为朋友的诱引，濒到堕落的深渊的也有好几次。

城内府街的中部有一条死巷名叫胭脂巷。这是有名的卖淫窟。

巷口的左侧有一家酒店。

有一天晚上有两个同学和我在这儿喝酒。喝得有几分醉

意了，他们约我进胭脂巷去。踌躕了好一阵，终竟克服不了自己的一种好奇心，便答应了他们进去。

巷道是很黑暗的，觉得非常可怕，踏进一步就好象堕入了无底的深渊一样。自己的心脏非常的悸动，走进巷口不上五六步路，终竟害怕，一掉头又跑了出来。

同时把我当成女性一样恋慕的人也有。

有一位姓章的，在学校里素来是不良分子，就因为我被斥退的时候，他也和我一道，我们便渐渐接近了起来。

他住在月儿塘的文庙旁边，在那附近有一家姓杜的酒店。当炉的老板娘已经在三十以上了，她是一位私娼。我们不知道在那儿吃过多少次数的酒。吃得有些醉了，那姓章的调笑她，我也跟着调笑她。我有一次跑去坐在她的怀里。她对我说："小先生你还年青，你不应该跟着他们学。他们把你带坏了。"我感觉得她就象我的一位老嫂子一样，警惕了起来。

就是那位姓章的，他有一回约我到他家里去吃酒。他家里除了一弟一嫂和一位老妈子之外是再没有甚么人的。

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再走，引我到一间房间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床边来，出乎意外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在第三学期中除掉这些恶心的不愉快的记忆之外，我差不多没有一件光荣的事情可以纪述。我感觉得学校生活是极

危险的一种。职司儿童教育的人是应该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儿童一生的命运和性格差不多全部就铸成在这个时候。职司教育的人不想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只图保持自己的尊严，敷衍自己的体面；儿童的生活他毫不接近，儿童期的危险他也不事预防：这真真是等于把羔羊送在老虎口里。

我在老虎口里七颠八倒过了一年半，怕还是我家庭的严烈的教训把我救了罢？我算也脱离了那个危机，把畸形的小学生活告了一个终结。

我们是提前在五月毕业的，因为六月里要考中学。

榜示也揭晓了，我是发的第三。这三学期的成绩顺序刚好表示了我的一个堕落的途径。但我自己是甘心堕落的吗？

毕业了，毕业了，好容易才盼到了的毕业哟！虽然只有三学期，但就好象受了三十年的监禁。

毕业文凭是县官亲自临场手授的。大家都好象觉得光荣。

大家在食堂上吃毕业的筵席。自有天地以来的第一次的高小毕业生们猜拳的猜拳，射复的射复，真是不亦乐乎。

我吃得也有好几分醉意了。

我自己跑到后操场绝底的甲班教室里去，把鞋子脱下来，套在两手上。一年来愤积着的怒气涌上心来，我提起全身的力量来猛扑上去。

——“你这混账东西！”——撇东割零地打破了两扇玻璃。玻璃的破片弹在我手背上，弹出了血来。

——“吓吓，我的血公然还是红的！”

第 三 篇

一

一九〇七年的秋季我从小学升入中学了。

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标山的东麓。学校的后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室的右边是一带寝室，一直地绵延着差不多与学校的深度相等。

学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热闹的玉堂街，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但因为学堂的地基很宏大，学堂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断了的，平时只开左边的侧门或者右边的侧门，以供学生出入，所以虽然处在城的中央，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七县是乐山、犍为、威远、荣县、峨眉、洪雅、夹江。这几县的文化程度大约也就依着这个顺序。

中学堂的第一学期是发挥尽致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

校长是我们乐山县人，在湖南作过几任县官的，对于办学

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他这样的人当然聘请不出甚么好的教习，而且教习的产生法是要按照县份摊派，有这样一个条件限制，结果是愈见笑话了。

张胡子是夹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学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为夹江要摊派人，也就聘他去当监学。在行开学式的时候，本来客气一下不讲话也未尝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风头。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

——“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

说得满堂的人都笑起来，但他还很得意，后来我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徽号由夹江人传到他耳里去时，他很不心服。他还说：“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我不记得是峨眉人还是洪雅人，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是在中国的南边，朝鲜是在日本的东边，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形训》还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这样相差不远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员是湖北人，他一上讲堂便用英文来说话，写也写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怎么样。他说的写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现在也不敢保险。

在这样的一些教职员之下，四方杂处的从各县来了四五百名学生，嘉定城从此便多事了。

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惹是生非。城里的各处会馆差不多毫无间断地要演

戏的。礼拜可不用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我们那时都有半日的休假。在这样休假的时候，每处的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

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是怎样的呢？

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这些地方去学习甚么，那时候并没有怎样明确的志愿，实在也是不能有怎样明确的志愿。科学里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种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样，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了外边去觉得总可以学些甚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但是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总以为不至于象我所说的那样厉害。母亲是完全出于溺爱。自从大哥、五哥出洋以后，我们母亲时常思念他们，差不多一说便要流泪。她常常说："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肯放他们出远门了。"

我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家里一不许我出远门，我虽然几

次想逃走，但终竟没有这种决心。由是自暴自弃的念头便一天一天促进起来，闹事的学生中当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晋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攀上去。坐在凳头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种不愉快的样子。第二

的一个更指着他们两人中间伸出着的凳脚的榫头对我说：

——“这儿有个桩，你来坐！”

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很下流的意义的。

——“好的，我就来坐！”

不客气地我便一直攀上去，一坐就坐在两个人的大腿上。两个人不消说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罗唣起来。

我说：“是你们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经不是看戏的兴趣，只是吵架的兴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两人的同党，他回过头来打帮槌。

——“这儿不该你来闹！”

——“该谁来闹？”

我劈的就给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过头来的脸皮上。他伸过手来抓着我的领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时我的衣裳却被他拉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都号叫起来了。这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那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有的从人头上便扑过来，就象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样，全场轰动着的都是学堂里的学生。和我口角的看见势火不好，便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个？是那个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查出来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还有两个便是他的弟兄。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戏场上，他隔的很远，听说我在打架，

也从人头上游泳过来了。当时我们就去找伯安的父亲，那刘大爷还陪了不是，补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级的，好象有仁、义、礼、智、信的几种堂子，就象高曾祖父儿孙的五族一样。那位刘大爷大约是没有把我看成学生，把我看成了义字堂或者礼字堂的矮辈，或更看得不值钱罢？他竟上了一个当，折了不少的威风。不过，我也好久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们要向我报仇。

象这样倚仗人多势众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萧条。

最初我们才下嘉定的时候，嘉定城里有三座班子，各处会馆的堂戏差不多连续不断。那时候纸烟还没有到嘉定，学生身上穿的还多是一些银绸、茧绸、巴绸、或毛蓝布大衫之类的手工业的土产。但是隔不两年身上的穿着完全变了。洋缎、大呢、哔叽、天鹅绒，乃至葱白竹布，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带着一种洋味。机械生产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烟草公司的“pirot”、所谓“强盗牌”的纸烟，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鸦片阁下惠顾到我们城里了。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产生意的衰颓，行帮制度的崩坏。以行帮为基础的各省会馆自然要遭打击，要减少他们的行乐机会了。

唱戏的机会减少，戏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减少下来。从前

的三座归并成两座，更归并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维持，后来终竟消灭了。

这时候如象省城、重庆、自流井① 那些繁华的地方，唱戏的生意已经开始成了资本主义的营业，已经有戏场主集资合设的常设的戏园了。这些常设的戏园不断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戏班子便垪台。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戏的一个重大原因，不用说是表示着社会变革的。

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下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学生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上层现象。结果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逐渐被资本主义的洪涛冲破，在戏台的一角上很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演戏的方式、演戏的内容、演戏的剧团组织、演戏的舞台建筑，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确的唯物史观。

二

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的我，自然和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当时校内有八个最爱游耍的学生号称“八大行星”，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乐山县人占了四个，犍为县人占了三个。大约是因为地理相近而且同班的原故罢。

第一学期分了三班。乐山、犍为的学生是一班，威远、荣

① 自流井，原属富顺县，今为自贡市的一部分。

县的学生是一班，峨眉、洪雅、夹江的学生又是一班。

这三组，地方区域很相近，同时学生的性情也大概相同。乐山、犍为的人带些都会气质，不免有些轻薄；威远、荣县的人很粗暴；峨眉、洪雅、夹江简直是乡下佬了。

本来已有县界的地方观念，又加以不同班，在学堂中虽同住了许久，有的完全不知道姓名，有的就跟仇敌一样。能够接近而相得的人，不消说还是同县或同班的人了。

由这些行星的吸引，逐渐地认识了城内的一群游荡子弟。他们大都是中上等人家的儿子，家里钱是有的，又不读书，只是追逐时好，穿些流行的衣裳，日日打牌吃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便是定一个日期轮流地请吃酒宴。在酒席前后不消说就是打牌。

那时候我们打的还是纸牌，是由一点至十二点的，我们喜欢打的是"逗十四"和"卯十"。再不然就是"推牌九"了。麻雀牌已经到了嘉定，但是很少。

我不久也成了这"转转会"的一位会员。

在那会员里面有一位姓汪的少年，他的面貌很端丽，是"转转会内之花"；一班的人都是如蝇逐膻的向他献媚，向他诱惑。

他特别和我要起好来。我们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不能不见面了。

他家里开的是绸缎铺，也是在玉堂街上。他只有一位母亲；所以他的行动便流于放荡。每天午后他在铺店门口等我，我只要一下课便请假出去会他。

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

他在前本来有一位很钟爱他的人，但他把他疏远了；他倾向到我来也到了一刻不能相离的光景。

我的严正的一批朋友，张伯安、吴尚之诸人，他们看见我一天一天地趋于游荡，便暗暗替我担心。在休假的时候他们每爱把我引到别的地方去，避开我那些游荡的友人。但是那姓汪的少年我是不能离开他的，他也因为我的关系偶尔加入我们的严正的游队里面。

少年一和我接近之后，渐渐和他从前的朋友们隔离了；他喜欢的是单独地和我两人游玩。我们相会多半是在夜间或者黄昏的时候，我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市街，向那绝少人行的城外或者城墙边上去散步。

我们时而是很感伤的。

我问他为甚么不读书？

他说是他父亲死早了，便失了学。

我时常想，假使他是在读书，而且和我是同学同班的时候，那真是再圆满也没有了。

他有时候也要求我，要我得志后不要忘记他。我当时也好象觉得我很有力量把他提拔出那种境遇的一样。

他避人也是因为怕人说闲话的原故。他专一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对于他啧有烦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儿塘的草地上走着，我们时而又去倚靠着那月儿塘上的红石栏杆。月光是很朦胧的，四面的人家也点起了朦胧的灯火。

他对我说：“我和你好，他们在说我的闲话，但是我是不怕

的。我们一个是心甘，一个是情愿。”

正说到这儿，远远来了一个人，我们把话停止了。人影走拢了来，原来就是“转转会”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话中有话的说：

——“啊，你两个！”

就这样说了一声，那人便走过身去了。少年向着他的背影回答了一声：

——“唔，我两个！我两个又怎样呢？”

那边也没有回话。

我和他交好，我的朋友们很替我危险，甚至于连行星里面的天王星都在忠告我；说我和汪少年要好，我反转要受他的暗算。我只是感觉着一种苦笑。

他对于我十分恳切，有时候就象我的一位姐姐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吃醉了，是有许多人一道喝酒的，散后只有他跟随着我。我们走过一家烟馆门前，突然遇着一位“鸡仔”。他本来是一位府学的儿子，后来府学死了，一家人流落在嘉定也相继死了，只剩下这位儿子竟成了“鸡仔”。——这是相公的别名。我拉着他，叫他陪我去喝酒。我们在一家小酒店里面又喝起来。夜渐渐深了，汪君催我回学堂去。我说不回去，要引着那位相公去开旅馆。汪君他也把我没法。他借着买下酒菜为名，拿了两块大洋给那相公，和他说了一些话叫他走了。那人一去便没有转来。

汪君后来还对我说：那孩子很不肯走，他的意思好象还怪他吃醋。

那晚上我醉得一塌糊涂，汪君把我扶到他自己家里去，还劳他的母亲服侍了我一夜。

是那年的年底，还是第二年的年初，我现在记不准确了。

那也是一场醉后的事情。

我同几个“转转会”的人喝酒，喝了后又打牌，已经半夜过了，我的钱输光了，我还要要求打。有一位说要打现钱，我便和他吵闹起来。我痛骂他，说他侮辱了我，怕我输了不给钱。两个都把脸破了，我便一冲冲出那店铺来。那是县街上的一家药店，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人家里的。

那时还没有电灯，昏黄的街灯照着悠悠的夜景，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

打牌是有汪君在场的。我和主人决裂了，冲了出来，我相信他一定要跟着我走。但我走出街来以后，走不多远我便立在街边等了一会，却不见有人在后面跟来。我又愤恨，又绝望，想到学堂的门是已经关了，便顺便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里去。客栈的么司务把我引上了楼。一个长条房间，沿着壁摆了三尊床。床上是只有草缝和一张草席的。

我抢着床头有一个长桌的床便和着衣裳倒了下去。么司务抱着一床被条走进来，把它盖在我的身上，就象压下了一张石板一样。随手点燃了桌上的一盏菜油灯，他又走出去了。

我模模糊糊地睡着，恨我受了侮辱，又恨那汪少年不跟着我来。我想到身上没有钱，明天怎样出客栈，心里也暗暗地着急。口渴极了，向么司务要茶水喝，但他说已熄了炉火了。没有法子，只得忍耐。

模糊地睡熟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凉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责备他："你为甚么不跟着我来？"

他说："在人面前怎么好那样呢？你走了我们还打了一两和牌，我装着肚痛才告退出来了的。他们也醉了，和你吵的老陈吐得一塌糊涂。"

——"你怎么晓得我是在这儿的？"

——"我晓得你不能回学堂，一定是在客栈里睡。几家客栈我都沿街打听了来，在这儿才找着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在街上买了几节红甘蔗来。"

说着他又笑瀜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里。

——"啊，我真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还是他给了栈房钱我才出来了的。

第一学期的半年就是这样放荡过去了，不消说完全没有学到甚么。我的修身分数是在二十五分前面还打了一个负号的。

三

第二学期的中学校又换了一种花样了。

全校的教职员完全更换，一个都没有剩留。

校长姓秦，是犍为县的人，他在成都师范学校做过监学。他所找的人比第一学期的是要稍微整齐一点。但严格地说来，

两者的相差也很有限。譬如成都高等学校预科毕业的数学教员，读“英文”的“English”为“因革赖徐”，读“学校”的“School”为“时西火儿”，这已经是够令人滑稽了。同校出身的植物教员把别人的钞本来讲授，竟把草写的“天然景象”误认成“天龙景象”，讲了一大篇“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

有一位姓罗的监学，他本是峨眉县的秀才，又是留东学生。他替我们讲国文，讲韩退之《送董少南序》，那里面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犹复有昔日之屠狗者乎”①的一句话，他不知道“望诸君”就是乐毅②，他讲道：

“你去把那些诸君的坟墓吊望一下罢，看那市面上还有没有从前的卖狗肉的？”我们好笑，笑得忍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式的诨名叫“猪头望三郎”，别号又叫“狗肉先生”。

象这样的笑话是不一而足的。不过从整个的来说这一学期的先生比第一学期是要高超一点，多少他们还见过一些世面，进过几天学堂门。但他们，特别是一位监学名叫丁平子的先生，却异常的自负。

丁先生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是荣县人，是一九〇七年日本留学生闹取缔风潮回国的。那时候他在当四川留东同乡会的总干事，他在留学界中当然是铮铮佼佼的一流。

他的身体非常矮小，面孔是一个正三角形，上颚的两个门

---

① 《送董少南序》，据《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原题为《送董邵南序》。引语之后半句作“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② 乐毅，战国时灵寿人。燕国将领，燕昭王时率军破齐国七十余城；燕惠王即位后，不被信任，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其墓在邯郸市西南。

牙暴得非常厉害。他自己很以辩才自雄，但他的声音非常尖锐，语调非常的不自然。这无论怎么也没有雄辩家的资格的。不过他为人很狡猾，他爱弄诡辩，你要和他说话总说不过他。

他们这些先生在那时候或许事在难免，因为要统辖在第一学期中过于放纵的学生，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要采取严厉手段的。但是他们是过于专横了。他们不是以学生利益为本位，只是以显示自己的身手，显示自己的威风为目的。

才开学不两天，有一位夹江的很小很小的姓宿的学生，他在吃中饭的时候，因为自己桌上的椒油辣子吃完了，便去把会食的监学桌上的一碟辣子取了来。监学是一人一桌的，一碟辣子当然会有剩余。出乎意外的是那天会食的詹监学，他竟拍案大怒，说这姓宿的同学侮慢师长。

姓宿的本来是一位很守本分的孩子，他去拿监学桌上的辣子，一定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其实在谁个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决不会有甚么侮慢师长的存心。然而“上任三把的新官火”不幸正落在宿君的头上，就在那天下午，学校竟公然雷厉风行的挂了宿君的斥退牌。

这是太横暴了！这便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当天下午便罢了课，举出了两位代表去和监学们办交涉。代表，一位是乐山学生姓易的，一位是姓周的威远学生。

他们两人在监学室里和三位监学先生讲话，差不多只听见丁平子一个人的尖锐的声音在咬文嚼字。

全校的学生都围在窗前，那当然是嘈杂不堪的。丁平子

便借着弹压窗外的学生为名总不与代表们说到本题上来。

姓周的说："我们是全校学生的代表，先生，你且听我们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听窗外的声音向窗外的人说话。"

——"然而监学有目，谁能令其不视？监学有耳，谁能令其不听？监学有舌，谁能令其不说？"

这就是雄辩家的一种尖声尖气的雄辩。

姓易的是一位老学生，他的年纪怕比那任谁那一位监学的年纪还要大些，他素来谈话是老气横秋的；他又横秋起他的老气来了。他向丁监学说：

——"丁先生，你的肝火太旺了。"

"搭"的又是一下拍案的声音。

——"甚么？甚么叫肝火旺？你真胡闹！你真侮慢师长！斥退！斥退！"

尖声气连连地冒火，怎么也不由分说，立刻把周、易二位推了出来。

不上十分钟的光景，监学室的窗上又挂了一道牌出来。周、易二君以煽动罢课、侮慢师长的罪名，又遭斥退了。

学生还继续罢了两天的课，终因他们用高压手段和牢笼政策，把学生的团结切破了，他们便硬把学生的愤怒镇压了下来，但是稍有血气的人谁个能够心服呢？

平心地说，他们就这样横不讲理地把学生压伏着了，假使他们真真正正有点相当的学殖足以引导学生，那他们也未尝不可以使人心服。但他们却是空空如也，而且还十二万分的心骄气浮。

象丁平子要算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了。他担任世界地理，他的讲义模仿的是章太炎①的笔法，写些古而怪之怪而古之的奇字，用些颠而倒之倒而颠之的奇句。他并不是在讲科学，他是拚命在熬文章。讲了半年仅仅讲了几篇序论——实在是倒通不通的序论。

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显示。

他们的骄傲不仅在学生间不能得人心服，便是城里的老名士辈都看不惯了。他们有一次去游高标山的万景楼，做了一副木联来挂在楼上。那联语是：

六秀才同游一日
万景楼从此千秋

因为他们去的人中刚好有六位秀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把那极温诚的王畏岩老先生也激愤了，老先生把那联语改成：

六秀才只通六窍
万景楼遗臭万年

在下边正正当当题出了改窜者王畏岩的几个字。

①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姚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等。

他们受了这样的毒骂，后来还闹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他们这一批教职员来了之后，把学生的班次也从新改组过了，把我们旧的学生仍然分成三班，但不是从前纯粹依地域的分法。甲一、甲二是注重英文的，甲三注重日文。我因为恨那教英文的一位杨先生，便反抗的入了注重日文的甲三班。甲三班的人大概都是一些有几分叛逆性者的集合。

我们的英文那时候真是可怜。用的是日本正则英文学校的教本，那位杨先生以他仅仅在高等学校学了一两年的程度，把那“比阿把”、“比奥保”、“比爱摆”的拼音便教了我们半年。

我们的日文不消说也是一样的可怜。教日文的先生也仅是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程度；这样的程度便来教人的外国语真是太严肃的儿戏了。我们学日文学了一两个学期，用尽我们的力量连五十音都没有学好。

学堂里没有可学的东西，少年的各种能力他总要寻出发泄的机会来消费的。第一学期中是消费于酒，消费于游荡，第二学期中这个倾向虽然仍旧继续，但已经没有从前那样厉害了。重要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我自从和他两个成了莫逆之交，我事实上成为了那一群游荡儿们的情敌，自然不能不和他们疏远。我一和他们疏远，自然又不能不向新的方面发展了。

我所发展向的新的方面是甚么呢？便是文学。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

中学堂的经学教员黄经华①先生是我们乐山人，他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门生。他很喜欢我，借了不少的书给我看。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章太炎的《国粹学报》②，梁任公的《清议报》③，就在这时候和我见面了。章太炎的文章我实在看不懂，不过我们很崇拜他，因为他是革命家的原故。革命家的言论为甚么要那样的难懂，一点也不带点革命性？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有人对我说，难懂的是他论学的文章，他关于革命的言论是比较容易懂的。但那时候他办的《民报》④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

① 黄经华（1864—1925），名镕，四川乐山人。清末举人。曾任《乐山县志》纂修。著有《经传九州通解》、《周礼订本略注》等。

② 月刊，一九〇五年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停刊，邓实主编。章太炎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③ 梁任公（1873—1929），名启超，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饮冰室合集》。 《清议报》，综合性旬刊，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创刊于日本横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停刊，梁启超主编。

④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一九〇八年秋末被日本政府封禁，一九一〇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先后任主编。

得到阅读的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出具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①，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②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景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

---

① 即《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② 加富尔(C.B.Cavour,1810—1861)，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加里波蒂(G.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玛志尼(G.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民主共和派领袖。

的。[1]……

林琴南[2]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3]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象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有时在迦茵的位置上把那少年汪君替换上去，但总觉得不自然。因为他也是男子，很象用不着我用多大的力量去保护他的一样。

《迦茵小传》有两种译本，林琴南译的在后。在前的一种

---

① 一九二九年《我的幼年》初版本在此处尚有以下文字："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在中国抬头的时候，他们便都固守着有产阶级的阵营而成为反革命派的前驱了。

"这是理所当然而势所必然的。在有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高唱富国强兵的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自然要讨赤反共。因为他们所富的国是有产阶级的本店，所强的兵是有产阶级的爪牙。梁任公章太炎可以无庸再说，其它一二年前的所谓革命党人不是一个个都成为法西斯蒂了吗？"一九四七年作者将本篇收入《少年时代》时，将以上文字删去。

② 林琴南(1852—1924)，名纾，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文学家。据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外国作品一百八十四种，有《畏庐文集》等。

③ 作者原注：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林译哈葛德，通译海斯特（1856—1925）。——注释者〕

只译了一半①。这两种译本我都读过，这怕是我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如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革命潮流的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②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③。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

Lamb④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

---

① 译者署名海上蟠溪子（杨紫麟），天笑生（包天笑）作序。所译为原作的后半篇，题作《迦因小传》，载《励学译编》一九〇一年二月。林译本《迦茵小传》于一九〇五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作者原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多描写古代的武士生活。〔林译司各德，通译司各特（1771—1832）。——注释者〕

③ 通译《艾凡赫》。

④ 作者原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林译兰姆，姊弟两人，姊玛丽·兰姆（Mary Lamb，1764—1847）；弟查理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注释者〕

国诗人吟边燕语》①，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②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

四

回想起来，我那回所害的大病的确是Typhus abdominalis③。

那是一九〇八年的秋天，中学堂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

中秋过后没有几天，人总是非常的疲倦。头痛、下痢、咳嗽，时时流鼻血，食欲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油荤非常厌弃，吃素菜也完全没有口味。

要说有甚么大了不起的病罢，又象没有。每天还是在起床，还是在照常上课。但是自己却非常悲观，好象自己的病异常严重，非死不可的一样。

死！这是从来没有上过念头的事情，突然好象在航海中的远山，模糊地显现在水平线上来了。疲倦得不能支持，向监学请了假，把白昼是锁闭着的寝室打开，一进寂寥的寝室里去，向着空漠处突然站立着了。

---

① 作者原注：一般译作《莎氏乐府》。〔《莎氏，即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有《莎士比亚全集》。——注释者〕

② 作者原注：《暴风雨》、《哈姆雷特》、《柔密欧与幽丽叶》。

③ 作者原注：肠伤寒。

"啊，我是一定要死的！"

不知不觉地流出眼泪来。

这是所谓hypochondria① 的现象，这在肠伤寒的潜伏期中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象这样前驱的症候怕经过了一个星期，渐渐地不能支持，我便决心回家。由城里回家是要坐轿的，适逢其会正当我要回家的头一天，我那位嫡堂兄的三哥从省城回来，他是在省城铁道学堂才毕了业的。他也要回家，我们两人便恰好同路。但到第二天上，不凑巧，他找不着轿子。

我想他是衣锦荣归的人，同时又有三嫂在家里等着他，我便把我定下的轿子让给他坐了。

三哥回去后，我又在城里耽搁了几天，下痢的次数愈见多，热候渐渐持续起来，怎么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回去，回去，我是不能再迟延的。"

雇定了肩舆由大西门出城，走到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那条雅河。过河转向东南再走十里，便是水口场，轿夫照例是要在这儿吃早饭，过烟瘾的。

我们四川的轿夫差不多没有不抽鸦片烟的人。他们是到了只要有烟抽，甚至于连饭都可以不要的程度。结果是他们一天所得的钱，也就只好勉强够他们抽烟。在那时候鸦片烟还不很贵，吃饭倒很有几分艰难了。轿夫们在吃饭艰难的时候，逢着可以当饭的便宜的鸦片烟，那他们是怎样的欢喜呢。

① 作者原注：忧郁症。

他们自然管不到甚么中毒不中毒，只要可以免掉吃饭的艰难，而且还可以除去许多痛苦，那便是天赐的灵膏。他们更管不到甚么亡国不亡国了。所以结果是轿夫抽鸦片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但是，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哟！

鸦片烟——吃饭问题，这是相连系的。鸦片烟的输入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资本帝国主义的袭来就是使吃饭成为问题的重要原因。做苦力的人，在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已经就是由吃饭困难产生出来的，那更经得起更高级的榨取，更高级的剥削呢？种田十年不如种烟一年。烟愈多，饭愈少。做苦力的人当然只好抽烟而不见吃饭了。

四川的轿夫你们是看不得的，一个个就象从坟墓里拖出来的骷髅。然而他们还是要抽烟，还是不能不抽烟。

我从前读过Tolstoy的一篇论麻醉性嗜好品的文章，他的大意是劳动阶级多半喜欢吃酒吃烟，那原因是想麻醉自己的良心，不忍见自己妻儿们无法避免的受难。这个当然是一个可以推想的原因。但我感觉着怕还是自己吃饭的问题要占动机的第一位罢？服用麻醉剂自己可以多出些力，少吃些饭，这是科学的事实。

到了水口场，轿夫们照例去抽烟去了。我坐在一家幺店里休息。——那是兼营着饭馆、客栈、茶店、酒店各种生意的地方。这种铺店的街灯上，照例是写着“酒饭便易，河水香茶”。

我坐在店门口的一座方桌上，泡了一碗普洱茶，饭是一点也不想用的。淡淡的秋阳很忧郁地照在不洁的街道上，一

切都好象带着一种惨白的颜色。自己心里非常忧虑，因为一天要泻好几次的肚腹要坐长途的肩舆，真是一种黄色的恐怖。

——"八老师，你的脸色怎么那样苍白？你人不好吗？"

我们同场的人叫我们兄弟都是在排行之下加"老师"两个字。是一位同场的人名叫杜子康的突然遇见我，很惊异地向我发问。

——"是的，我泻肚子。"

——"哦，那很不方便，你是回府，还是下嘉定呢？"

——"我是要回家去养病的。"

——"哦，还要坐五六十里路的轿子啦！"

他踌躇了一下又说道："你来，你来，我拿一样药给你吃。"

他也是在那么店里休息着的，他是要进城去。我跟着他走进店里的一间房间里，那儿摆着几尊床，床上放着草缏和席子，枕头是几桩圆木。他向一尊摆着烟家具的床上躺下去了，叫我睡在他的对面。

——"这东西对于止泻是很有效的，你要吃一两口才行。"

他把烟灯点燃，一面开着烟泡一面对我说。鸦片烟的烟味很好闻，靠在别人的烟盘上"摆龙门阵"①，那真是一种神秘的境地。在吃饭不大成问题的人也普遍的嗜好鸦片烟，他们

① 作者原注：四川方言：谈天。

所追求的便是这种神味，比这还要更进好几百层的神味。烟盘子对于他们是地上的乐园。

我勉勉强强地抽了两口烟，烟泡子怕起了好几次火；抽起来的味道很苦，没有不抽的时候那样好闻。抽烟也是有艺术的，抽不来烟的人只好象吹洞箫一样的吹，不会吸。不是把灯吹熄，便是让烟泡子着火。要抽一两口烟，装烟的人真是要费很大的气力。

你听抽烟的人讲起抽烟的艺术，那真津津有味了。

开始是烟家具的讲究。所有一切的烟斗、烟枪、烟灯、烟签，都有有名的出产地或专门的匠人。烟枪的讲究可真不亚于女人的讲究梳头。为要使那枪杆的色气染成金黄，他们不惜把自己的烟枪在尿缸里浸过好几个礼拜。烟嘴和烟脚是要用上好的玉石来装饰的。枪裹肚不是纯银便是纯金，还要嵌上许多宝石。

其次是开烟的手腕。这是很精巧的一种技艺，要把烟泡子炼来非常粘韧，上在烟斗上要形成一个肚脐眼，那便是上选。

连吃烟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出那人的手腕的高下。要一气呵成，要玲珑清冽，活乐翁、活乐翁、活乐翁地好象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些艺术，门外的人只凭着耳食的绪余是不能够形容尽致的。这是吸鸦片的艺术，也就是有闲阶级的艺术一般。他们是要讲究雕琢，讲究色彩，讲究声韵，讲究神味的，这不是和抽鸦片烟的艺术是完全相通的吗？欧洲颓废派的文人Coler-

idge①, De Quincey②, Baudelaire③, Verlaine④等等不同时就是鸦片烟的嗜好者、赞美者吗?

有产阶级的艺术就是鸦片!

吃了杜子康的两口鸦片委实是见了奇效，那天坐了一天的轿子，在黄昏的时候到家，竟一次都没有泻过。

回家走进中堂，在阶缘上遇着三嫂。

她笑着说:“八弟，你回来了。”

我也笑着回应她说:“我回来了。”后来她对我说，我那时的笑容是很凄寂的。

我走路已经很勉强了，父亲从后堂走出，劈头遇着我。父亲很带着一种惊异的神色。

——“八儿，你怎样的?”

——“我人不大好。”

父亲转过身跟着我走进去。我的两个妹妹和三个侄女来扶着我，她们是和母亲坐在后堂的门口的。

母亲也站起来迎着我。

——“八儿，你回来了，你人不好吗?”

——“我回来了，妈，我人不大好。”

走进母亲房里去，倒在前面的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下，我

① 作者原注:库尔律治(1772—1834)，英国湖畔诗人之一。

② 作者原注:德·昆塞(1785—1859)，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著有自叙传《吸鸦片者的忏悔》。

③ 作者原注: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著作以《恶之华》为最有名。

④ 作者原注:凡尔仑(1844—1896)，法国诗人。

从此便失掉知觉了。

五

父亲是懂中医的，但他并没有学过医。他只是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集收了不少的医药的知识。他看病不评脉，也不谈甚么阴阳五行的玄理。他只望望气色，问问病情，看看舌苔，审审热候罢了。在缺少医师的我们乡下，他虽然并没有挂牌，但也有不少的病人找他。事情也奇怪，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一样。我们的大伯父也时常嘲笑他，说他是“神仙太医”。

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信仰他，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

我那回回到家中，父亲照着平常的惯例，也就开了一服温和的药给我吃。平常家里人一有病痛都是用父亲的药方的，但我的病情太重了，使他失了主宰。他便不能不去找我们场上的唯一儒医宋相臣先生了。

宋相臣先生是一位秀才，他本来不是我们场上的人，是从流华溪迁徙来的。听说他在小的时候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

在一家药店里当小工，药店主人看见他勤敏，才收他为弟子，教他读书，后来他竟成了名，进了学。他的夫人就是那药店主人的女公子。他是在药店里面陶养出来的，不消说是以医为业。但他的医业的行世，与其说是靠他的技术，宁肯说是靠他的秀才学位。他是专家，但是乡里人却不大肯去找他，或许也怕是要花钱的原故。

父亲和他很相好，对于他的医道虽不很心服，但我的病症太重，因为他是专家，便还是走去和他商量。

我在泻肚子，宋先生说这是“阴症”。我的发烧、流鼻血等等据说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给我一服分两很重的附片、干姜。

药方的决定是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半天。我的热度那时稍微退了一点——这是当然的，伤寒症的热候通是上半天低，下半天高。我那时候一点意识也没有，怕已经在四十度以上了罢。

药方决定了，是我的大嫂亲手替我熬的。大伯父也很关心，他平常是不进我们父母房间的人，却一天也要来看我一两次。他看见大嫂在熬药，还给她些注意，说要留心，不要使药罐沸了，总要熬得很浓。

一服大热药而且还熬得很浓，这吃了便立地见效。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脑症爆发了出来，就象发了狂的一样。

——“我要到地下去睡！我要到地下去睡！”

我在床上总是不想安定，总要奔往床下。我不住地乱吼。

我所吼的要往地下去睡，听的人又加上了一种不祥的意思。这使全家上下都鼎沸了，尤其不安的是我的母亲。

宋先生缩手无策了。父亲和伯父也都缩手无策了。邻村附近的医生是有限的，谁都配不上去请求。要下城去请罢，医生请来恐怕人已经死了。

但是说死，我又没有断气，只要有法可想总也不能不设法。当天便去请巫师来降神了，听说在我的床前杀了一只雄鸡，把心脏挖了出来敷在我的心上，这倒不晓得甚么意思。

还吃过甚么雄黄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尽了。

到了第三天上半天，有位从堂的叔父，他推荐一位姓赵的医生。赵先生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从来没有名望。瑞叔也只是在偶尔的一个机会上认识了他。死马当着活马医罢，没有办法只好去请赵先生了。

赵先生是到第四天上午才请来了的。他一来，就开始了斗争。他的主张和宋相臣完全相反。他说我的病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他开了一服分两很重的芒硝、大黄。宋先生不消说是反对的，父亲也不敢赞成他的主张。从上午起彼此讨论病情，讨论到下午，怕要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了，药方都还是不能决定下来。母亲为催这药方，从后堂走到前堂来，往返了五六次。

我的四姐是许配在隔河的许湾的，那在太平市下游还有十里路远。我回家的晚上便请母亲派人去接四姐回来。四姐大约是第二天的下午或者第三天的上午才回家来的。她就和我母亲交替地看护着我。

四姐回来的时候听说我好象清醒过一下，我对四姐说：

——“四姐，五哥死了！”

我说了就哭了起来，她起初还以为我是在说谵呓，但我给她说在某一本书里面夹着有一封信，教她不要把给父母看。

信是果然有的，那是五哥从日本写回来的。他在日本和大哥生了点间隙，大约因为钱不够用。他的信上便写了许多要自杀的话头。信我是在嘉定接着的，回家来便夹在那本书里面。但这些我在病好后都失去了记忆，我和四姐的对话完全是下层意识的作用。

在那最后一次我母亲出去催药方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本来是光线不足的房里便愈加阴晦起来。四姐一个人守着我，我是一个半死的人。张起焦黑的嘴唇，翻着白眼睡着。安静的时候，就象死人一样。不安静的时候，就象狂人一样。四姐不消说是很害怕的。她在我母亲出去了一会之后，也走出来唤我母亲。

她只叫了一声“妈！”

我母亲号啕痛哭起来了：

——“啊，八儿死了吗？八儿死了吗？赶快把帐子给他下了，免得他打进枉（网）死城去。”

说着，哭着，便朝里面走，再没有工夫听四姐的分说。伯母、叔母、嫂子、姐子，都跟着母亲朝里走。但是我是并没有死的。后来在我病好的时候，我母亲笑我四姐，我四姐也笑我母亲。

母亲说：“四姑娘，你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你

把他丢了，一个人跑出来，哭声哭气地喊我，谁个也会想到八儿是已经死了的啦。”

我们四姐也说母亲太着急了，一点都不由分说。

——“那时候你就向我分说，我以为你是假意说来安我的心的。”

赵医生的主见很坚决，他绝对要用他的药方。如不用他的药方他就要走。他说他的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去病人泻的次数会一天一天地减少，而且要乾到没有的程度。连父亲要稍微减轻他的分两他都不肯赞成，他那种刚愎的态度听说实在是少见的。

在那时我也奇怪。我母亲说是我有神人搭救，是我该得不死。但那也自然是一种潜在意识的作用了。分明是失了意识的我，我卧在床上偏偏会喊出：“我要吃姓赵的药！我要吃姓赵的药！”我们母亲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不可思议，吃姓赵的药最后是母亲作的主，她是照着我的要求决定的。父亲呢？他完全没有主宰了，他只是听天由命。假使吃了是死，那不吃也是死。所以他也赞成吃了，是一种绝望的赞成。

出乎意外的是吃了姓赵的泻药，病情并不见增加，而且果如所料，泻的次数减少了下来。大夫主张还要吃，一连吃了六服，大概是两天一服的光景，这也差不多有两个礼拜了，我那时候下的只是一个两个很小很小的黑结，臭气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我的意识渐渐恢复了，我自己也晓得臭味了。那种黑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甚么东西，或者是那肠内的结痂的排除

罢？在这时候那姓赵的还要用下药，父亲便再没有依照他的主张了。大夫把药方开好总是不用，用的是父亲自己处的药方。这或许也是我该得不死，是我父亲把我搭救了。肠伤寒在那脱痂期中是最容易发生肠穿孔、肠出血的危候的，假使在那时还要继续用泻药，那会得到一个甚么结果，真是谁也不能预料了。

高度的热候渐渐地平复下来了。我差不多有三个礼拜水米不曾沾牙，我是骨瘦如柴的。到我能够起床，能够坐着不发生动摇，也好象还经过了三四个礼拜。不幸的是并发症发作了。耳朵聋了好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十分重听。这是并发症的中耳炎。腰部痛了好久，痛得夜里都失了睡眠，这是并发症的脊椎加里司（Wirbelcaries）。这些并发症和治疗在当时都是不知道的，虽然也吃了些汉药，但等于听其自然！耳朵的半聋，腰椎的不能久经劳动，这是我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

当我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切知觉都失掉了，但我的潜在意识却非常活跃，我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已经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进了学堂，那学堂也是考棚改的。

我在那儿住了一学期竟公然考了第一。在第二学期中我因为跳木马把左手跳伤了，不能不回家就医，但我又舍不得抛荒了学校的学业。后来我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便是把手切下来送回家就医，我自己仍留在学校里。

就这样昏昏瞀瞀、似梦非梦地继续下去。一时好象看见自己的左肘挂在父亲的床柱上就医，脱离了躯干的左肘已经

枯黑了，自己不免有些感伤。同时自己也觉得好象有些不合理。

但一时又站在上海城头看东海日出。那时候我以为上海是在海边，只要立在城头便可以看见海。茫茫的一片大海从城下一直迷漫出去，一望都是云雾。在那云雾当中昏昏瞀瞀的一轮红日。这便是所谓东海日出的光景了。但过细的看，又好象只是立在嘉定城头看青衣江上的旭日。

自己的左肘在家里就医，在上海的身体不免时常想回家来看看。正在疑惑着：太远了怎么可以回去？但一转瞬间又已经飞回到家里了。飞回家时是要经过巫峡的，很想在飞回上海时看个清楚，但总是云雾层层的，看不清楚。

有时候好象有一位朋友把我引到一家人家去，一进门才晓得是娼家。我便责骂了那位朋友一场和他绝了交。

有时候又好象因为自己的书法很好，被那一个的国王看中了，便聘请我去做客卿。因为我爱菊花，便替我修了一个菊圃。我住在一座玻璃亭子里面，四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菊花。

就是这样的好象有联系好象又没有联系的不规则的幻想，时隐时现，一直缠绕了我好几天。我在梦中就好象过了好几年。

六

三月了。

学校正在举行临时试验，家里打发了一乘轿子来接我回

去。因为在去年年底死了的大伯父要上山了。

我们大伯父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得了痨症，真是亏他调养，他一直活到六十二岁才过世。

试验要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才能完毕，完毕了动身出城时已经是三点钟了。

三月的天气很短，抬我的两位轿夫，一个叫吴长发，一个叫张老大，都是我们乡里有数的老轿夫。他们抬着我走不上四十里路光景，天便黑了下来。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便下来让轿，让他们抬着空轿子走。那两个老先生真是没中用，抬着空轿子都走不赢我，一直便落在后边去了。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天色渐渐地黑到快要伸手不见掌了。我是从来没有走过夜路的，路又非常的寂寥，沿着大渡河走差不多三五里路都是渺无人烟。大渡河的流水活落、活落、活落地在那黑暗中流着。靠山的一面不断地有风吹林木的声音。

路愈黑，愈见增加着胆怯。一面怕有强盗乘着夜阴出来抢劫，一面又在怕鬼，虽然自已并不相信有鬼。路上黑森森的林木都好象活着的魔鬼一样向你袭来，只是使你的毛骨悚然。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时，怕强盗的心理又要占优势了。到那时又只好放轻着脚步，凝集着呼吸，一样毛骨悚然地悄悄地走过。就这样，我走了二十几里路，走到酆都庙了。

酆都庙的村落是在一个山坳里，平时我们很忌避那个地方。在小水天的时候，村前面一个大大的水湾现成沙地，人们就在这沙地上取捷路走过。

我走到酆都庙了。没有灯亮一人还要走十五里路，我终竟没有那样的胆量了。但我同时也放大了胆子走进了酆都庙的市街。我有两种想法。我想那两位老轿夫走到这儿一定要上街买灯火的，我不如在那街口的一家么店上等他们。万一他们不来时，不买灯火我也不敢再走了。

我上街去走到一家卖蜡烛的店里。这儿刚好有几位我们场上的人在做饭吃。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好象是"礼"字堂或"智"字堂的兄弟。他们见了我非常的亲密的。

——"哦，八老师，你是回府吗？"

——"是的，我路走黑了，我来买灯火。"

——"你为甚么没有坐轿子呢？"

——"我让了轿，是吴长发、张老大抬我的，他们抬不动。"

——"啊，是那两位蠢棒？"

他们和我谈了一阵话，我坐在门口等那两位轿夫。他们的饭弄好了，无论如何都要请我去吃。我不得已只得领了情。有一位铜河上游的铜街子的某老大伯爷，他们替我指识了，我便和他两人坐在上席。那老大伯爷真是老，须眉一切都是雪白的了，他非常客气。

我把饭吃完了，又坐在门口等，但那两位轿夫却不见来，我心里有些着急了。

——"八老师，你是在甚么地方让的轿？"

——"还没到罗汉场的时候。"

——"哦，那吗他们一定在罗汉场吃了鸦片烟，看见天气晚了便在那儿落宿了。不然便弯道走到堰溪口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我想他们假如走过酆都庙时，无论怎样是要上街来买灯火的。但是念头一决定后，我反而踌躕起来了。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要回去时，一个人还要走十五里路。

——"八老师，我看你今晚上不要回去罢。路上很不好走。万一踏失了脚，落到河里去了，那不是好玩的。我们明天清早一大早回沙湾，我们一道走罢，连我们今晚上都是不敢走的。"

——"不走，我可没有地方睡呢。"

——"啊，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大伯爷的床很宽，可以睡两个人。八老师，你一点也不要客气。我们出门人是用不着客气的。"

——"我一点也没有客气呢，多谢你们。"

坐了好一阵，他们替我把床敷好，我便和那位大伯爷一床。

那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在老大伯的床之外还有两尊。我看着他们抽鸦片烟，把瘾过足了，把灯吹熄之后，大家便脱衣就寝。

房壁是有无数的大框小洞的，睡在床上可以望得见天星。一阵一阵的牛屎臭味。

这是一种奇怪的际遇。我一来不安，二来不惯，睡在床上只听见他们次第的打起鼾声，我自己却怎么也不能睡熟。

快天亮了罢，快天亮了罢？怎么总听不到鸡叫？这儿的乡村难道是没有人家养鸡的吗？没有鸡，狗总会有的。天将

亮时，狗或许要叫，但也听不到狗叫。睁着眼睛在床上总是不能睡熟；但又不好翻身，怕把同床的那位老人搅醒了。我渐渐感觉着躁热起来了。

啊，好容易！远远听着狗的叫声了。不一会又听到许多人的嘈杂的脚步声音。

我睡的地方，隔壁便是一条巷道。嘈杂的脚步声、人声，愈见近了，愈见近了。明晃晃的一道一道的火光从巷道中走过，这从壁缝里是看得很鲜明的。我心里又顿然感觉着一种别样的不安。啊哈，在这儿今晚上有甚么明火抢劫的事情吗？门外有猛烈的敲门声了。啊，就是抢的这家店铺吗？我的悬念刚好起来，又听见门外的人在叫喊了。

——“赵老板，赵老板，沙湾场郭鸣兴堂① 的八老师……，”

啊，救命菩萨！我刚好听了一半便从床上跳起来了。

——“哦，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在外边叫门的分明是我父亲的学徒朱先生和我家里的用人刘老大、刘老么的声音。这当然是我家里派来接我的人了。

我一起床，房里的人大家都醒来了。赵老板和老板娘也起来了，他们把门打开，朱先生、刘老大、刘老么还有其他的人都同声地叫道：

——“啊，八老师！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怎么？家里出了甚么事情吗？”

——“张老大、吴长发抬着空轿子回去，老太爷、老太娘，

① 作者曾祖父郭贤琳经商的堂号。

都以为他们把你倒在河里面淹死了。老太娘气得死去活来。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

我回头向各人告辞了，跟着我家里来的人回去。

前途隔不上三五百步路远的光景又是一群灯笼火把走来。看见我们的灯笼火把在走回头路，远远地听见那边的喊声：

——“八老师找着了吗？”

——“找着了！找着了！”

我们这边的一群人回答。从山边的空气中也回答出一片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找着我的打头阵的人们很高兴，我起初还可以听见他们自鸣得意的一番谈话，但渐渐落在我的后边去了。沿途隔不好远便有灯笼火把，都是前前后后派来接我的人。我就象飞的一样走过，他们都掉头跟着我走。一队一队地也渐渐地落在我的后边去了。

我走了十里路，走到了陈大溪。前面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五哥的声音，五哥是去年年底从日本回来的。

——“找着了！找着了！”

——“五哥，我回来了。”

——“啊，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姆。”

我又赶过了他们，我走到了街口了。在百岁坊下又有人在叫：

——“八老师找着了吗?”

是我父亲的声音。

——“找着了，找着了。”

——“爹，我回来了。”

——“哦，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看你母亲！”

我又把父亲赶过了。走到家门口，同样遇着许多人，差不多没有时间和他们应答。我一直走进后堂，走进我母亲房里。许多人围在母亲床前，一看见我，——“啊，八弟回来了！——八哥回来了！——八叔回来了！——八老表回来了！……”差不多异口同音地一齐叫唤了起来。

母亲是睡在床上的。我把床前的人分开，跪到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没有等我说话，先开口道：

——“啊，八儿！你回来了！你把娘望得好苦呵。”

母亲的声音是很弱很弱的。母亲把我拉来，坐在她的床边。

大家谈起张老大、吴长发回家时的情形了。

原来他两个是打从酆都庙前面的沙地里通过的。他们走到离城四十里的罗汉场慢慢地吃了饭和烟，再走到堰溪口（隔罗汉场五里路远）天就黑了。在那儿买了灯火，因此便用不着走上酆都庙了。

他们走到家里才晓得我并没有回家。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也使我们家里人大吃一惊。

父母盘问他们，他们是在甚么地方和我分手的？骇昏了的两位老头子支支离离地答应不出一个所以然。

问他们是不是在堰溪口买了灯火，没有上酆都庙去？他们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又说去过。

就这样，使家里人堕入了迷宫。

他们愈受盘问，愈发慌，结果是发起抖来，流起眼泪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的父亲、母亲自然要怀疑他们把我倒下河里去了。这在一边临河，一边靠山的道路上是很有可能的。

他们回家的时候是十二点钟的光景，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快要三点钟了。母亲哭了整整两三个钟头。我们一面在闲话，母亲一面还在叹气。

母亲说："我真以为你是死了。我怎么也不甘心。你去年害了那场大病，娘好象把你再生了一场。你那时没有死，现在才被淹死，我真是不甘心。……"

我们说了一阵话，父亲、五哥才继续回来了。

还有一会天才亮，大家又才各自去就寝。

第二天清早，在母亲房里遇见我们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来之后，在今年三月初头才结婚的，五嫂到我们家里还不上两个礼拜。

母亲为我指示，说："这是你的五嫂。"

我说："我们从前是见过的。"

五嫂红着脸给我一揖，我也还了一揖。

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当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每逢休

假进城、出城，都要打从他房子面前经过。那王师母是喜欢站在门口闲望的。有时候在她的后边立着一个发才复额的姑娘，只露出半面来偷看外边。假使一看见有人经过，她便要立地躲开。有时候也可以看见这个同样的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微微把侧门移开向外边偷看。

这样的情景在现在是不能看见了。从前女子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一到十一二岁便要缠脚，蓄头，从此便不能出大门一步。要出大门要坐到水泄不通的轿子里面，和外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绝了缘。在这样的时候，外界对于人的诱惑是怎样的猛烈哟！所以虽然是百无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闺秀们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们是可以体会了。

那位发才复额的姑娘便是我们的五嫂了。照样是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只是人是长高了。但那细长的身裁，高矮适中。城里人的穿着是比较入时的，因此，新五嫂的确为家中带来了新的气氛。

在我小学校的第二学期的时候，她家里遣人到我家里来说亲，要论年龄相当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时候便已经定了婚，当时五哥的未婚妻却刚好死了。父亲把这种情形回复了王家，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定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这件事情我们母亲后来常常说起："一切都是姻缘。假使王家的亲事再迟提两个礼拜，叔嫂不就成为了夫妇吗？"是的，一切都是姻缘。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迟早两个礼拜，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与五哥的结婚自然不能说是不幸，但就因为有这样几微之差而生出幸与不

幸的，恐怕是不计其数的罢。

五哥定婚的时候是在东洋，他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中伤，说王家的出身微贱，王畏岩先生的祖父好象是位裁缝，他便对于这件婚姻大不满意。他从日本写了无数次的家信回来反对。这或者也怕是对于恋爱结婚的一种憧憬的表现罢？在他们尚未成婚之前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五哥是军人，他的性情很刚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结婚之后，伉俪之笃真真正正如胶似漆了。

在我害肠伤寒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病危的时候，王家遣人来报信，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因为那是一种急性传染症，同在嘉定城，有同受传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我们的四姐后来还说过笑话：

"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假如你们是夫妇，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

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样，就在害了这一场重病。

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们中国，从前叫作产后痨，又叫百日痨。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Tuberculosis pulmonumacuta）。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

在这儿我有两个揣测。

一个是我们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肠伤寒后得的，就象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样，她是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症。——肠伤寒患者是有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有肺结核的人经不得生产，假使一经生产，不怕就是轻症也可以立地变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险。在医药进步的国家，有肺结核的孕妇是要用人工堕胎的。我们的产后痨、百日痨，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知识，牺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还有一个是到了我们家里之后受了传染。

我们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我们的九婶也是得了产后痨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婶住过的房间，我们又不晓得消毒，这就很有受传染的可能的。

无论是那一个原因，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

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她在临终时大约看见我的幻影，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八弟！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母亲安慰她说：“你在思念你八弟吗？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但她始终坚持着说：“八弟回来了，回来了。”她还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这位五嫂和我因为年纪不相上下，我们彼此都很避嫌疑，平时是连交谈的时候都很少的。

好象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还有几位兄弟，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面押诗谜，押到兴头上来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瞬刻不离的，那晚他却为诗谜所缠缚着了。我因为要去找几本旧诗本便一个人走进后堂

去。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五嫂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儿。她看见我进来了，远远地就招呼着我：

——“八弟，你们在外边做甚么有趣的玩意儿？”

——“在押诗谜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参加吗？”

——“有三哥在那儿，我怎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儿呢，你怕甚么？”

——“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进来找诗本子。”

——“你们倒有趣，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有点害怕了。”

——“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说你有事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

她这样说了，我觉得好象有暂时留着陪伴她的义务一样，怎么也不好离开她就一人走开。

——“怎么不进母亲房间里去坐呢？”

——“母亲已经睡了。”

我走下阶沿，走到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

——“哦，子午莲都开了。”

——“可不是吗！我看着月光从壁上移到了天井的当中。”

就这样我把取旧诗本的念头抛去了，就立在水缸边上陪着她，想暂时疗慰她的寂寞。

可供说话的资料是很少的，因此沉默的时候也很多。

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会，她突然地微微笑出了声来。

——“想起了甚么事情好笑呢?”我问她。

她说:“我想起了你的相片。”

——“我的相片?”

——“是呢,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么一张相片。那时候她的父亲王畏岩先生在做县视学,那相片的当中是有他的。县长坐在正中,视学坐在县长的右边,校长坐在左边。

——“我有甚么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你看你,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说，一面也做出这样的姿势来形容。她自己又忍不住好笑,连我也陪着笑了。

——“不过,”她又说,“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我隐隐地佩服她,她好象读破了我的心。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王师什么’呢?”因为她有两位小弟弟,一位叫王师轼，另一位叫王师辙，是说要学习苏轼和苏辙①。

——“对了,我叫王师韫。”

①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散文家。有《栾城集》等。

——“是谢道韫①的韫啦。”

——“你猜对了。”

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七

大伯父的会葬过后，学校里起了一次弥天的风潮。

事情是这样。那骄气横溢的丁监学在学生吸烟室里看到了“丁平子不通”五个字的题壁。

吸烟室和厕所的题壁本是学生生活的安全瓣。学生时常受着管理人的压制、胁迫，就好象一个囚犯。只有到这些地方，他才感觉到他自己的自由，把他胸中的愤懑，或者希望，向着墙壁发泄。这样的事情你是不能够认真的。假使连这样的事情你也要追究，那学堂的管理人也就不胜其烦了。

但是那骄气横溢的丁先生却严烈地追究起来。

他把全校的学生都召集到大礼堂上，把全校的教职员也都请了来。他当着众人宣布了他在吸烟室里看到的那五个字：“丁平子不通。”他接着就是一篇演说：

——“我丁平子，三五少年也曾东渡，前年留学界闹取缔风潮，鄙人被选为四川留学生同乡会的总干事。回到上海也曾

① 谢道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女诗人。

侃侃谔谔建言当道。适因本府中学腐败，监督①秦公②受当局宠任，荣膺整理之责，来函以监学相委，以为整理本校非鄙人之力不能。鄙人难负监督秦公之雅望，桑梓之重托，勉力来就斯职。就职以来，对于学风之整饬，学生之管理，自以为已鞠躬尽瘁，当不无几希成效之可言。乃今竟蒙赐以最不名誉之'不通'二字！夫以大通而特通之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我丁平子，乃受本府中学的一通不通的学生们称为'不通'呀，这在我从大通而特通的日本留学界犹称为通之又通的丁平子，岂不是奇耻大辱吗？……"

就这样，以他那尖锐的洋钢签子的声音，在"通"与"不通"的几个字上，翻来复去地做了一篇翻案。接着又把他讲了一两个学期还没讲上两三千字的世界地理的讲义——章太炎风的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他当着众人辞职，说：限于三天之内，把那写字的人寻出来处分。如若不然，他便永不回校。

丁先生辞职！这可不得了，这简直好象国王退位一样。

学校把课也停了，一方面教职员举代表，学生举代表去挽留，另一方面教职员私下密查，学生自行检举，寻找那写"丁平子不通"的人。真好象秦始皇找博浪沙投椎的勇士③一样，一学堂都闹翻了。找了三天，那个人竟公然被找了出来，那是我们乐山县的学生刘祖尧。

其实那"丁平子不通"的五个字究竟是不是刘祖尧写的，

① 作者原注：那时候校长称为监督。

② 指秦不基。

③ 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还是一个疑问。虽然有些与丁平子同县的学生说是亲眼看见刘祖尧写的，但他自己是否认的，在壁上用粉笔写的字，谁也难把笔迹认准确。然而学堂的办事人却高兴到了万分，当晚就把刘祖尧斥退，逼着把他的铺陈行李送出学堂。一方面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才又出去把那夫子去堂三日而就宿于旅馆的大通先生迎接回来。这时，丁大通先生真好象凯旋将军一样。

啊，好不威风！学堂是监学的江山，学生是办事人的奴隶！

刘祖尧是我们换帖的朋友之一。在小学时张伯安、吴尚之和我的换帖行为渐渐展开，在中学堂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好几个人了。刘祖尧也是其中的一个。

象这样由于莫须有的文字狱便牺牲了一位好朋友，这叫我们怎么能够心服呢？但是学校的高压、丁平子的严威、学生的众怒，谁也没可如何。因此，我们对于丁平子的怨恨是与时俱进的。

转瞬之间也就到了暑假。学年试验已经完毕，我不两天也就要回家去了。伯安、尚之跟我饯别，在那天晚上我们同在土桥街的意如轩吃酒。

尚之那时候也考进中学了，他在乙班。伯安是自始至终和我同在甲三班的。

因为都是喜欢酒的人，我们好象吃了好几样酒，外来的绍酒、白玫瑰，四川的大曲、高粱，一样都吃了一点。吃得并不多，但因为是混成的原故，却早早醉了。

醉了，把尚之送回家，我又到伯安家里去谈了一会，伯安雇了一乘轿子把我送回学校。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睡了。有一位同学来谈起了刘祖尧的事，这便引起了我一腔的悲愤。一年以来压在心头的怒火，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破口的骂丁平子，骂他是专制魔王，骂他虚骄，骂他稚气，骂他没有学问，骂他不通，差不多足足骂了两个钟头，把甚么都给他骂到了。

我的窗外愈拥愈多地拥集了无数的学生。丁平子听说也到我窗外来徘徊了好几次，他终竟也把他的怒火爆发了。

待我渐渐清醒起来的时候，学校又由丁平子一个人闹得天翻地复。他也一样地骂我，骂我没有家教，骂我倚仗父兄的势力侮慢师长，骂我破坏校规，骂我不知羞耻。他把对待刘祖尧的态度来对待起我来了。那就是把他一人的去留来胁迫着校长开除我。

不过这回他却受着了意外的障碍。

第一是我们乐山县的教员们极端反对。经学教员黄经华先生、国文教员李肇芳先生、东文教员魏文通先生，都说是有望的青年不能处以绝路，并且是酒醉了的人，便是国法也应该减等。最有趣味的是黄经华老先生，他说：

——“丁先生，郭某为甚应该斥退？”

——“他的罪过那样地鲜明，你还要问我吗？”

——“是不是说他吃醉了酒，骂了你？”

——“自然！”

——“他是年青人，又是吃醉了酒的，不能够和他计较；你是先生，又没有吃醉，你不是也狠狠的回骂了他？”

——“那吗，请秦监督免我的职！”

他一冲就从那最高一层的教职员会议室冲了下来，在大礼堂后边劈头便碰着张伯安。伯安是听见我生了事，从家里赶上学堂来的，他也是有酒意的人。

——“甚么！丁丁儿（丁平子的混名）要斥退吗？我和他势不两立！”

丁平子听了这话当然又是一肚皮的气。他刚刚走到礼堂，劈头又碰着帅镇华，他是我们小学堂的先生帅平均的儿子，大约也是吃醉了罢，他也很大声地叫：

——“丁丁儿要斥退老郭，我要以手枪对待！”

丁先生更忍耐不住，气冲冲地又跑回教职员会议室。那时候我正在那儿，我已经醒了一大半，被两位同学扶着，要我在校长面前陈辩。

丁先生很高声地叫着进来：

——“哦，秦先生，秦先生，不得了，不得了！我办了一年半的学堂犯了死罪，竟公然有人要枪毙我了！你看，这还了得？这学堂还可以办吗？……”

他一眼看见了我，又象燕子一样，一翻身又往外边走。

——“郭某和我，势不两立，我在这儿斥退不了他，我要上省去告；我在省里告不了他，我要进京！”

那时候嘉定还没有电灯（就是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会议室里点着一盏挂灯，在桌上还高烧着几只洋烛。烛光和灯光射到室外的天井里，那儿依然是薄暗的。丁先生的剪了的头发还没有长齐，刚好披到肩上。他又矮，走路是一跳一跳的，因

此他的头发便在肩头上一披一披地披打。我从薄暗的光中醉眼朦胧地看着他的背影，我隐隐自咎起来。我好象欺负了一位比我还年青的小兄弟一样。

事实上丁先生也未免太年青了！吃醉了酒骂人，这在我本来是一种恶德。但是你被骂的丁先生也应该内省一下，你到底为什么受骂？假使你内省不疚，那小孩子的醉态就象蜉蝣撼大树，何损于你的泰山北斗呢？但他偏偏要和我那样计较，我现在除我自己甘愿认错之外，觉得你意气用事的丁先生也未免错了。

丁先生遇着了两重障碍，教职员一部分的反对和学生的反对，他当时终没有能把我斥退。第二天他回他的荣县，我也回我的故乡去了。我的斥退便成了悬案。校长的意思是只要丁先生不说话，他是可以不斥退我的。问题就在丁先生一个人身上了。

我以待罪的身份回到故乡，不消说是不很愉快的。但我父亲好象没有前次在小学校被开除时那样担心了。我们三哥那时在做铁路路股调查委员，由省城派到荣县去，父亲还请他和丁先生私下交涉，只要学校不开除我，便把我送到成都去就学也可以，请他不要追究。但三哥还没有到荣县，丁先生已经得了急症，一命呜呼了。

听说丁先生得的是喉症，刚好一晚上便死了，话也不能说出一句。他的夫人不久也得着同样的病相继死了。

丁先生一死，那我的悬案便无形消除。暑假过后，我又公然回到了学堂。那时候一般的朋友真是高兴，特别是在第二学

期中说了一句“肝筋火旺”、便被他斥退了的易老同学。他那时候已经在成都存古学堂①读书，暑假后上省时我们在城里会着。他说：

——“你的星宿高，硬把丁丁儿克死了。”

他总是离不了这种俗调。他还说：

——“丁丁儿那张尖嘴平生带过太带多了，所以死的时候连话都不能够说一句。这是活眼现报。”

其实丁先生的急症毫无疑问是白喉症（diphtheria）中最猛烈的一种，毒性化脓。听说他的喉膜带灰绿色，这正是确证。乡里人就因为他不带白色，所以便相传以为是奇症了。

白喉症的传染性是很厉害的。不幸的他的夫人也成为了这同病的牺牲。

八

但我在嘉定中学堂就在一九〇九年的上半年，终竟遭了斥退。

中秋过后不久的一个礼拜日，我同好几位同学到乐山劝学所里去了。那时候是魏文通先生在当视学，我们去帮忙制造表册。从清早九点钟起制到午后两点钟，才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从劝学所退出，沿着城墙边正想走到萧公庙去看戏。

萧公庙在城的正南丽正门内，劝学所是在城西的白塔街。

---

① 清末为“保存国粹”而设立的学堂。建于一九〇五年，是四川国学院的前身。

我们沿着大渡河畔的城边走去，途中是要经过王爷庙和铁牛门的。

走到王爷庙的时候，看见里面驻扎的粮子们正在准备武器，好象要和甚么人作战的光景。

我们看了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那时峨边厅附近出了乱子，在此驻扎的营防已经下了动员令，不久就要出发。

同时有零碎的散兵迎面络续跑来，有的把包头打散，有的把上衣脱了，情形颇有几分狼狈。还有一两个警察，也拉着他的哭丧棒跟着飞跑。

我们还在笑。我说："这几位英雄为甚么弃甲曳兵而走?"

我们再往前走。刚走过铁牛门，前面城墙上就象海涛一样，黑压压地涌来一大群人，为首的都是嘉定中学堂的学生。看这个光景，不消说又是惹了事了。

——"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

我们接上前去探问。同学中有好几位争着把情况说了。结果是不出所料，在萧公庙的戏场里学生和王爷庙的粮子发生了冲突。

两方面都是群众，而且两方面都是很骄纵的群众。从前有句俗话："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这是说这两种群众都是不好惹的。嘉定中学的学生闹事很有名，他们的不好惹正不亚于从前的考试的童生。但是王爷庙的粮子又正是要出阵的时候。

这两件不好惹的东西闹起事来，双方都诉诸武力。打呀，打呀，打呀，把一个戏场打得落花流水，双方都打出重伤来

了。我们有一位同学打得吐血，听说有一位粮子也打得半死。粮子的一边终因为众寡不敌先逃走了。

许多同学就簇拥着那受伤甚重的一位同学向我们走来，他们要到王爷庙去和那儿的营长理论。

我们尽力阻挡着他们。到这时候，那士兵们为甚么在准备武器，我们才知道了。

"去不得！去不得！那儿已经在准备武器，你们簇拥起过，他们开起枪来，那不是好玩的。"

同学们听了我们的话镇静了下来。我们主张先回学校，和办事人商量好了之后，再作办法。

那时候，校长回到他家里去了。我们只好找着教务长张先生，监学詹先生。

学生见教职员是怕惯了的。每次闹事，凡是当代表的人总是要遭斥退。把张先生、詹先生请到礼堂来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候又是我逞强。我是并没有在场的人，我偏又代替他们把当时的光景报告了。张先生和詹先生都很表同情，就说非去和他们长官理论不可。他们自告奋勇，担任去开谈判。我们的要求是：

1. 要那营长亲自到校来陪罪；

2. 要斥革那肇事的粮子；

3. 要对于受伤甚重的某君赔偿医药费。

这三个条件，两位先生也答应拿去和对方接洽。大家也以为这次总可以见些效果，可以扬眉吐气了。但结果是和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两位先生走回来的报告是：

1. 营长因公上省，现在是副营长负责，公务甚忙，不敢擅离职守；

2. 在国家有事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开除弟兄以涣散军心；

3. 对方的受伤者比我们的更重，他们两位先生还去慰问过来。

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反而是我们学校派了当事人去赔罪了。这不消说是不能够使学生满足的，要求那两位先生再取强硬的态度重新谈判。但我们那些先生终不愧是待人宽而责己严的古之君子，他们把在军门面前倒折了的威风却在学生面前恢复起来了。他们大大地责备了学生一场。但弄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上课了。

由校外的风潮转变成了校内的风潮，教职员和学生都只好静听校长回来解决。学校派了专差往犍为县去接校长，在第三天的午后校长回来了。

不公平到这一次的斥退，那真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

校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挂了一道牌，斥退了八个人，记了好几十名大过。

被斥退的八个人中是有我的。但最残酷的是把那位受伤甚重、平常十分驯良的学生也斥退了。张伯安的斥退大约是曾经帮助我骂了丁平子？再老好也没有的我的一位堂兄，那天看戏虽然在场，他还受了误伤，但也遭了斥退。

后　话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间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途中都已经感觉着厌倦了。在这儿是可以成一段落的，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

没有甚么可说的了。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

——"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

1929，1，12，校阅后记此。

---

① 《我的幼年》出版后，被上海国民党检查机关查禁。一九三三年上海光华书局再版时，改名《幼年时代》，将最后两行删去。一九四七年作者将本篇编入《少年时代》时，恢复这句话。

反 正 前 后

(1910—1911)

发　端

一年以来从未接到过未知的朋友来信了，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天上的太阳失掉了它照耀我的自由。不过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近来直译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童年》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为怎样，我总觉得这种现身说法的文字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写的时候当然更会贴切一些；第二，读者读的时候，他可以单刀直入的便认定了一个社会，而知道这不是“小说”。有的人过于偏僻，好象以为文笔一叙到自己身边上来，便不是我们阵营里的文字，其实这是错误。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观点来作一切的批判！关于这一层我觉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这部新作，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记述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在你的童年时代其实并未完成。这个转换在反正前后才得到它的划时期的表现，在欧战前后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进展，余波一直到现在。然而，它的转换终久没有完成，而且注定地是永远不能完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肯允许。这是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的大好地盘是不能让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起来占领

的。所以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便只能做帝国主义者的买办，而中国便永远肩荷着一个半殖民地的命运。这个命运果真是永远的吗？不！解决这个永远的诅咒的威力无须乎细说，中国总是在飞跃，总是不能不飞跃。自五卅以来，年年的事变，不已经铁石一样地证明了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你想继续写下去的反正前后或欧战前后，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无非也就是想叙述这些铁石的事实。同志，你假如是这样，我希望你迅速地写下去罢！听说你的《反正前后》将由某书局出版，我想这一定是《童年》的续篇，我正伸长着颈子在等。我还希望你把《反正前后》以后的东西越快越好地发表出来。

这样一封很简单的信，这里面包含有多么鼓舞的力量呀！我的这部自叙传的工作自从去年四五月间把幼年时代写完之后便把它丢下了，丢了已经一年。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换句话说，便是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假使白费地写作一些无意识的文字，这写作本身就是一项罪恶。这是使我踌躇的一个重大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未知同志的这封来信！

"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在写者自身可能是苦心思索得来的结果，然而在认识明了的人，这个真理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于他的言语之间，没有半点矜持，没有半句"直译式"的文句。我也读了不少直译式的文章，但没有得到过这样一句话的力量。

好的，未知的朋友，我感谢你的鼓舞，我就接受你的劝告。我现在又提起我全部的勇气来继续这项工作了。总之，我要尽我的力量写。当然我同时也不能不照顾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浓，也不要成为一杯苋菜水！”

这样是我现在所受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言论所受的条件。我们的一句话要透过一道迷宫，然后才可以发出声来。我们的一个字要加上一层方解石，然后才能反射出光线。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多么可以讴歌的自由时代哟！

我现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无须乎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我就把这部书来做为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说闲话了，下面便转入《反正前后》的正文。

第一篇

一

从前的人说：吴牛喘月，蜀犬吠日。这是说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阳的光威没有遮拦，所以江南的牛见着月光都要喘气。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见太阳的时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见太阳也要少见多怪地狂吠起来。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文人的夸张罢了。

江南诚然少山。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沪宁路或沪杭路上，你从火车窗中望出，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亩，就如象在海舟中瞻望大海一样，一直展开到远远的地平线而隐没下去。在这时，太阳光是和暖的，明朗的，眼前的大好平原真真是一片锦绣。在这时，你会暂时忘机，觉得中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葱翠着。田畴中工作着的农人、圆草亭中拖着水龙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象是世界的主人。

四川的中央部其实也和这样的光景差不离。

四川是一个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虽然不曾去过，但从地图上看来，从各道的水脉看来，四川是四面都是山，在中央包含着一个坦平的地面。这个平原究竟有多么宽广，在不

曾去过四川的人，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我自己生长在峨眉山下，是在四川的南部。从我的家乡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经是比较平坦的，并不是怎么崎岖。嘉定城内外虽然有些丘陵，但离山岳的气味便已经很远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们的背后渐渐低远下去，渐渐浅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县治，便全部消灭在天空里去了。由此以后的两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围四际远望，无论在那一方面，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儿山影！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事实上中国的富源——专以农业来说——除江浙以外，便要数到四川。自从黄色大龙旗改变成五条颜色以来已经十七八年①，四川拥抱着一二十个大小军阀，人人都有百几十万大兵，年年都要闹一两次内乱，然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公然还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于四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时候，用阳历来说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能够到成都去，是要多谢嘉定府中学堂的斥退。

① 清末以黄底蓝龙旗为国旗；辛亥革命后至一九二七年，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条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在嘉定读书的时候，由于学校的腐败、教职员的腐败，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方法可以满足，有时是自暴自弃地朝堕落的路径上走，有时又只好耽读一些古代文学和小说传奇一类的东西。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样迫切哟！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甚么，究竟有甚么好学，在当时不用说毫无明确的意识。

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尸一样，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他是没有一刻宁静过的。然而我的父母却坚决不允许我走。我受着那样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这回，我家里人无论怎样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学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十月。

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镇压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我和张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象那样凑巧的，我相信是不会有的。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学校挂了我们的斥退牌。我们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学堂门，有一乘四轿抬进了中学堂的辕门。前面一个跟班捧着一个很长很大的朱红纸的名片。我们起初以为

怕是甚么省视学或者委员来了。但看那四轿后面挂着一对灯笼，用红色的匾体字，一边写着“四川提学使委任”，一边写着“嘉定中学监督严”。

——“这才奇怪啦！嘉定中学会跑出两个监督来！”

然而事情也并不奇怪，委实是一位新任的监督前来上任。这对于学校的办事人们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我们学生子又是一阵霹雳后的一片晴光了。

新监督是洪雅县的老举人。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突头突脑地撤换了旧监督，这些情由我到现在也全不知道。新监督是一位胡须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你看到他那种走马上任的神气，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败。但这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严重打击，就好象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老先生是非常欢迎的。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监督，请他立刻进堂主持，要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八个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几十名的大过。严先生都一一答应了。——不消说他是乐得做人情的，中国旧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严先生已经来了不少的新教职员。但是严老先生说：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为秦监督还没有准备，要到第三天才能办交代。

这几天中的学生，当然就跟新的女蜂王出现，蜂子闹分窝时一样地闹杂了。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以前的教职员都不敢出头，都知道自己要遭替换，已纷纷向旧监督辞职。就在我们被斥退的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学校

的后门搬出去。那位旧监督秦先生，因为是责有所在，不能不留在堂里办移交，那真够他煎熬了。他一进一出要受学生们的冷嘲热骂，然而也不能不忍耐着装聋卖哑。

由旧式考棚改成的学校，礼堂就是从前的大堂。大堂前面一条很长很宽的空坝已改做操场，两侧有扶手的栏杆。

第三天上移交办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礼堂后面送出。随后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从礼堂后面走了出来，严老先生在后面送他。

两边的栏杆上都站着学生，看见两位先生走下了礼堂，便一阵的鼓掌声，一阵的万岁声。但这鼓掌声和万岁声决不是对于甚么人表示欢迎和欢送的喝采。可怜那秦先生把他古铜色的面皮青一阵紫一阵的头也不敢抬起来，眼也不敢侧视。我想，古人所谓绞肠的痛苦，怕他这时候正在经验着罢？他的心脏最初一定兴奋过一时，使他觉得全身发烧；但一回头又紧缩得好象要断气，使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当然要痛恨那位严老举人。但在这时，他不一定痛恨他夺了自己的饭碗，倒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过于委迟。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谢的，在他踏完了那长操场的最后一步时，他要感谢那操场幸好没有再长。

不过秦先生的报复，他也早就预备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后，学生便簇拥着严老举人要他立即取消我们的斥退牌。他这次当然也无可推诿了。他立地叫人检查案卷，才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实。原来前任的监督早知

道他自己一走，学生们一定要要求继任者取消我们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们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监督突然来接事的那天的下午，把我们斥退了的八个人禀报上去，通饬全省了！这对于学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我们被斥退者尤其是一个绝望的打击。在当时斥退了学生，挂了斥退牌还要下通饬，这简直是一条绝路。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从此便不能在本省读书了。秦先生这个报复手段真是毒辣。他不仅断送了好几位学生的前途，而且还断送一位同学的性命。

那位带了重伤的同学，是洪雅县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平常很用功，很守本分。他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自修课程，便是每天要读英文字典，至少要读二十个字来暗记。象他这样用死工的人我实在是少见的。那天他真冤枉，学生们在和粮子闹事的时候，他无辜的受了重伤，打得当场便在吐血。那昧尽天良的办事人，就以这为他在场闹事的证据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谨人遭了斥退，已经使他伤上加伤。但幸好和他同县的新监督来了，以为有法挽回，他也就暂时得到安慰了。谁料斥退他的人，还把他禀上去了呢？这个消息一传到他的耳里，可怜他的内伤大裂，竟至开仓大吐起来。他始终爱说一句英文："You see, I am killed! You see, I am killed!"①除此以外并没有二句话。不消说他已经失掉了他的本性。

这位同学就在开仓大吐后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县

---

① 作者原注："你看，我被人杀了！你看，我被人杀了！"

去的肩舆里面。

当时办学的人对待学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好象是在管理死囚。这个往事，回想起来真不免令人痛心。

不过我自己是应该感谢的。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饬，那也更好。因为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

二

我往成都去是和五哥同路。我们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岩先生的家里。王先生在我进了中学之后，他曾经在省城的分设中学做过两年的国文教员，他是才卸了任回来。他便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分设中学的他的旧同事。

在王先生家里耽搁了一天，第二天就动身。我们雇的是长途轿子。在当时轿夫的脚价一个人一天只要一吊钱光景，每天平均要走八十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时分便到达眉山。眉山是苏氏父子的故乡了。地名虽然号称“眉山”，其实隔峨眉山已经有两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只剩下一些儿若隐若现的影子了。城里有一座三苏祠，但是关于三苏，特别是苏东坡的遗迹，却甚少。嘉定倒还比较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途，从这儿以上，风气便渐渐感觉着不同了。最显着地令人感到变异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种很原始的交通工具名叫“鸡公车”。这是一种独轮车，车夫在后面推送，和上海一带的小车子“一轮明月”有些相象，但更小，更矮，只能坐

一个人。车柜上缚着一张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对着前面。这种鸡公车非常多，有时候一来一往在路上连成着一条很长的直线。叽呀叽呀的声音非常聒耳。这种鸡公车在眉山以南是没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这种简单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正足以证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样，是一望平原了。

鸡公车虽然很简单，但它是破坏道路的健将。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这些原始的车轮纵横地拖出辙迹。下雨时满路泞泥；天晴时崎岖不平。在这种道路上，有时遇着一个小小的石子，鸡公便立地跳起来，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抖落在地上。然而坐在这种小车上，公然也还有能够睡觉的人。你可以看见有些颤巍巍地挺在空气中的上半身，就跟风中的竹尾一样，东倒西歪，或者前颠后簸。

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双流，这些都是县治。它们有甚么特色的地方，我现在可记不清楚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动身，走不上半天你便可以到达成都。进成都自然是由南门进城，但你在离城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便可以望见道旁一丛很葱郁的树林。那就是有名的"锦官城外柏森森"① 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庙门坐东向西，门内庭园中参天的古柏，虽不必就是汉时之物，但有的总怕是有五六百岁的年龄。

初到成都的时候就在这庙门口息了一次肩，我们进里面

① 见杜甫诗《蜀相》。

去瞻望了一下。里面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圃，有无数名人或不名人的题咏。顶多要算是对联。但是说来说去，总不外是三分六出、三顾两表①之类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②的坟在祠的南苑。坟的附近更有三义祠③。全体的建筑是相当巍峨的，碑铭也特别多。这儿对于专治考古学的人想来会是一项很现成的资料，特别是那昭烈帝的坟。那假使发掘出来，总可以得到一些古物，足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的罢。我想中国现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应该发掘，使那内藏的宝物重见天日。假使以为古迹须保存，问题却非常简单。发掘了之后依然给它一个墓堆，自然是无损于旧观的。然而出土物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是会有重要贡献的呀！不过，主要的是出土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于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观的观点上去整理，去清算我们中国的古代以来的社会的进展。这事的实现，当然不是一天一日可以说到的。

到了成都，我们住在一家嘉定人惯住的旅店里面，张伯安已经比我们先到了两天。这时候是正月尾间，各学堂都络续在开课了。

我们进甚么学校好呢？有没有希望得进省城的学校呢？

---

① 三国时诸葛亮故事，即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三顾茅庐、前后两出师表。

② 即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蜀汉主，谥昭烈皇帝。

③ 祀三国蜀汉刘备、关羽、张飞的祠堂。

小学时代的杜绍裳先生，这时候在做提学使衙门的科长，不消说他便是我们唯一的军师。他替我们考查了案件，知道我们是被禀告上去了。然而没有下我们的通饬。这就很有希望再进别的学校。他劝我们考中等工业。他说我们只要把名字一改，便甚么都不成问题。他之所以这样劝告自然不外是“实业救国”的意思。不过关于这层，我们五哥和其他的同乡们都不甚赞成，以为这样是旁道。这旁道的意思是对正道而言。所谓正道，要象从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一样，是要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我们——我和张伯安——也觉得自己心不甘。因为中等工业的招考资格是小学毕业程度，而我们是有中学两年半的学历的。我们都不大喜欢，杜先生也就不好勉强。结局我们还是先去找中学堂插班。假如这一条路绝了望，我们又再来投考中等工业。

我们便得到好几封介绍信，大都是杜先生亲自给我们或是他替我们斡旋的。照他的意见，我们须得先说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来插班的。这层或许是他要卸掉他作为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责任。我们也觉得这样爽快些，免得后来进了学校之后发生甚么问题。

我们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负盛名的分设中学了。

这分设中学在南校场高等学堂的旁边，本来是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因为前任的校长刘士志① 先生不甘受“附属”的名义，才改为了“分设”，成为了一种半独立性的学校。由于是

① 刘士志(1867—1910)，名行道，四川达县人。清末举人。

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经费充足，设备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学堂的设备），又加以刘士志的声望，所以学校也就很有声望。

我们到省的时候，刘士志已经被逼到北京去了。他之被逼到北京也就跟我们被逼到省城一样，是由于和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①发生了冲突。事情的详细我不十分知道，好象是在年底省城开运动会的时候，在会场上抵触了那位总督部堂。这样能和总督部堂冲突的办事人，是很可以博得人们赞奖的。刘士志待学生也很严烈，却是很能得到学生的敬爱。但可惜他去北京之后不久便在都门病死了。

我们去投考分设中学的时候，新任的监督姓都，名叫静阶。他的姓很奇怪，他在社会上赢得一个绰号（并不是学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面孔也有点异乎寻常。八字胡须，棕黄色的面皮，额部很突出。戴着一顶平顶的便帽，珊瑚的小红结子。一切的动作都有几分机械式。

我们拿着一些介绍信去见喇嘛先生。我们填写的谒见单，由传事房递上去之后，他立刻就传见我们。还有一位国文教员郑先生，是王畏岩先生的同事，我们听说他还留在学堂里，便把王先生的介绍信也交给传事房传进去了。

都先生接见了我们，他只把介绍信看了一遍，便问：

——"你们带笔墨来没有？"

这一问真是来得突然。我们答应道："没有。"

他说："唔？你们怎搅的？怎么来考插班都不带笔墨？"

---

① 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清汉军正蓝旗人。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尚书等职。一九〇八年任四川总督。

这愈见使我们诧异了。我们以为我们是斥退生，虽然有人写介绍信来，但信的内容我们是看过的，只是说“有无相当的班次准予插班”，怎么这样的容易，才拿起信来就要叫我们受试验呢？

——“我们没有想出先生今天就准许我们受试验。”

——“唔，今天不受试验，要等到几时啦？同学们都在上课了，你们没有看见吗？你们的光阴好拿来晃荡？”

正当他在这样教训我们的时候，郑先生也出来了。他向我问了些王畏岩先生的近状。回头他把王先生写给他的介绍信转递给都监督。都监督接到手去也看了。

——“好的，郑先生，你来得恰好。我就请你出一道国文题来试验他们。”

——“今天就试验吗？”

——“是的，今天就试验。”

——“在甚么地方好呢？讲堂没有空的呢。”

——“就在这儿好了。咹，不要用甚么讲堂。”

——“好的，我去向曾先生（学堂的监学）说，请他们备两份卷子，我同时把题附在里面好了。”

郑先生说了便告辞着退进去了。

回头都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带笔墨来，同学里面有朋友好借用的没有？”

我们说：“我们初来，没有朋友。”

——“好，那我就借给你们用。不过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上好的笔墨啦。”

就这样，第一天我们就受了入学试验，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①，限二小时完卷。

我和伯安两人就在会客厅里面的茶几上做起试卷来。他坐在左边的一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也没有甚么人来监考。都先生的书房是就在会客厅的右手，只有他时而出来看看我们。学堂内部每次课堂上堂下堂的摇铃声可以听见。在有一次大约是下堂铃罢，有几个比我们更小的学生在休息时间走到会客厅的帘外来，用着好奇的眼光，隔着帘子偷看我们。起初是一两个，但他们就象蚂蚁一样，进去报了信，又来了十好几个。他们有的笑着指着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着自己的毛辫。这是在奚落我们的。因为伯安是独眼，我是因为患了那场重症伤寒，头毛脱完了，还没有长齐。但等到上堂的铃子一响，他们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两个钟头的样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来接到了我们的卷子，他自己就阅起卷来。他约略看了一遍，还看了我们几眼。

——“唔，唆，你们还好，还好，你们可以进来。你们明天就可以进来。”

——“我们来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实，这个我倒还不十分清楚。你们等一等，我去请曾先生来问一问。”

---

① 语出《新唐书·裴行俭传》：“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说着他把竹帘揭开，隔着天井便向着传事房喊出：

——“传房！你进去，请曾监学曾老爷来。”

不一会曾先生出来了。都监督问他学校里有怎样的班次。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咹，文字做得都还通顺。”这是都先生说的。

曾监学很有几分迟疑的神气。

——“他们原来是有几年的学历的？”

——“哦，老实，你们是只有两年半的，是吗？”

——“是的，我们两年半还没有住完。”

曾先生说：“那吗要插甲班，年次太差远了。”

——“插入乙班怎样呢？”

曾先生依然有点迟疑：“我看丙班不最相当吗？”

——“唔，好。不过……唉，好，就插丙班罢。咹，你们今天下午就来缴学费，把一切手续办妥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学堂来。咹，不要在外边久晃了！”

就这样，我们便插入了分设中学的丙班。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终就好象在一场梦里。才由乡僻地方进省城来的学生，考的是省城数一数二的中学，而且自己是有内咎的斥退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悬心吊胆地怕不会被收容，怕自己不及格，对不住写介绍信的师长们。然而，这是多么出乎意外的容易！这是都先生办学外行，还是真的看中了我们的文章，还是几封条子的力量呢？但不管怎样，我们是欢天喜地

的，转学的问题很轻易地就解决了。

在我们进了学堂之后，立地知道这儿竟有两位旧同学。一位是嘉定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因为吃了监学先生的一碟辣椒酱油便遭了斥退的宿君，他本是和我们同年级的，然而已早来插入了乙班。还有一位是在小学校里低我们三级的罗君，他在这儿住的是丁班。我们时常在这样想：假使我们事先也托了甚么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那位曾监学，我们的中学课程，或许会提早两年毕业的？

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竟如愿相偿了。然而结果是怎样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①！——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②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③；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是国学一方面的东西，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嘉定中学的有些先生都还赶不上。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化、数学的教员

---

① 语见《论语·子路》。

② 清马骕撰。

③ 即《唐宋八大家文钞》，明茅坤选编。

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不过他对于学生很宽大，一切的问题他是不要学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说也乐得节省些精力。然而这样的教员公然还是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教课的红教习。这样的红色到真是有点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是浙江人，大约是上海那一座教会学堂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时髦，甚么海虎绒、铁丝缎，有好些是我们乡下人自出世以来才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金丝眼镜，一把抓的尖帽子①，嘴里也含有好几个金牙。他是不住在学校里的，一来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轿：因为他当时在做提学使衙门的英文科的科长。然而这位科长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么样呢？说来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为我是过甚其辞。然而始终是事实，连虚构也不容易构出的事实。我们读的是Chamberlain的《二十世纪读本》，我记得是卷二，那开始的一课是《一条 Newfoundland的狗》。我们那位英文科长，他竟不知道这“Newfoundland”②是一个海岛的名字，他竟拿出我们中国人的望文生义的本事出来，把它直译成为“新大陆”。只消这样一点便够了，我看可以不必再举例证了。

你想，在一个省会地方，充当着最高学政机关的英文科长，他的英文程度才仅仅是这么样！在当时我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

① 作者原注：四川人当时叫作京帽。

② 即纽芬兰岛，今属加拿大纽芬兰省。

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要挽救它，当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条方法了。其实这些都是鬼话。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学，结果就是资格，所谓求学，结果就是熬资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以来，它整个地把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中国的支配阶级看见自己的支配权日渐动摇，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资本制度下的利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在永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乡村中，资本制度的所谓科学文明，始终没有基地来培殖。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闹洋学已经闹了好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就连"科学"的"科"字都还说不上半边。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却已经具备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声的中学校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的中学自然是不言可喻。说到成都学界的空气，那更是在一种绝望

的状态之下。成都除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官立的中学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学校。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连小学都只住得一两年的人，只要把中学五年的学费缴足，或者再缴纳些甚么手续费，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张中学学业文凭。这样的文凭，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等于一名举人，有这样一张文凭，可以拿回家去贴报条，诓惑乡民，增长新地主的候补资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飞扬。有这样一张中学文凭，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学堂、政法学堂、高等师范，京沪各地的官、公立学校，更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法官考试，乃至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送。

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示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校的陶冶之下。你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最坏的是分设中学就在高等学堂的旁边。高等学堂在成都是最高学府，而那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员，就有不少人是买得私立中学文凭而考入的。他的年纪和

你相若，学问不管怎样，他总是你的"上级"。这对于年青人的自负心是怎样大的一种打击哟！

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坏了我脑子里面的多少细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泼在桌上，用火柴把它点燃时，它燃到没有痕迹，几乎把桌面都烧了。大曲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浓烈，但是喝起来，实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酒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并不是喜欢吃它，而是赌气吃它。一肚皮的不高兴，一肚皮的不满足，想借酒来淘泻。酒真可淘泻这些忧郁、愤懑吗？李太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① 这倒是很有经验之谈。酒是只有增长愁人的愤懑。平常，人的忧郁是受着中枢神经的制止，不准它过度表现的。神经中枢愈高级，对于麻醉剂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制止机关，人在这时便尽情地把自己的愤懑、忧郁都发泄出来，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经麻痹的表现。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识完全消灭了之后，他也可以得到暂时的一段忘我的死静，然而那酒醒后的报仇是怎样苛烈哟！酒醒后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楚。脑痛，口苦，人无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断地抽搐。惨淡的心境就好象烈火过后的一座火烧场。这到底有甚么乐趣呢？这种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觉

① 见李白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寻苦恼。我可以说，饮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换成肉体上的苦痛，更换一句话说，他是在慢性自杀而已。①

吃酒时自然要朋友，而我们是新入生，旧学生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张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欢的数学，他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满足。但是我呢？我对于数学不知道从几时起便有点畏难。那时候一般的口号是“实业救国”，所以凡是有志救国的人总不得不倾向于实业。要倾向于实业便不能不注重数学或理科，而对于所谓文学便要加以轻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艾，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们同时考插班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都监督的同乡。一位姓罗，和我们同时考入了丙班。他的学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过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学校住过几天，因为闹取缔风潮他便跟着一批中国的志士们回到中国。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住了两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长一两岁。因为到过东洋，头发是剪短了的。他是到过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学却比我还要厉害。他有一部英文的《迈尔通史》②，这怕就是表示他出过洋或者到

① 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贫穷人吃酒的我想来也不外是这种心理，自然有的因为天寒无衣要借酒来抵御的，这虽是别样的要求，然而是同样的悲剧。”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② 原名《Myers' General History》，美国迈尔（P. V. N. Myers）著。

过上海的唯一的物证。这书，他很爱惜，放在他的书匣里从来没有翻读过。他有这部书，我们又同自修室，我有时向他借阅。当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铅笔替他注在书上，他责备了我，很郑重地用橡胶来擦了。不过我对于这位姓罗的同学是隐隐佩服的。他到过东洋和上海，却公然还有雄心再进本省的中学！当年出洋留学或者在上海留学的人，不是学得几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么温”、“阿尔来”①的几句洋泾浜的“不落肯”②，就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的吗？不忙说到十几年前的当时，更不忙说到那乡僻的边陲省份，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尽有跑到美国去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吗？

总之，这位姓罗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还有一位姓李，他的态度真是彻底！他是由于家庭悲剧使他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亲，晚母对待他不好，他认为迟早是会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虽然和我们不同班，但我们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寝室。他虽然也是彭县人，家却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向导。他懒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点名时监学向床上去拉他，也拉他不动。监学把他也没可奈何。

① 作者原注：英文“number one”（第一号）、“all right”（是）的不够准确的读音。

② 作者原注：英文“broken”（不完全的、不连贯的）的读音。

他是监督的同乡，好象还有甚么亲谊，因而监学先生们对于他须得有一番格外的关照。他似乎是死了心的人。他丝毫没有向学的念头，而且还希望被学校斥退。他经常爱说："读书有什么用？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①

李同学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他不久便成为了我们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四

这几位同学们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还有些住在别的学校的嘉定同乡。我们只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时候是在城里，天晴的时候大概是到城外各处的名胜地方。

成都城外很有不少的名胜足以供我们游玩。东门外的望江楼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锦江的对岸，临着江边。那儿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筑招揽游人，最负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涛井。薛涛②

---

① 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唉，他并不仅是不怕，而且还由衷的欢迎。他的章法是：'你要斥退就请斥退罢，正合孤家之愿也！'象这样死了心的人，你无论怎样的严刑峻法你都是把他没有办法。不怕你就锯下他的头，你就挖出他的心，你就把他用硫酸来烧死，你就把他身上的肉用刺刀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凌迟碎剐，任你就用尽了你所能想到的新式的革命的刑罚，你都是把他没有办法。革命家的死了心，也就有这样的神情。死是他所欢迎的，所以你不能够把死的威胁来屈服他。不过革命家的信念自然和李同学的信念大有不同。革命家的信念是'非革命不足以救济社会'，而李同学的是'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无论怎样的信念只怕你死了心，在死心踏地的面前，一切支配者的权威都失掉了他的生命。"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② 薛涛（770—832），字洪度，长安（今属陕西）人。唐代女诗人。幼时随父流落蜀中，遂入乐籍。有《洪度集》。

是唐朝韦皋① 镇蜀时一位有名的校书，她能诗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涛笺”。传说她制薛涛笺便用的那薛涛井的水。水是很清洌的，井畔有茶店，汲取井水来煮茶以供享游客。旧式的雅人自然是时常到这井边来喝茶的。井的附近有嵌壁的题咏，可是我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望江楼好象是一座寺院的附属物，寺名好象是雷音寺，薛涛好象是在这儿落发做了女冠子的。

以往的记忆很模糊了，但是有一个记忆，特别是与望江楼有关的，却很鲜明地留存着。

那是成都办花会的时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宫和草堂寺是要办花会的。这种措施并不甚古，是在“变法自强”以后所产生出来的花样。那是一种博览会的性质，会期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

草堂寺是以杜工部草堂而得名的地方，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门出城与由西门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离。由南门出城，约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经过浣花潭、青羊宫，和其他私人的别墅。最后是到达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这条路径，平常除乡里的农人、寺院的僧侣，或极少数偶尔要去寻幽访胜的墨客骚人之外，很少人往来。但到了花会的时候，便出现着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最好你从南校场的城墙上去俯瞰——先附带着说一句，成都的城墙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墙上可以品排着跑三两部汽车。你看那城下

① 韦皋（745—805），字城武，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贞元元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二十一年。

的马路上一来一往地都是新式的马车。

浣花溪里面平常是不见有舟楫的，不知几时从浙江的西湖里面搬去了好几十只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儿很匆忙地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睁着了惊异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行道，溪的彼岸是马道。你看那人行道上的行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里去的、由乡下来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过了一群女学生，跟着就有一群男学生。平常两只脚除三合土以外从不沾地皮的人，现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

彼岸的马道沿着一些浅山，那儿虽只是一些很可怜的、被人虐待到不成形状的"溜溜马"在疲于奔命，然而都好象才从外国来的高头健步的洋马。真正的洋马，时而也可以看见。那是凤凰山的新军骑来游玩的。那样的马会看不出是马，而是长颈鹿了。

学校的规矩，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时是可以走出南校场去游玩的。我们便爱走在城墙上去看热闹。但一到礼拜日，我们便要成为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马道上的人了。马车，在那时我们是没有资格坐的，因为没有那样多的钱。

就在有一次的礼拜日，上半天在花会场上游玩了半天，下半天我们再决议骑马去游望江楼。我们——罗、李两位同学，伯安和我，此外还有些同县人——骑了将近十匹马，由南门进城，向着东门穿城而过。

马是溜溜马。这种可怜的马可以说是已经把马的性格完全磨灭掉了的。马已经是很老很瘦。它对于人类的虐待也有

不少消极的方法来抵抗。走路是异常迂缓的，你打它几鞭，它跑快几步，接着又迂缓下来。假使在它前面有一匹马，它就紧紧贴着它的屁股，“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地任你怎样打它，它都不肯抢先。这是溜溜马的差不多共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大概可以称为马的Sabotage① 。但假如你是不会骑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会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来，便一溜烟地溜了。再不然你骑在它的身上，它横着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滚。这时候不消说你的腿是很危险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条狭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动，两边都是水田，让你下了它的鞍背，也还要弄得你两脚的烂泥。

我们骑着马由南门穿过东门。我骑的是一匹黑马，这位先生比较还壮健，它零落成为溜溜马大约还不很久。我骑着它便打头阵。它也不肯十分走快，在城里不走快也正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城里人太多，走快了不能控制，反而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地出了东门，我们很想一出了城门便要驰骋它们一下了。出城之后是还有一段很长的附廓街道，不幸就在出城之后走不几步，便遇着两位兵伕牵着两条军马在街上溜达。我的马照着它们的规则，走上去接着军马的屁股，便同盟息工起来，死也不再抢先，死也不再走快。这真是有点难乎为情。前面是两匹散步的闲马，我们骑在马上便跟着它们在街上散步，两边两街的人是万目瞻仰着的。

恼羞成怒的我，施行起恐怖手段来了。我拚命把我手中从

---

① 作者原注：怠工。

南门外折来的柳条鞭子在马屁股上乱打，我的背后的伯安也帮助打我坐下的马屁股。柳条鞭子打脱了皮，打断成了几节，然而马先生的怠工依然没法解决。

“这该死的亡八！这是非用最后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来。我仅仅把刀柄的头子用劲的凿了一下，啊，这可不得了！马公暴动起来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跃起来，我死命地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约怀恨着没有把我扔得下背来，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来，一直往前面冲，全街的人都惊惶了，只是往两边让。我自己又是初学骑马的人，仅死守着一句成语“马儿跑得凶，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倒不仅“一把”，而是两把。缰绳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马儿跑凶了的时候，制马的缰绳是怎样拉法。我只是死死地两手抓着马的鬃毛，两膝不消说是挟不牢的。屁股，就跟打连枷的一样，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马鞍上乱打。自己一心怕滚下马去，一心又怕那样的奔马踏伤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来魂不附体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过，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终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没有踏伤了什么，但它还一直在奔跑，好象一直要把我带进地狱里去。

马自然知道我是不会骑马的。它的目的——报仇的目的——就是想把我扔下背来。然而它不知道在怎样痛恨它自己的项上多生了那一项的鬃毛！我死死地拉着鬃毛不放，任随屁股在马鞍上打铁，可总也绊不下地来。我的屁股打得很痛，但是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马的计策突然改变了，它自从暴动以来一直是笔直地往前奔，跑穿了街道，跑到田野里

来了。跑到一处，在路的右手边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砖墙与路向成为直角。墙畔有一条小径，与大路的路向也成为一个正整的直角。吓，那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聪明。它一直风驰电掣地跑了来，跑到这儿却真如电火一般，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转了方向。方向一转它便和石马一样死死立着了。这样一来依着惯性的法则，我无论怎样是应该被抛下马来的。然而终赖它项上的鬃毛没有被我扯脱，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这一场恶斗把我这位骑马的阶级真是制服得魂飞魄散了。亚非利加有一种黑色白条纹花的斑马，名叫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狮子在狩取这种斑马的时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项脊。斑马自然是死命地奔跑，跑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倒在地上终竟成为狮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马，在它拚命狂奔的时候，我想来怕只有 Zebra 奔命时的迅速才可以比拟罢。然而可怜我这匹狮子，虽然始终没有被扔下，但在马静立着时，我只好倒在地上睡了好一会。心脏象要爆裂，周身的骨节好象解了体，屁股特别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们是要往望江楼的，然而我这一匹单人独马，却沿着濯锦江边在河的这一面奔跑，离隔河的江楼已经很远了。同路的人，当我的马把街道跑穿之后，在河对岸看明白了，便有两位掉转头来迎接我。在他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侧的田圃上不能动弹。马大约也很疲倦了，它也没有再朝远处走，只在近处吃草。

两个人把我扶着，我才勉强站了起来。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难移的程度。朋友们没法，只好去雇了一乘小

轿，把我送到望江楼。他们两个人牵着三四马跟在我的轿子背后。

在望江楼休息了好一会，自己的精神才渐渐恢复了。

大家在望江楼上吃酒。吃酒之间自然又是满口的国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骚不平。大家在痛骂学校的腐败、办事人的腐败、学界的腐败。在我们没有出过省的人自然又要说到自己对于京、沪、欧、美的憧憬。姓罗的同学痛快淋漓地演说起来了：

——“嗳哟，四处的老鸦一般黑，你任随走到甚么地方去都是一样。欧美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到那边去的人学到一点正经学问的并没有多少。博士文凭各国都是可以用钱买的。象美国更有这种滑头的办法，只要你肯出钱，他可以给你一张甚么大学的博士或者硕士的文凭。然而这座甚么大学结果只是一种幽灵大学，它根本是没有的。中国人便拿着这种文凭回到中国来骗钱，骗官做。

——“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①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外国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单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不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然而他们反正是留学生，反正是博士、硕士，你能怎样？

——“哼，京沪的学校！几座奴才教育的教会学堂不用说

① 日本的普通客栈。

了，甚么国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学那一种不是骗鬼的地方？你想，教员只是那样的资料，学校那里会有甚么出色的？学生是一些青年人，虚荣心很重，真正有志趣向学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几个。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教科书一切都要用原本。桌子上摆着一两本原文的教科书，便好象把清朝皇帝的江山都夺到了手的一样。你想，连《National Reader》①卷二的甚么'Dear me, dear me! I am a little bee'②的儿歌都读不懂的人，那里就会懂得甚么《迈尔通史》，又是甚么麦铿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学生都象中了魔的一样，要夸读甚么原书。这样一来倒也好，学生乐得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教员也乐得遮丑。甚么，他给你一用原文来解释，天老爷明白，你晓得他讲的是那一个星球上的话？所以照我看来，还是象在本省本本分分地使用本国翻译的或著述的教科书，倒还多少有点好处。"

结论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清政府没有认真改革的诚意，所以满天下的办事人都不肯认真；更进一步便是要把中国弄好，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还有一种是李同学的虚无主义：

——"管他妈的，学校就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中国就灭亡也好，不灭亡也好，纵横老子是看不见的。我几时被人用砒霜毒死，谁个能保障？"

一面是兴奋，一面又是消沉，而结果呢，同样是年青人的悲歌慷慨。不过我始终忘不了是那匹溜溜马的暴动。它使我

① 作者原注：《国民读本》。

② 作者原注："啊，啊！我是个小蜜蜂。"

坐凳都很艰难，回城的时候依然是用轿子。

五

然而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

旧的政治势力有总督部堂、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在这些旧式的官职之外表示着新时代的影响的，要算是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了。北门外的凤凰山已经创办了两师新军，总督衙门的旁边有西式建筑的督练公所，这些都是很鲜明的时代表现。

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①，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们嘉定还卖过字的，后来不知怎样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约在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干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划成了两个区域，一处是刘玄德即位为汉中王的武担山，一处是好象在东门附近的甚么石子院（院名记不清楚）。使娼妓成为了一种公开的营业，政府从而抽取花捐的这种近代办法，在四川大约是由他创始的。

场是"劝业场"。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条半西式的二

① 周孝怀（1876—1958），名善培，浙江诸暨人。著有《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等。

层楼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业，然而开办的结果是一场都是洋货。刻薄的成都人当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评，便是“周孝怀劝洋业，发洋财”。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① 体的“劝业场”的“劝”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篋的犯人的工厂。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象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在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象日本的“帝国剧场”。当时“改良川戏”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象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这办警

---

① 赵尧笙（1867—1948），名熙，号香宋，四川荣县人。清末翰林，近代学者，书法家。有《赵香宋诗钞》等。

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象"劝业场"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一样，多半是招来了一个滑稽的后果。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而这位"萧何"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殭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

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在当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怀的这些局部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件最普遍、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化的表现，那便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建立。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线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我记得好象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

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这个脚步好象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然而这项提议终竟招了失败，终竟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这

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大约在这儿，就象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主张后一说的人多半是川东、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别是当时在四川知识界中振振有声的蒲殿俊、罗纶① 一流人物。据反对他们的人说，他们主张先修宜万是带有乡梓观念，因为宜万先修通，川东、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这或者也怕是一种理由罢。总之，事实证明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是失败了。仅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几英里的铁路，在十几年来的抛弃之中，已经随着所有一切的铁材、木材成为了废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是由四川本省人，一大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者，不仅逐步地早已实现到了重庆，而且实现到了嘉定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

① 蒲殿俊（1875—1935），字伯英，四川广安人。一九〇九年任四川谘议局议长，次年创办《蜀报》，后被选为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旋即去职。 罗纶（1878—1930），字梓青，四川西充人。曾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后被选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①。他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记了。他以他专家的资格，以他工程师的职责，做了一本为先修成渝铁路告四川父老意见书，这书我是读过的，是报纸十二开的书型，大概有一两百页的光景。他以去就力争，结果是他失败了。同时他就辞去了他的位置。象这样有人格、有主见的胡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在中国的土木工程界里便再没有看见过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还是有人格、有点骨鲠之气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终竟被埋没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象列宁②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他们是癸卯年最后一科的举人，特别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较有名，在民国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任北京反动政府的教育次长，也创办过戏剧学校，在《晨报》副刊③上还做过些白话文

---

① 应为胡栋朝（1884—？），字振庭，广东番禺人。曾留学美国。一九〇六年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后任川粤铁路工程主任，铁道部技正、岭南大学工学院长等职。

② 初版本此处为："Lenin, Trotzky"，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为"列宁"。

③ 《晨报》，研究系机关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主办。其副刊原为《晨报》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出单张，名《晨报副镌》，一九二八年停刊。

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较有才艺的时代儿，然而他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时代。

他们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四川，他们是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始终是不赞成剧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实现出欧美的立宪制度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和当时主张民族革命的一派"乱党"是成为对立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便是新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右翼。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得到新兴势力的拥护，而同时也得到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宽容，所以他们便得到了荣达的机会。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①。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②。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闹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裁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

① 邓孝可（1874—1950），字慕鲁，四川奉节人。近代实业家。时任《蜀报》主笔。　朱山（1886—1912），字云石，四川江安人。同盟会会员。时任《蜀报》主编。

② 半月刊，一九一〇年七月创刊于成都，一九一一年六月停刊，共出十二期，蒲殿俊任社长。

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①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②，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③，我们崇拜温生材④，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

---

① 孙即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创始人。有《孙中山全集》。 黄即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辛亥革命领袖之一。有《黄兴集》。

②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四川巴县(今属重庆)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著有《革命军》。

③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一九〇七年在安庆刺杀清巡抚恩铭时被俘牺牲。 秋瑾(1875—1907)，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一九〇七年与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失败后在绍兴就义。有《秋瑾集》。

④ 温生材(1870—1911)，字练生，广东嘉应(今梅县)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因刺杀清广州将军孚琦，被捕就义。

士①。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②，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象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象。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象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③，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

---

① 黄花岗原称红花岗，在广州白云山下。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八十六人（一说一百余人）牺牲，后收得死难尸体七十二具，合葬于此地，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② 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同盟会员。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有《马君武诗稿》。

③ 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四川巴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参加组织起义军光复重庆，任蜀军政府顾问。

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①，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 abcd 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象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②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③，自比克来曼

---

①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韩，四川隆昌人。一九一八年参加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与李璜等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次年创办《醒狮》周报，任总编辑。

② 克来曼梭(G. Clemenceau, 1841—1929)，通译克雷孟梭，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历任内政部长、总理、议长等职。　麦索里尼(B. Mussolini, 1883—1945)，通译墨索里尼，意大利政治家。早年参加社会党，提倡国家主义，后组建法西斯党，任首相，建立独裁政权。

③ 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咸五，下登三”。

梭，自比吾家国藩①，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②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象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眉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

---

① 即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清大臣，湘军首领。曾镇压太平军。有《曾文正公全集》。

② 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四川温江人。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著有《少年中国运动》、《东西乐制之研究》等。　魏嗣銮，字时珍，一八九五年生，四川蓬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　李劼人(1891—1962)，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　周太玄(1895—1968)，名无，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著有《动物心理学》等。

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

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喂，今天到底开会不开会哟？”

——“我们饿着肚子还没有吃中饭呢！”

——“到底是请愿国会呢，还是看你们争风？”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本来是没有秩序的一个会场更加纷乱起来。在这时学生间惯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脚。

——“好，开会了，开会了！”

发起的人几个争着叫，不知道那一个是会长，不知道那一个是主席，结局依然把会场整顿不起来，连宣布开会都宣布了好几次。

这种滑稽的现象，我想在初次从事运动的团体，大约随处都是有的。在当时不要说是学生会，就是堂堂的资政院或者咨议局都是时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坛。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岁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马褂，戴一副铁丝近视眼镜。他的穿著虽很朴素，但看他的风度却不象一位学生。

他在坛上几次想发言，也终不能如意。演坛上有两三个学生便同时大叫起来：

——“这是刘子通先生，我们请听刘先生说话！”

刘先生的名气我老早就听见过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他。他是湖北人，在铁道学堂当教习。他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就是他这声望把一些无经验、无训练的学生征服了，会场便立刻地镇静了下来。

但这刘先生是教习，为什么那天他来参加了学生的集会，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来指导，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请他来的，我都不甚明白。总之，有他的一登坛，会场镇静着了。

大家都在静待着听刘先生说话。

——“同学诸君！”刘先生这样先叫了一声。“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要请愿早开国会，但不幸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场便没有请愿早开国会的资格！”

他一起便是这样的一句翻案文章，这样的演说在群众中本来很带危险性的：因为群众立地便可以哄动起来。但大约一方面是刘先生的声望服人，一方面也是会场的情景着实令人难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还有，他这样的一句严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实际上并不带有严烈性。我现在过细地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人称是“我们”而不是“你们”罢？他开口一声便是“我们”，这样他自己便忘记了他的教习的资格，他是和学生群众合成了一体。学生群众的错误他也把来加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在这样一字间的差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而且也可以判别一句话的力量。

刘先生的演说，结局是并没有甚么崇论宏议，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后，只是说：“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

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凡是到会的人对于今天的宗旨没有不赞成，没有多作讨论的必要。我们最好是赶快产生决议来从事进行。我们应该进行的步骤，我看是第一步应该组织一个常务机关，第二步是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请咨议局把这次的运动扩大起来，第三步是请四川总督代奏。此外如象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大会把大纲决定了，就移交给常务机关执行，一刻也不能容缓。”

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真好象是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有的竟高声叫着：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主席！”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代表！”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起草委员！”

大家在这时候也把刘先生的身份忘记了，忘记了他是铁道学堂的教习。

刘先生的这一番指导在我们目前已经充分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界看来，本来只是家常茶饭，但在当时的学生界，而且在当时的四川，它的评价却不能把今日来做标准。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会的后段便很顺畅地进行起来了。由几个高级的学校的

代表组织了一个常务机关，分头去进行各种事务。大抵的决议是：

1.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

2.要求四川总督代奏；

3.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复课。

七

当时四川的总督是赵尔巽，他在清朝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数的重臣。他是汉军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汉人而投降了满人的。这种“奴才”对于他的“主子”——当时的大官或一般的满人都称清室为“主子”，称自己为“奴才”——自然是要表示两倍的忠诚了。

学生在第三天上又开第二次的代表大会。目的是报告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的经过，及今后进行的方针。

开会仍在午前十点钟，但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装警察和营防军，在步枪上上着刺刀，在教育总会的门前巡逻着了。

这对于学生是很大的威吓，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预感到今天会发生甚么危险，在报到簿上偷偷地签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然而到会的人依然踊跃，到开会的时候，小小的一个议事厅又塞得象一匣火柴了。

受过了一次训练的群众毕竟不同。一切开会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条，和前一次的开会判然是两个时代。

开会了。劈头的一个临时动议是质问当局为甚派兵来弹压。当时的封疆天子虽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几个毛桃子的学生便轻易见面，轻易质问？唯一的拐杖当然又只好去找咨议局的正副议长。

据代表回来报告，他们去会着了蒲议长。蒲议长顿时打电话（当时已有电话，但只限于行政机关）去问警察厅，说是奉了赵制军①的命令，怕有乱党借端生事，特地派来保护的。说是蒲议长昨天已经去谒见了赵制军，赵制军已经允许了为我们代奏。照赵的意思以为学生关心国事是出于爱国的至诚，固然可以嘉许；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罢课要挟。

我们的代表质问过议长，问赵答应代奏，究竟有何诚意的表示？他口头答应，而实际不执行，有什么方法保障？我们请开国会即是求言论集会的自由，然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会场上却派军警来弹压，岂不是完全表示了并无代奏的诚意？

蒲议长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许再去见赵制军，一切的回话等得到结果之后再亲自到会场上来报告。在他未来之前，大家应该严守秩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一省最高的言论代表者的议论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们报告完毕了之后，已经是午后一点钟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会上准备好了的馒头。馒头，这真是再得机宜也没有的，象前回为饿饭诉苦的代表当然也就没有了。

---

① 指赵尔巽。制军是清代对总督的一种称呼。

在学生们休会用馒头的时候，到场的军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枪架在教育总会门口，在附近的吃食店里，各自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爪牙，真是有点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当时学生要暴动，那不已经是送来了很完备的武器吗？一切都是进展着的，便是支配阶级杀人的手腕也是一样。

有一位比较老一点的警察，大概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还在门外站岗没有去吃饭。我看他人很和气，看见我们在吃馒头，好象很有点垂涎的样子。

我问他："老总，你肚子不饿吗？为什么不去吃饭？"

——"不饿？你说我不饿？哼哼，小先生，吃饭要钱呢。"

——"你们平时站岗不吃中饭的吗？"

——"平时是要换班的，今天是专差，署长叫我们没有命令不准动。我们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这儿来，又不派人来替代。"

——"我好不好送两个馒头给你？"

——"哼哼，"他只是笑。

这儿真是立地表现出了一个天国。究竟是饥饿的力量、馒头的力量大，它立地可以使狮子和婴儿同游，老虎和羔羊携手。

——"小先生，今天你们到底为甚么开会？"

——"你们还不晓得吗？我们是请愿早开国会。"

——"国会国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

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说话。”

——“哦吓！”他很惊骇了的一个神情，“怪不得我们的署长老爷说你们要造反啦！”

这个泛泛的插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趣味。我们在请愿早开国会，而当时的支配阶级说我们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认我们在造反。我在当时不消说还替他解释了一下，怎样怎样，如此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真正是在造反吗？造反就是革命，现在想起来那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不就是革命的行动吗？当时的所谓“革命”是“灭满兴汉”，乃至是投炸弹、拉手枪，甚至于有时指斥要求立宪的行动是保皇党的行动；但由现在看来，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当时的革命党人以为清廷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当然也就是立宪的唯一的障碍，但这个见解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并没有摩着实际。中国在清朝灭后已经二十年，不是一直都还不能立宪吗？中国在帝国主义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这个资本制的革命，始终不能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它无论怎样是会要飞跃的，就是两步要当成一步走。中国在不能脱掉帝国主义宰制的期间，它始终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级上闹轩轾戏。

会场在继续开会的时候，大概已经两点钟过了。这时又来了一批新的巡警，他们走来便把刘子通先生提去了，说是提学使司要请他说话。

刘先生在会中指使，当然有内探已经向当局报告了。大

家阻挡着，劝他不要去，但他终竟去了。他以为不会有甚么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刘先生去了，但从此以后便渺如黄鹤，不仅那天他没有再回会场，就在四川的学界也永久没有他的形迹了。有人说他是被递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后在中国的活动上也就再没有看见“刘子通”这个人了。我想，他或许在四川遭了暗算，或许是在武汉起义的时候，他已经阵亡了。

刘先生去后，群众事实上是失掉了它的领袖。他们等蒲议长的到来，而蒲议长却终不容易到来。时间迟缓得就和瘫病患者的脚步一样，只带来着许多的焦躁、愤懑、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议长的到来，已经是快要上灯的时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议长的风采的便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貌不惊人，我现在也想不出他有甚么殊异的特征。不过他来的声势真是浩大，大家一听说他来，便都狂涛一样拍起掌来了。拍掌的声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开口说话。

议长的声音很尖锐，不过他的说话却还井井有条。我很感谢他的是他把当时要求立宪运动的历史，叙述了一个梗概。

中国立宪运动的具体的表现大约是发轫于戊戌政变，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就是民国前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成立的“豫备立宪公会”。这个公会的发起，江苏的新兴资本家张謇①，是主要人物。运动的起源是由英国资本家手里争回

①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清光绪状元，近代实业家。从一九〇一年起，从事立宪运动。一九〇六年与江、浙、闽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立宪派领袖之一。有《张季子九录》等。

沪杭甬铁路，在这争路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一转而为立宪运动。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一个最规范的事实。将来假使有想编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中国资本家政治运动发展史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占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为有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提倡，所以一时才四方响应起来。在宣统元年（民国前三年）才有九年立宪的诏书，到宣统二年更由这些人斗争的结果又才有六年立宪的缩短。当时一般新兴阶级的要求是在宣统三年就要立宪，我们学生界的运动，自然就是承继着他们的意识。

蒲议长不消说也是当时斗争中的健将，他是才从北京请愿了回来。温世霖的被捕，外边运动的风潮已经镇摄，他是知道的。四川学生界的运动，只是圈外的余波，当然他也不会有甚么不明白。所以他始终劝学生不要操切，他以为只要省当局答应了代奏，尽他口头也好，实际也好，只好暂时认为满足，静待时机。而且他说，当局是有意拿人，假使运动尚要继续，那就非出于流血不可了。

议长的舌锋便突入革命与立宪的问题上来。他说两者的对立便在这儿。一种是以非法的手段争夺政权，一种是以合法的主张要求立法。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议事厅必然要由门径，不能打破玻璃窗乱跳。

议长的话很有他的条理，学生方面终觉驳不倒他，然而总感觉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在老人们看来，总会说这是学生

幼稚，学生的客气未除。但仅仅这样的批评终竟是难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门不跳窗眼的譬语，那只是片面的事实。万一有甚么意外的灾难，突然逼来，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许你不跳。这就是所谓突变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明白地认识到的，然而真理的影子总暗默地反映在人的脑中。

夜分已经深了。

蒲议长辩论了一番，劝解了一番，但没有得到一个决议的形式，他便走了。不过他的辩论、他的劝解也好象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辩论正热烈的时候，多数的人已经在络续地退场。刚才拥挤得象一匣火柴一样的会场，真个又象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样，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后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会场的热度自然也就减退了下来。还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疲劳和黑夜女神随身带来的睡药，帮助把问题暂时告了一个结束。大家最后的决议是：一律再继续停课，拒绝试验，侦查刘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这样，在一个不得要领的观望的形势之中，也就只好宣告散会了。

在我们退出会场的时候人已很少，早来的军警依然还在那儿站岗，有的在纷纷吐出怨言：

——“妈的，今天不晓得见了甚么鬼！”

八

在学生无法下马的时候，当局者绊马的方法已经准备周到了。

就在宣布继续罢课的那一天下午，提学使司有一道很严厉的通令下来。禁止学生借故生事，罢课要挟；假使有不听命的，还要惩办各学校的办事人。

这对于学生运动不消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起初开始运动的时候，因为运动的目标纯全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以各学校的办事人，无论是怎样顽固，或内心是怎样的惴惴焉恐惧、怕犯所辖官长的逆鳞，然而在表面上总不能不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这回提学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还要惩办他们，这比甚么早开国会自然是要更切己得几百倍；他们的态度也就靠着有这样一个借口，由放任一变而为高压了。

事实上是学生自己也临到了不能继续罢课的关头。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在这一次运动的开始宣告罢课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很有便宜的时期，便是各学校都已经在准备试验的停课期中。有的应该毕业的班次也因毕业试验提前开始的结果，大都已经试验完毕，只在等待文凭的分发了。

但不幸的是已经罢课三天，试验已逼在眼前。在试验未

开始的期中，尽管名目是在罢课，其实大家是在按着课本拚命死读的。别的学校、别的班次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至少在我们丙班，从这儿后来出了不少的国家主义者的丙班，他们之所以举我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说：让你这猪头三去为我们撑门面，你没有时间温课，也好让我们来高列。在当时科举才废止不久，试验的观念在学生们的眼目中比自己的生命怕还要重要。好象自己来当学生，便是专门为来受试验的一样。这逼到临头的试验，对于运动的进行，比起五百道提学使司的命令来，是更加顽强的阻碍了。

在这儿，教职员与学生大众的利害完全一致，少数学生代表便在虚空中倒悬起来，成为了两种群众的公敌！

分设中学试验的开始就在罢课后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试验是英文，从一大清早起，自修室里都在“but cut”地乱念。大家都把钢笔、墨水准备得上好，自然是待机行事了。

八点钟了，已经摇了课堂铃，英文教习的H先生已经上了课堂，坐在黑板面前等着了。但是人的羞耻心毕竟还有它最后的一番控制，想受试验的心事，想升班的心事，尽管怎样迫切，而出卖团结的一种工贼式的行为，谁也不愿意来做一个魁首。在自修室里面你观望我、我观望你地只是不动。监学走来劝告了。就跟从豢牢里赶羊子上屠宰场一样，一个二个从自修室里拉出房门，但等他前脚走进第二室里，第一室的人们又一个二个地退回自修室去了。所谓“扶得东来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两位监学疲于奔命。

监学的劝诱不行，最后是监督走来了。

监督的都喇嘛先生照例是象长颈鹿一样，把颈子向前面伸长着，一手理着他的八字胡须，一手垂在长统的袖子里面，一拐一拐地摆着他的官派的脚步走来了。

——“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

从甲班说到乙班，从乙班说到丙班，但仅仅是这样一种催促要把群众的羞耻心克服是不够劲的。

喇嘛先生毕竟是老手，他看到集体的劝说不行，他便用分散的办法，向软弱的各部分来个别击破。他第一步是去诱导乙班的那十几个满人。成都是有满人驻防的，所以乙班里面便有十几个满人学生。这十几位同学平常和我们汉人都不大接近，他们自己另外形成一个部落。自修室和寝室都是聚在一处，我们平时也就称他们的自修室或寝室为“满城”。他走进满城去劝那些满人学生。

——“唷？你们真蠢！你们也要罢甚么课？你们要和你们的主子作对？”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来歆动，那些满人学生首先就被他歆动了，于是乎他们便先上讲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这一着的成功，他便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两班比较年纪大的学生，又来专攻丙丁两班。

——“你看，你们为何还不上课堂？乙班都已经上课堂了。”

大家仍然不动。他又检着丙丁两班的比较更年青的小孩子来拖。

——“喑，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为何也要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也要去参政吗？吓？你看，乙班都上课堂了。喑，你们真蠢！你们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是受了骗。喑，你们不知道吗？象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那些承头的学生都受了毕业试验的。他们受了试验，让你们来罢课。你看，你们蠢不蠢，喑？”

小的被他拉出来一个。但等他去拉第二个的时候，前一个又跑进自修室里去了，依然就跟拾取地上的板栗投进没有底子的提篮里一样。

——“都先生，我们不是满人呢！”

——“都先生，我们不好做汉奸呢！”

——“管他是满人也好，汉人也好，你们小孩子要参甚么政？不怕人家笑脱牙齿吗？喑？”

然而结果还没有效。

都先生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来了。他见一个二个的拉夫式的办法不行，他便叫两位监学把丙丁两班的学生全体整列在自修室门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间房舍，和丙丁两班的讲堂相隔仅一个天井。

他也并不是要来演说，从前的旧人对于演说这一套本事是不大拿手的。他依然还是那种劝说的调门。

——“好，我看，喑，你们是害羞，你们怕先走了，别人笑你们。好的，我来给你们叫口令，你们一齐走过这道天井。喑？喑？你们—— 用意 ——！”

大家都笑起来了。喇嘛先生得到这一笑，以为他的幽默

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种半象京腔不象京腔的声音，又来了一声——“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们便一齐开步——走！好，来啊！一……二……三！一齐开步——走！”

尽管象在跳猴戏的一样，表示得异常滑稽，然而走还是没人走。

象这样低首下心的滑稽过后仍然发生不出效力，于是乎恼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个古铜色的面孔气胀成了一个鸡血铜的面盆，八字胡随着他嘴唇的痉挛，就象去了戥的天秤，在一上一下地摆动。

——“喑？喑？喑？你们……你们……你们要和我作对！你们这些糊涂虫！”

这样暴怒着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里依然在运用着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约以为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便用下了擒贼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唤我，“你可以叫他们上课堂啦！”

——“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

——“那吗，你就先上课堂做一个榜样！”

他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他棱着眼睛看了几眼，胡子翘了几翘，他愤愤地走上阶沿，走向他的居室里去了。但他刚好走进房里又退了出来。

——“张生！郭生！”他站在阶沿上气愤愤地在招呼着张伯

安和我。

——“你们上来！”

我和张伯安服从了他的命令，沿着自修室前的北阶走上他站立着的东廊上。那儿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两尺，临着天井的廊边是有一带回栏可以凭坐的。

我们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当着两位监学和两班的学生便痛责我们。

——“啊，你两个！你们真对不住我！你们在本地中学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们收容了进来。啊，你们，啊，你们！我以为你们可以改过自新，啊，你们又再来和我作对。你们又在这儿来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学都带坏了！你们到底上课堂不上课堂？不上课堂我要斥退你们！”

“都先生，”伯安也很愤气地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请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么命运。从前嘉定中学堂的斥退是因为我连累了他，这回又是我把他连累了。喇嘛先生说要斥退我倒还有理可说，因为我当了代表，但是伯安并没有甚么罪过，他之不上课堂也就跟全班的人不上课堂一样，不是甚么罪魁，也不是甚么祸首。

好的，我们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说是宿命，怕也只好说是宿命罢。我们当时便退到自修室里收拾书籍。两位监学在自修室外面对着丙、丁两班的学生威胁起来了。

——“好，你们看！为首的两个人都斥退了，你们自己还想怎样？你们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见你们的父兄？”

是的，对于羞耻心的压迫得到了一个缓颊的口实了：为首的都已斥退，我们还想怎样呢？

就这样连拉带劝地把一群半推半就的学生便劝上了讲堂。

姓罗的一位同学，他和我们是同自修室的，他还算走得顶迟，在他和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和我们一一拉了手，问明了我们住的旅馆，他说他今晚上要来看我们。

那位懒得最彻底的姓李的同学（我真是对不住，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自始至终是陪伴着我们的，他看见一个二个人都上了课堂，他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来。

——“妈的一个×！”他很大地叫了一声，“办你妈的一个鬼学！老子也不愿意读书了！”

他在书桌上打了几拳，愤愤地也就把他的书籍收拾了起来，跟着我们走进寝室。

在我们把一切行李从寝室里搬出来，从东廊上走过的时候，大家都在讲堂上埋头受着试验，真是寒蝉仗马，悄然无声，比起刚才四五十分钟前的光景，就好象隔了四五个世纪的一样。

走过都监督的居室的时候，听见他在室内明声朗气地诵读很高古的《虢季子白盘》① 的铭文：

……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玁狁

① 西周晚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县虢川司出土，盘有铭文一百十一字。

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桓桓子白……献馘于王……

声音继续到我们走出了的学堂门外。

第 二 篇

一

照阳历来说，在我们闹国会请愿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华老大帝国的商标——黄色大龙旗就要改变，这有甚么人曾经梦想得到呢？

清廷在他的末年由于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一个旧有的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然自鸦片之战而中东之战而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旧有的封建势力被外来资本主义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便不能不折首请降，一转而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爪牙了。

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传染病。它到东方来，把东方固定了几千年金瓯无缺的封建社会弄得七零八碎，而它同时在中国内部也播下了它的种子。这种子刚好就象过了节季的花草一样，一播下去便蓬然地发生了出来；于是中国的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便改换了形式，从前是与国外的资本主义斗争，现在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斗争了。在这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便成为旧有封建势力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在这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是利用旧有的封建势力，而旧

有的封建势力要维系着它的支配权也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自从庚子以来一直到现在，这差不多是成为了固定的方式。

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它起初战取它的位置的时候，它不能不遇着两重敌人：一方面要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巷战。大资本家张謇辈关于沪杭甬铁路的抗争一转而举出国会请愿、立宪要求的烽火，不正明白地表示着这个路径吗？更明白的就是这个方式的复写而更加扩大了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在现在看来，并不是有多么大的光耀的。自民国成立以来，革命的果实为一小部分人所垄断。革命纪念日定为武汉起义的十月十日，由资本主义所酝酿成的中华民国就好象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祇所创造的一样。其实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来，他会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延长。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怕至少应该改成双九节罢？

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个省份，各个省份的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在这儿更加上了一种民族感情，便是满人对于汉人的排满，也就极端的排汉。宣统小儿皇帝一即位，把一时炙手可热的袁世凯① 谪贬，大大地起用满人亲贵，使汉人不得入掌军机。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立宪运动的牵延敷衍，对于请愿国会的重要人物的拿捕、变相的科举

①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河南项城。北洋军阀首领。

制的复活①，这些都是封建势力的独裁专擅、倒行逆施的表现。而在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势力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斗争最赤裸的表现在盛宣怀②的入掌邮传部，而施行他的铁路国有政策。

国有政策，在这政策的本身宁是可以奖励的。它的最高尚的动机不消说是想加速度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进展。因为中国商办的资产事业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粤汉铁路以四五千万两资金仅仅修了两百里路长不生不死的路轨，川汉铁路的三千万两资金在未动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烟消云散之势。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所以象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的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民间的类似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的资本了。

盛宣怀所找的财东便是当时由英、美、德、法四国所成立的银行团。他所要收回国有的对象便是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

这在形式与实质上结局只是国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商办诚然是腐败。他们知道腐败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

① 作者原注：宣统二年曾恢复过一次留学生的科考。

②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近代买办官僚。一九一一年一月清廷补授邮传部尚书，五月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

饱，而他们不知道中饱的原因又是甚么。商办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结果不外是一些腐败官僚，即是旧有的封建势力。由这种腐败官僚的手里又接收到腐败官僚的手里，这样便可以免掉他们的中饱，免掉事业的腐败吗？

中饱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国人自己要修铁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给于外国人，在这中间还要经过几道的转折。你想，你中国有多大的资本来供这种层层的剥削呢？所以结果是资本耗费了，而事业却没有眉目。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帝国主义。①

产业国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债来举办产业也未可以无条件的反对。然而，重要的是要你不受债权者的控制，要你把自己的私有欲望克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能够办到吗？在中国的当时更能够办到吗？②

铁路国有的上谕是那年五月二十二日（阳历）下的③，反

---

① 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这岂不是就给自己园里的花木被邻人们偷去种植在他们的园里去了，园主人只看见本园的凋落，邻园的繁荣，便羡慕邻人的经营的手腕，走去请他们来替自己经营自己园子吗？"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② 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

"所以结果国家的诚意不能见信于人，而实际上激成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流血的斗争。"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③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农历四月十一日），清政府取消粤汉、川汉铁路民办的成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五月二十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清政府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铁路国有"的名义，将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

响便是民间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广东的人士起来斗争。当时外面斗争的情形我们不甚明了，大约粤汉铁路的股本没有川汉铁路的来得那样"括夺"①，在那外面的反抗运动渐渐阴消下去的时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热，却如象死火山复活的一样，突然爆发起来了。

四川的运动照例是要比外边迟一两个月的。运动的开始是在六月间，有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都全部参加了。结果是九月七日赵尔丰②的屠杀，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成都，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来几乎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③，把鄂军先后带领了几旅人要去剿灭四川。到这时候武汉才乘着这个机会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是各省便先后响应，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儿皇帝退位，清廷终竟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权双手捧交出来了。

所以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担负，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

---

① 作者原注：四川方言，有残刻的意思。

② 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清汉军正蓝旗人。曾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等职。一九一一年四月继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有《赵尔丰川边奏牍》。

③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清满洲正白旗人。曾任湖广、两江、直隶总督，一九一一年五月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有《匋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

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事实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想有意阿谀，或有意翻案。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史上最典型的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因此，我认为它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在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特别是在叙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反帝国主义斗争史的人，这个插话，便是川汉铁路的发生、经营，一直到保路同志会的转化而为暴动而为革命的详细史迹，有值得我们十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特别是四川境内的朋友，应该在目前赶紧把那行将散佚、或者已经散佚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合理的整顿。那真是一个很有价值而且很有效用的事业。因为这件史事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中国将来的去向。中国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当前的敌人封建势力的斗争要算是得到了意外的胜利。封建社会的中心势力的清廷倒溃了，铁路国有政策没有实现，而且由立宪运动一跃而办到共和政体。五条颜色的商标已登录了将近二十年，然而斗争中心的产业问题是怎么样？川汉铁路不是早已阴消了吗？粤汉铁路不是依然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侏儒吗？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岂不是在形式上虽然打倒了当前的一个敌人——不消说在实质上这个敌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倒，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它却只在它的掌上翻筋斗吗？

这个更大的敌人是谁？

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地控制着了，使你中国成为一个永远的乡村，使你中国人的产业永远没有方法发展。

因而保路同志会的运动，乃至结晶为辛亥革命的整个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结果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中国革命自始至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能由中国资本家的手来完成。

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过了节季的播种。它在不适当的温度与各种条件之下，始终得不到它应有的成长，而它在畸形的状态之内很快地就达到了它的衰老时——下行阶段的反动时了。

二

说来差不多好象是一种奇迹。

都喇嘛先生那样严烈地说要斥退我们，我们自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学生饭了。然而，他终竟没有挂我们的斥退牌。在现在想来，事实上他也没有挂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他又何尝不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过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杀鸡给猴子看。他是把我们弱者拿来做个榜样，在一般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当着众人骂了我们一番，全堂学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课堂，去受试验。我们当时就搬出了学堂，他又何必要费一番挂牌的手续？

凑巧的是就在我们搬出学堂的那一天，大哥回省来了。

他和我们同落在东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馆。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这次回省来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①。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

① 作者原注：经查明，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成都罢市是八月二十四日（阴历七月初一日），赵尔丰捕人是九月七日（阴历七月十五日）。

这次的运动，主持者就是咨议局的一批新人，在开股东会议之前他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在鼓动着反对的空气，因而学生的工作倒反没有甚么了。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有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这位朱山先生好象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会你去参加不去？”英文教习问他。

——“我去参加的。”

——“你看这一次可以闹得出一个名堂么？”

——“嗯唔，”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热闹罢了。”

我们和他本不相识，看他来了，便让座。听他说了这几句话，我们也就起身告辞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铁路公司做科员。每逢礼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儿去一次。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得以在那儿参观。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① 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

① 岳锺琪(1686—1754)，字东美，号蓋园，四川成都人。清大将军。康熙末，任四川提督；乾隆间，奉命平大金川莎罗奔之乱，官至兵部尚书，封威信公。著有《蓋园集》等。

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① ——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象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② 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

① 作者原注：当天开会做主席的是颜楷，一位年青翰林。公司总理是曾培，此处记忆有误。

② 初版本以下文字为："——当时四川的邓孝可就好象苏俄的鲁那查尔斯基一样。不消说他的报告并不是纯粹的报告，他是带有批评带有反抗意味的报告。会场在他报告的经过中已经就很有几分紧张的气味了，在他报告完了之后继着是罗纶登坛。"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如今本。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象抟成

了一团粘土一样。

游说，在现在说来，就是宣传。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干事好象是罗纶兼任。游说股中要分派出四位游说员向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道去宣传。这也是当场由各人自己来担任的。我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员家里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次运动只是"趁趁热闹"吗？然而这时候他登坛了。当罗纶在坛上大声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那一位同志担任？"

朱先生两脚跨到方桌面前，激昂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我朱山担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满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个茶碗上，把茶盖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处飞溅，手也打出了血来。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外。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投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① 那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保路运动的指导者们，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在同志会的部署大体就绪之后，又是一个临时动议，便是全会场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这不消说是没有人不赞成的。大家从铁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拥着跟来，走到藩台衙门的时候，把那辕

---

① 指端方。

门里面的一个大敞地完全站满了。

这时候赵尔巽已经调京，继任的他的兄弟赵尔丰，还在西藏。在这过渡期间是藩台王人文①在署理。他在当时确是比较进步的分子，四川保路同志会能够收到那样的成功，一多半应该说是他的功劳。

群众拥挤在藩台衙门的大堂面前，为首的罗纶先进衙门里去了。不一会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来。群众狂欢地鼓掌。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师爷提了一把太师椅来，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和群众说话。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始终表示同情。他自己虽是云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乡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更何况是有关桑梓的利益！所以这次的问题，他要向朝廷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而且对于民众加以煽动。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甚么顾忌呢？于是乎保

---

① 王人文(1854—1939)，字采臣，号豹君，祖籍南京，生于云南太和（今大理县)。白族。光绪进士。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任四川布政使(即藩台)，宣统三年三月(一九一一年四月)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在署理总督赵尔丰到任前为护理总督。因支持保路运动，被清政府革职。

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象在火上加油了。

三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①，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②。这本来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预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争斗。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

罗、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特别崇拜。上面的两个口号采自光绪的上谕可不用说，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要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绪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他所允许的。供奉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象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

---

① 见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谕旨。

② 一九〇七年川汉铁路改归商办。

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义”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来造反，要教他起来革命，那怕你就要杀他的头，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当时从正面来运动革命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反而由群众误会为“乱党”或“会匪”，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好了，现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有了这样一个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运动步骤，便照样地传到各乡各县。于是，俄顷之间运动便遍及于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绪皇的牌位之外，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旧式的街道本来是不十分宽敞的，在街心再搭上过街台，街道两旁差不多是不留遗地的。台又并不高，有的人从那下面通过时都要低头或弯腰。

这些过街台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的市民非常虔诚，对于圣位台的扎札煞费苦心。有的装饰得很辉煌，结彩张灯，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烛的三跪

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对于当时官场所发生的影响。市民在顶礼皇帝，无论是怎样反动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当时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职员之类的准官界，有一种很流行的恶习，便是坐弓杆轿子。这弓杆轿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样，两枝轿杆朝天穹窿出去，好象两张弯弓一样。但同时在横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结果是形成一个橄榄形，两头是尖削着的。两头的轿夫，把轿子跨在肩上，刚好挟着一个颈子。在轿子前后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两肘紧挟着胸廓，两手紧擎着轿杆的。轿夫自始至终都是跑步，跑的时候一前一后的轿夫只是硬着颈子向前窜，两手摇摆得很高，口里不断嚷着“边让，边让”。象这样跑当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轿子的后边总有三四个跟着跑的空手，预备着在街上随时换班。

这样的轿子跑起来很快，轿身又高，坐轿的人真好象是坐在云端的一样，显得很有威风。这不知道是那一位发明家的发明，我自出省以来，还不曾看见过。我想，这大约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过的人发明出来的罢。因为他们习惯了电车或者汽车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发明出一种调子比较轻快的工具。那橄榄形的弓杆或许也就是从电车下面的发条装置所脱化出来的罢？然而，那全体的结构，看来实在是很不安稳。重心离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岂不会横倒在街心？

我们可以想见了。你想，成都城内每条街都有圣位台，而每座台子至多只有一人来往高。那吗，怎么通过官长老爷们

的轿子？而且是那种作威作福、横冲直撞的弓杆轿子呢？于是乎鲁酒薄而邯郸围①，圣位台低而弓杆轿废。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谕禁止还要神速，立地便断绝了肩舆和别种交通工具的往来。我们再可以想见了，你想，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抚司道，在他们有事要进出衙门的时候，都不能不自行走路了！这在当年是多么珍妙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笑话。

成都是有满城的，就在城内的西南隅。只有在这满城里面没有搭圣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满将军要拜会总督。他坐着轿子从一道城门出来，走不多远便遇着一座圣位台。他问明原故，知道供的是光绪皇帝，他在轿里说：

——“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回轿去从另外一道门出城，又遇着同样的圣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就这样，他走了三道城门终竟走不出来，他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在当时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为快。官府的虎皮被剥掉了，官府在民众的战术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在地方上的各府州县的情形大约也是这样。几千年来的官威一时倒塌下来，这倒不能不

① 语见《庄子·胠箧》。

说是类似天变地异。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曾经做过四川的永宁道尹。永宁一带山高路险，与贵州连界。往年民不聊生时，多流为土匪。赵尔丰串通永宁劣绅傅华封①，竟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为他是“屠户”，他有杀人的本领，又因为赵氏一门是清室的忠顺奴才，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来，承继他的哥哥赵尔巽，做了四川总督。

四川人都有点怕他，听说他要从西藏回来，大家都有点悬心吊胆。所以一方面对于他表示回避，一方面对于王人文便尽力地挽留。但是在他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却被始终主张剿灭四川的端方参了一本，说他收揽民心，养痈贻患，结果王人文是革职调京，而屠户也公然到了成都！

赵屠户到成都的日期是当年闰六月初一，阳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没展。

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同时他自己的官阶也已经达到了应该持盈保泰的时候了。假使清廷不操之过切，铁路督办端方不火追他，让他一方面软化

① 即傅华峰（约1870—1929），名嵩炑，四川叙永人。赵尔丰离川边后，护理川滇边务大臣；保路军起事时，率边军赴成都救赵，至雅安被俘，后归乡里。著有《西康建省记》。

那些知识阶级的首领，对地方上逐渐地用严烈的手腕进行取缔，四川的乱子不一定就会闹到不可收拾。但是清廷一再的逼迫他，逼得他在九月七日终竟把罗纶、蒲殿俊和其他几个领袖通同拘禁了起来。

在这次的运动中，蒲殿俊自始至终没有出过水面。这在他们的计划中便是预先准备着一个退路，预备到高压临头的时候，蒲殿俊好出来转圜，做一个和事老。毕竟是“屠户”的赵尔丰，他竟连这点机微都没有看到，他把罗、蒲一并拘禁起来了。

罗纶、蒲殿俊被捕！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全城的人都震动了，到第二天九月八号的上午①，成都全体市民赴总督衙门请愿释放罗、蒲。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门口贴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来，有的捧在手里，有的顶在头上，各人手里拿着一炷香向总督衙门里涌去。

赵尔丰是早有准备的。他在总督署的门口和附近的要隘处已经派兵把守着了，手无寸铁的市民冲进督署的西辕门，又冲到了大堂檐下，赵尔丰下令开枪。于是为头的便打死了好几个。群众如潮水一样崩溃下来。枪声只响了几次便停止了。一街都是光绪的牌位，一街都是线香，一街都是踩脱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伤了的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人作过详细的调查。我现在连大概的数目都忘记了。②我所能记忆的，只

① 应为九月七日当天。

② 据《辛亥四川事纪略》，九月七日“成都血案”确知姓名的死难者计三十二人。

是那死者里面有十二三岁的小儿，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街上的圣位台同时也被军警拆毁了。

这样一来简直是赵尔丰造反了。成都早就罢了市的，从此谁也不肯开门。各地的同志会便都暴动化了。

“水电报”，这是一个新名词，是四川人在当时创造出来的通信方法。方法是在一个木板上写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木板上面桐以桐油。四川的河是四通八达的，把这种木板投在川河中，它便被传达到各处下流的地方。这个方法最初是学生会发明的，一应用起来便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一处的人接到了一通水电报，同时又仿造出无数水电报流向下河。在这时尽管当局者在怎样戒严，检查邮电，检查出版物，但这四通八达的水电报却是无法扣留的。

暴动的中心是在新津，这儿是先发难的地方。这儿的同志会把城池攻陷了，杀了县官，占领了县城，各地的武装势力便都络续地投到这儿来。赵尔丰先派凤凰山的新军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军不仅毫无战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军。旧式的营防军更全无战斗的能力。

新津一县既不能弹压下来，各县的同志军又闻风兴起，赵尔丰弄到无兵可派，无兵可战的地步。他不能不屡电清廷请援，甚至于请撤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缓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乱机已经使中国的全局骚动。各省的咨议局都起来力争，有的省份（象是浙江）更请朝廷速斩赵尔丰以谢天下。

于是乎清廷也弄得来仓皇失措了。它一再起用些旧人来

专门应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① 为四川宣抚使，这当然是想利用四川人对于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来软化四川。继后又命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兼管四省军事，把鄂军带领了两旅人进川，叫他剿办。象这样一硬一软的双刀并用，所谓"怀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这在当时的清廷想来也一定煞费了一番苦心的。然而，它是铸就了一个大错，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权终竟送掉了。

四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声望的，他在赵尔巽之前做过一任四川总督。由四川又转到两广，在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大约他和摄政王有甚么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实也并没有甚么，据有识者说来，他倒很兴了不少的苛捐杂税。然而一般的四川人爱戴他，真好象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之所以得到这样好的声望，是因为他的官纪很严。他很爱惩办一些贪官污吏。清室二百七十余年间的统治，在官场中已经凝集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贪婪恶习。一般的官府均以贪赃枉法为能，在上的鬻爵收贿，在下的刮骨抽筋。"官官相卫"，让你受苦的民间硬是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人民的怕官府真比怕阎罗王老子还要厉害。然而，在这样的官场中，岑春煊的治绩却放出了一个异彩。他好象是专

①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清末四川、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

门生来惩治那些贪赃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贪枉的行为，他准许民间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个有九个都是革职。因此使官场中的人，人人自危，而民间的老百姓也就人人称快。

四川人为了争路的问题，正弄得来骑虎不能下辔的时候，听说“岑制军”要来了，一般的人士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子弟的文电①，是九月下旬到达成都的。那措辞的娓婉动人而且得体，真是极尽了他的宣抚的能事。这个文电一到，在四川一百四十几州县都传遍了，成都城竟有一两天自动解围，各州县的同志军也准备收兵了。

电文并不甚长，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当成“福音书”一样诵读。在日前我和几位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还有人能够把它全盘背诵出来。我现在把那开首的几句写出罢：

> 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而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遭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就这样他很娓娓婉婉地开腔一声春煊，闭腔一声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来动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扰乱，而他这样寥寥的

---

① 电文题为《岑宫保专电告全蜀父老子弟文》。

几百言实在可以当几百万大兵。四川人险些儿就被他这样的一篇文字软化。我时常在想，清廷假使专门倚赖岑春煊，让他一个人单人独马的进四川，那川事一定会立地平息。因此，鄂军不会调空，武汉不会起义，而清廷也不会那样迅速地便遭了灭亡。然而，它终竟选择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它才命岑春煊去宣抚，立地又命端午桥去剿办。一方面表示出信人不专，另一方面也使宣抚的力量被冲淡。因此岑春煊走到汉口便逗留着了，而端方则威风凛凛地执掌了兵马大权，浩浩荡荡入川。

端方在入四川之前也有一通文电，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子弟的书，真可以说是绝好的对照。端电是告示体裁，文字之长将近万言，而在内容上更有天渊之别。

那么一通长电，到现在我相信谁也不能记忆了。我只记得他开口一声"本大臣"，闭口一声"尔川人"，把四川人看得来好象还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时的蛮子。他又拚命地夸张他屠杀革命党的手腕，说他从前在山西怎样怎样地惩治乱党，在江苏又怎样怎样地剪灭会匪。他现在带领大兵前来，假使川人还是冥顽不灵，敢于上抗王命，他要剿灭四川。

这样一来，简直把四川人逼得来绝体绝命了。纵横已经成了乱党，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几稀的生路便只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讲究一些中国式的考古学上，倒比较是一个聪明的人。说到政治上的处理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的愚蠢。自然，这样的电文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手稿，在他

幕府里总还有不少的名下士，那样庄严的一篇文章说不定还会是我们年青名士朱山先生的杰作呢！他们习惯于猛于虎的官威，以为老百姓只要一加威吓，便自会俯首贴耳。殊不知道老百姓的忍耐早已经超过了它的界限了。用旧式的眼光来批判，要说清朝的灭亡是由于端方的这通电报也不能说是过论。因为有他的一来使四川的祸乱愈见蔓延，而在不久之间武汉便起了响应。

武汉的起义谁也知道是在那年的十月十日。但这个消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号成都独立以后，我们才确切地知道了的。在成都独立以前，官界把外来消息完全封锁了。后来我们看上海的报纸——好象是《神州日报》① ——画有一方漫画嘲笑岑春煊，题为《岑三少割须弃袍》。岑春煊自受命为宣抚使以后，因为权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汉口不进，终于遭遇了武汉革命军的爆发，弄到他演了一场曹孟德的旧戏，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就没有出夔门一步了。

端午桥带领着大兵，浩浩荡荡地要来"剿灭"四川。在他刚走到重庆，他的后路便已经断了。重庆是四川革命势力的策源地，他羁留在这儿，部下的军心已经动摇。他如果有岑春

---

① 一九〇七年四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停刊。于右任、杨守仁等创办。

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他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他逃命也带着兵队同走。他愈朝西进，到了资州，重庆和成都都先后独立了。他这个釜底游魂终竟为他所带来的鄂军所杀。

他死时的照片我是看见过的，一个大洋磁盘里盛着被斫下来了的头首，由一个兵捧着。他自己不肯唱《割须弃袍》的旧戏，却让着这位兵士来唱了一场《沙乐美》① 的新戏。

剩下的还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赵尔丰。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锁了，但这是对于我们的封锁，对他自己乃至当时的官场当然是开放着的。

上海的报纸，特别是现在已经若存若亡的《神州日报》，和已经消灭了的《民立报》②，那真是做了一项很伟大的工作。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事实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四川，事实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布独立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省城是老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这在初期，在官场方面自

① 英国作家王尔德根据圣经中故事改编的独幕剧。剧中人物沙乐美为了吻到先知约翰，唆使希律王处死约翰。卫士把约翰的头盛在银盾牌里，捧给沙乐美。

② 日报，一九一〇年十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一三年九月停刊。于右任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等先后任主笔。

然会知道是在制造谣言。因为清廷就在武汉起义之后，经由山西、陕西对于赵尔丰都还有几次电报来斥责。然到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环绕着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独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独立的，陕西是二十五，云南是三十。十一月七日的贵州①、广西，八日的广东。从此以后四川的官场便成了一个孤岛，完全和清廷隔离了。在这以后的上海的谣言，你要不信，你怎能不信？不然，象赵尔丰那样倔强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并未灭亡之前，终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了出来，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赵尔丰自从九月七日把罗纶、蒲殿俊辈拘禁了之后，省城的对外宣传是说罗、蒲遇害。其实他对于他们是相当优待的。他只是不许他们出来活动罢了，一切都礼如上宾。我们听说他们在督署里面，时而打麻将，时而唱京戏，并且时而还饮酒赋诗。——这些名士假如有诗集传世，那时的诗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杰作。所以他们在那儿倒是得了一两个月的休养了。

外面的形势日非，四川在中国成了一个孤岛，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个孤岛。在那快要独立的前几天，同志军已经有攻城的消息，四乡进城的蔬菜以及米粮的来路都断绝了。在这时，假使四川的新军里面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经独立了的。可惜妥协性成的四川人，就跟全中国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掠去了的

---

① 贵州新军于十一月四日起义，次日成立贵州军政府。

一样，把成都独立的首功却让给赵尔丰去了。

成都独立的首功，说来有点奇异，是应该写在赵尔丰名下的。他在要独立的前几天终竟把罗、蒲诸人释放了。他在免使省民涂炭的口实之下(其实是想把政权交给温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他们定下了几条条约。一条是宣布四川独立，由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设副都督一人，由赵尔丰的私人陆军标统朱靖澜①担任，兵权仍操在朱靖澜手里。还有一条便是赵尔丰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库，他自己退回打箭炉②去继续经营西藏，一切的旅费、政费仍由四川支给。重要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于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独立也就跟中华民国的成立一样，在新旧双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类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实现了。就这样，中国便说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说是革了命。

赵尔丰在后来虽然遭了杀戮，但从革命的立场上来说，成都的反正总应该推他为首功。而从旧式的观点来说，他算是已经做了贰臣。清朝灭亡之际，贰臣之多实在今古无两。这里自然是有种族的观念存在，但也是封建思想已经失掉了势力的证明。平心而论，象赵尔丰之于清廷，实在可以说是相当地鞠了一下躬，尽了一下瘁的。请拿当时各省起事的先后和独立的先后来看罢。四川的起事占最先，而独立却差不多占

① 即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任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第十七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副都督。

② 今四川康定。

最后。无论怎样，赵尔丰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众总还打过几次仗，支持了两三个月。弄到后来实在是山尽水穷，才把政权交卸了出来。他对于清廷总算是可以对得住罢？然而清廷对于他怎样？清廷昧于局势的已经变迁，一味地对于民众加以压迫，一味地对于他个人加以责让，端方奏参了他，就让端方来查办，把他只看成一个罪人。他矢尽了忠诚，乐得一个“屠户”的美名，到这时恐怕也不免有知己寥落之感罢？在反正的当时，听说他自己本想做第一任都督，终因为怕不能餍服人心，他也就自行退让了。所以从清室立场看来，他比云南的李经羲①、广东的张鸣岐②、广西的沈秉堃③，乃至王莽④再世的袁世凯，虽然已经是“贰”，总还算“贰”得不甚厉害的。

立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于赵尔丰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四川当年新兴势力的指导者们实在是断难容恕。罗、蒲诸人本来是不赞成革命的妥协派，他们在长时期内也失掉了他们的自由，那是有可以借口的。但当时自命为革命党的，在独立以后虽然涌出了不少的人材出来，在独立以前他们到底在做甚么酣梦呢？特别是四川的新军界。统观各省

---

① 李经羲（1860—1923），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清末任云贵总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任为政治会议议长。曾参与张勋复辟。

② 张鸣岐（1875—1945），字坚白，山东无棣人。清末任两广总督，镇压黄花岗起义；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任为广西民政长。曾参与张勋复辟。

③ 沈秉堃（？—1912），字幼岚，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任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抢先独立，被推为广西都督。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浦口商务督办。

④ 王莽（前15—后23），字巨君，东平陵（今属山东）人。汉元帝皇后侄。汉平帝时为大司马，独揽朝政。后弑平帝，自称摄皇帝；不久篡位，改国号新。

的独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军掉头，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的表现。然而四川的新军，虽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志军的阵营里，而大部分却只保持着一个消极的不动主义，竟使赵屠户那样的一个独夫在成都也支持了两三个月。坐使政权在暗默中从反动派又移到保守派的手里，从这儿便种下了二十年来政权争夺的丑恶种子。天下从此多事，四川也就从此多事了。

五

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的。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封建的顽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但在革命成功了的当时，我们一般的人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间长，所以得到胜利也就分外地狂喜。

先从我们一些小孩子来说起罢。我们最大的喜兴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在这时，我们拿着剪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我们赶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着，弄得他无处可逃，终竟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的支配权和平授受了下来。

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只消大家把头上的毛辫子一剪，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

国了。

这样欢狂的态度，在那些得到政权的新支配者，比我们还要荒唐。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皇城正式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在一切的政权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他们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赏三军，准许新旧的军士自由十天，不受军律的拘束！这真不知道是那一位军师想出的妙计。本来就是带着兽性、容易放纵的丘八，还要准许他们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当中真正成为了百鬼昼行的世界。

新军驻扎在城外的凤凰山，多少有点新式的纪律，都还看不出他们怎样的骄纵。可怕的是那营防军了。

营防军穿的是旧式的号勇褂子，头上用黑色的纱布象印度人一样打一个很大的包头。在这时，他们的包头愈见大起来了，在额上加上一个英雄结子，有的还要加上一顶"英雄草帽"(就跟京戏《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样)。两边的鬓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号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斗篷(所谓"一口钟")，把明晃晃的马刀敞插在腰边。短裤下用黑色的纱罗打着裹腿，裹腿上也一边插着一枝匕首。脚上是线耳子草鞋。草鞋头上扎着一朵很大的绒绦花。

就是这样的装束，他们把两个肩头耸着，把两只肘拐敞开，两三个人品着在街上走，一两丈宽的街面便都被他们霸占了。

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形容，但我恐怕读者还是得不到那种可恐怖的光景。因为没有身当其境的人会以为这是一种假装行列，他们在扮演着戏台上所常见的武生。是的，是的，有

那样的一个观念就好了。他们实在是就象舞台上的英雄们，不下装就走下了舞台的一样；但他们却比任何的名优还要演扮得逼真。他们在街上满凶横地摇摆着，开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闭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①

四川的独立本来是重庆在前，成都在后的。公平地说，蒲殿俊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人，他不应该作政权的迷恋者。在赵尔丰把政权交出之后，便应该和重庆的一部分势力合并起来，最好是自己退让。因为他本来不是革命党人，不应该来享受革命的果实。然而他却连做梦也没有这样想到。否，他宁是一出马便和革命派对立的。在他得到了政权之后，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一点经纶，而只是企图垄断革命。他对于政权的分配是怎样呢？依然是让川北一派人包办。于是在这分赃不平上又树立了新的敌人。第一是和他们对立的当时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实力的新军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这些在无形之中便组织成了一个反川北系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独立后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独立的那一天的下午有一张布告出来，是说在二十七号的上午要在南校场召集省民大会，希望各界同胞参加。布告上的署名是：

① 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

"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狂喜着的一些年青学生也都预感到这新兴的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国家总怕要遭一次厄运。"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同盟会会长　孙　文

四川支部长　董修武①（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黄帝纪元，数目好象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孙文！这在当年是使我们怎样憧憬的一个对象哟！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四川怕以这为第一次。有他的名字列着的布告，就好象他在亲自对我们说话的一样，使我们少年人的心血起了高度的沸腾。

开会时很热闹。会场就在我们学校前面的南校场，在我们当然是就地风光。校场正中搭了一座临时的舞台，舞台上簇拥着不少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党人真是不少！平常我们时常看见的官班法政的教习，绅班法政的教习，乃至有许多穿军服、带指挥刀的，原来都是革命党人。

董修武是四川人后来称他为“董太师”的，东文学堂出身的留学生，是我们大哥的同学。他学的也是经济，在绅班法政教书。平常我们也时常看见过他，但我们的嗅觉真钝，连革命党的革字的气味都不曾嗅到。今天是他的主席，登台的人大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议论。会场上有军乐队助兴，因此也招来了不少的听众。但这些听众是全无组织的，就跟乡里人来看神会的一样，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自己非常抱歉：当时的那一些悲歌慷慨的演说竟没有一句留在我的记忆里。

① 董修武（1879—1915），四川巴中人。曾任同盟会总部评议员、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总政务处总理兼财政部长。

总之，这是一个对立。明显的是平时风头很旺的蒲殿俊、邓孝可诸人，今天却谁也没有到场。

但在革命党人中，在当时也有对立，便是洋货和土货的对立。董修武所代表的是留学生一派的洋货，还有是杨莘友①们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货。

我们有一位从堂的姊夫，原来他也是革命党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杨莘友们的办事室里去，我到这儿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风味了。

杨莘友、王述怀②，还有其他的一共六个人③，是反正以后才从牢里放出来的。他们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④的年底图谋革命，在未举事时被赵尔巽破获了，丢在了牢里的，算来已经坐了将近两年的牢。他们才从牢里出来，有的因为忙于奔走，竟连剃头的时候都没有。一头蓬茸的乱发，一嘴蓬茸的乱须，一个苍白色的面孔，一双放着异光的鹞子眼睛，一身不相称的借来的衣裳，这样的革命党人让你一眼看见了，令你怎么也要肃然生敬。我看见他们的握手了。他们的握手和平常不

---

① 杨莘友（1887—1928），名维，四川叙永人。同盟会员。一九〇七年在成都筹划起义，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军事巡警总监、全川警备司令等职。

② 王述怀（1880—1960？），名树槐，四川乐山人。同盟会员。一九〇七年在成都筹划起义，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四川都督府参谋、蜀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③ 即杨莘友、王述怀、黄方、黎庆余（靖瀛）、张治祥、江永成，史称“丁未成都六君子”。

④ 应为丁未（一九〇七）年。

同，宁可说是扣手。他们是把几个指头并着弯起来，就跟太极图一样彼此扣上。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别高，背有点穹，鼻子是一种罗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谈过几句话，说他们不赞成罗、蒲的办法。那是向赵尔丰投降了，是赵氏的家奴。这个人我看是六人中的领袖，他也特别忙，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又有别的同志来会他。他回头又带着手枪出去了。这个人我现在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就在那一天遭了别人的暗杀。下手的是甚么人，他的身后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

从那办事处退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地对我说，说他们要暗杀蒲殿俊。

在革命期中，一个人上台很快，下台也很容易。蒲殿俊一做了都督之后，他的政治手腕已经落第，更加以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合作，他的末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没落的直接动力，却是他自己所酿成的兵变。

蒲殿俊在四川被称为“十日都督”，因为他的都督梦刚好做了十天。

十天，这是新旧各军的自由假期期满的日子。蒲都督在东校场检阅营防军，自此以后要叫他们重守军律了。真是可怜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经放出笼牢的老虎，他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叫它重入笼牢。兵士们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要求发三月份的全饷。财政权大约在当时也还不曾被蒲掌握着，即使已被掌握，然在已经经过两三个月变乱后的四川，更那有那样

的余裕？这个要求不能干脆地答复，兵士们当场便哗变起来。当场便有兵士开枪。蒲都督几曾见过这样的局面，几曾听过这样的枪声？枪声一响，他被马弁们拖着逃跑了。

兵士的开枪大约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就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一城都是枪声。一个锦绣的成都城，就好象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奈罗帝火烧罗马城一样，四处都在起火。

我们的学堂老早就把门关了。叛兵几时闯进学堂来，是不能保的。都先生把我们约束得很严，不准谁出门一步。在学堂里守着听了一夜的枪声，看了一夜的大火。夜间枪声很密的时候，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门逃难。学堂门外就是南校场，簇拥到这儿来的有不少的人。时而也有人在学堂门外打门，但不知道是难民，还是叛兵。

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别是那些难民，他们忧财产之丧失，悲骨肉的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难保，真不知道是怎样地惴栗了。

枪声和火光在天将亮的时候才渐渐停息了。

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为关心着住在东门的一位堂姐，一等学堂门打开，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惨淡的。避难的人已经络续在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变兵都是向天放的枪，因此，并没有甚么死伤的人。夜间所看见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火光，真好象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狱的一样，其实所烧的都是当铺。也有人说是当铺主人自己放的火。因为当铺遭了抢，火烧后便免得偿还。

藩库是烧了，兵械库也的确抢了。在我走到南门大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变兵。他们那全身的披挂，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来。他们晓得银钱很贵重，抢了不少的大洋和银锭子。他们晓得枪弹是很好的武器，同时便也抢了一身的枪弹。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只枪。手里一边拿一只，肩上也一边挂一只。弹囊更加是不计其数，横也是，顺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叠叠重重、重重叠叠地挂着。但是，你想，你一个人哪有那样大的力气呢？一夜没有睡觉，身上有不少的金银，还要加上这样多的一些枪弹！

丘八老爷到了这时，不能不起质变了。他们由用枪弹的老虎一变而为驮枪弹的驴马了。

各街已经有自卫团出现，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的。他们在这时候把平常很少见的马刀、关刀、牛角叉，通同摆出来了。这些人在晚间抢劫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力的队伍。晚间丘八老爷打冲锋，他们便接上二阵。所有各街的抢劫，一多半以上是他们干的。然而摇身一变，他们现在要保卫街坊了。还是该丘八老爷背时，已经变成了驴子，不要说别人还有关刀、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枪扭一只下来，也就把你解决了。结果是走慢了的一些变兵便都丢了性命。

最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得最厉害。一街都是包

洋货的纸头、货匣、商标，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满街都是粉。在这时候锦绣的成都城倒真真成为十里香街了。

由于自卫团搜逻得很厉害，没有出城的变兵都躲藏了起来。有的也赶快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好在改装也很方便，他们是有抢来的现成衣服。在东大街遇着这一件滑稽的悲剧。

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几位自卫团抢上前去扭着他，其中一个拦腰便给他一“梭标”①把他凿倒了。

原来这位化了装的老爷是露了马脚的。他抢的时候忘了抢裤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记的军裤。这位老爷当街便被几位自卫团结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把他的灰鼠马褂、狐皮袍子剥开，里面又现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赵尔丰这时候还住在他的总督衙门里面。他和各街的自卫团一样，都还有点机敏的手腕。各处的街头巷口都贴出了他的“总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没有印信。因为藩库烧了，存在藩库里的四川省总督的印信怕也被烧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门前，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写的字，情不自禁地发起笑来。有了这样一张避邪的符箓，想来他们一定是安全无恙的。门也不容易叫开，我又折到青石桥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时候他住在青石桥街一家大公馆里。因为他的官气太大，我

① 作者原注：矛。

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馆门前，又同样是一张符箓。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要不同一点，不比一些旧式的公馆人家，一闻枪声，一见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门逃难，剩下一座空公馆让自己的用人及邻近的无业者便把"启发"打了。——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的抢劫，彼此也在互问口令。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各街的江湖派，恢复了《水浒传》上的梁山泊的风光。他们在各街都组织公堂，牛角叉、枪矛、青龙偃月刀、大红灯笼，摆设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爷的一幕掩闭了之后，现在又是陈涉、吴广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场了。在城内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英雄，更加以各县的保路同志军进城来戍军，那真是开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蒲殿俊辈登台之后，因为纵容兵士的结果弄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时新军又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军进省戍军。这一方面算是了结一场公案，而同时也想借来作为弹压旧军、抵制新军的工具。因为这样，各路的同志军也就络续抵省。但在他们抵省

的时候，已经是兵变后的第二天。蒲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凡为瞻仰过同志军军容的人，读到贾长沙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①，绝不会认为只是文学家的夸张。保路同志军军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夸张也夸张不到。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而有的更异想天开，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拿“吊刀子”的。——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话，外边不知道叫甚么名字。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在从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出门便要带“吊刀子”，就是一双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个鞘子里面。这样的东西本是用来吃饭菜的，然而那位同志军，他把小刀抽出鞘来拿在手里，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间，大有仗着宝剑的钟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脩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

① 贾长沙，即贾谊（前201—前169），汉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有《贾太傅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语见《过秦论·上》。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保路同志会之起，直接虽是和封建社会作斗争，而间接却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直接的一步没有走完，间接的一步却完全忘掉了。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①

在营防军猖獗的时候，谁都兢兢业业地预感到一定会出甚么乱子，乱子终于出现了。现在又来了第二个兢兢业业的预感。你想，那样多的草莽英雄又闯进了成都城，这不正好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②

---

① 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

"这些感想，当然不是辛亥革命的当年的任何人所有的。我们在当年个个都幻画出了一个幼稚的梦，以为把满清推倒便可立地富强，但可怜这个梦在满清尚未推倒便早已幻灭了。"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② 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这时候大家已经忘记保路同志军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元勋，大家仍然把它当成平时的土匪看待了。

"然而本是在土匪的领导之下的一些暴民，事实上也不过是一些土匪。他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只是如象山泉暴涨了之后的洪水一样，漭山遍野的直撞横冲，发挥他们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破坏。"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在城外草堂寺旁边，自从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便计划着要设立公园，由官、绅、商、学出资合办。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豫计的是两师人。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我把行李搬进了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

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甚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

七

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①、董脩武、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

---

① 尹昌衡(1884—1953)，字太昭，四川彭县人。同盟会员。清末任四川陆军小学总办(校长)；辛亥革命后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四川军政府都督。

学校，在那儿和蔡锷①好象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甚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开创了这个例子。

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在赵尔丰交出政权时早就有很多的谣言，说尹昌衡要带领陆军小学的学生和凤凰山的新军攻打总督府。我们对于他也朝夕在期待着。然而，谣言毕竟只是谣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后，各派势力在暗中斗争了十天，结果也就酿成了一场兵变。

蒲倒了，给与董、杨辈革命党人获得政权的机会，但同时

---

①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清末任广西、云南新军协统；辛亥革命时发动云南新军起义，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有《蔡松坡先生遗集》。

也给与他们一个良好的教训：没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权。在这儿，革命党人便乐得和实力派苟合了。兵变后的第四天，我们奉天承运的尹大皇帝又在我们四川省七千万子民的拥戴之下诞登大宝了。

尹昌衡担任都督。董脩武担任财政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宰相。杨莘友担任军事巡警总监。在这儿我们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担任交通部长。其他还有多少部我不甚记忆，部长是些甚么人也不甚记忆了。总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杨，其他也不过和我们的大哥一样，伴食大臣而已。

我们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样，不是立宪派，不是革命党人，但也不是实力派。他的资格是东文学堂出身，是留学过东洋回来的，这第二批的新政府东洋帮最占优势，特别是东文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差不多又被他们包办了。大哥在东文帮里面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长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新人一上台，委实又有一番新气象。都督是名实相符的军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师新军（这在目前连四十师都有的四川当然不算多，然在当时的确是有点象孙悟空吹毫毛，在变戏法）。董太师的最高妙的财政政策便是多发纸币，多铸铜元。纸币不限于一元以上的银元，就是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铜元代用券也应有尽有了。有的是皮筋纸，你怕有甚么不能解决的财政上的困难？铜元也多样化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当五百的大铜元，与其说是铜元，宁可说是“铜镜”。但这种铜镜，在后来又

有分用的办法。一个铜镜把它剖成四色，每色又当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币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来，一定抵当得过极幽默的滑稽小说。

董脩武的德政，当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这儿所叙述的是综合着后来好几年的历史。不过这位太师他总还算是“行己有耻”的人，他后来（仿佛是民国三年的初间）终因为财政问题下了狱，而且在狱中服毒自尽了。

董脩武先生，认真说，要算是时代的牺牲者。中国人在梦里寐里时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国强兵，结果是国虽然没有富而兵倒强了起来。兵数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有限的收入里横添出无数的军费，你教人怎能不滥发纸币？发纸币本来也并不是甚么恶劣的政策，只要你有相当的信用，相当的基金。但是在中国的国度里你那里去找那种基金？中国的纸币大都是没有相应基金的，也就跟整个中国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作怪。董先生要算是死在这个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里了。

这些都是后事。就靠着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总还有了一番作为。特别是那位担任军事巡警的杨总监，他真有点雷厉风行的手腕。他的军事巡警是要背马枪的，这比从前拿着一根哭丧棍的警丁大有威风了。然而那马枪对于当时的江湖派却是无上的诱惑。政府尽管成立了，而他们摆的公堂依然存在。他们从那变兵身上抢枪的滋味是一时不会容易忘记的。这军事巡警不消说就成了他们的对头，于是乎他们也就从巡警的身上来抢马枪。弄到后来巡警站岗是两个人或三

个人背靠背地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弹的马枪。就这样，终竟也把那一时的无政府状态弹压下来了。

这从有产者的立场上说来，总要算是他们的功德。他们弹压民众的手段虽然比赵尔丰、周孝怀还要厉害，而声望却是日隆。他们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象刘、关、张再世一样。

那位二十世纪的刘玄德的确也有点刘玄德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结婚以前，便先讨了六七位小老婆，而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当了都督之后收集起来的。他人很年青，在当时怕仅仅三十岁来往，人又魁梧，面孔也还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尔从都督府里出来巡街，在他出府的时候大都督真是威风。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黑马，前呼后拥地总有十几匹马队跟着。马队在街上总是放小跑。在这时，街上的人不消说都要边让，两街坊的人家，特别是平常不大出门的女眷，便都争到街口上来瞻仰这位八面威风的大将军了。

女眷们心悬目眩地在瞻仰将军，将军在电掣风驰中其实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嫔。他的一些爱妾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中挑选出来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义转变的说话，便是“愿尽义务”。这“愿尽义务”四个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随意说出口的。原因是这样。有一次都督出府，经过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门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从她店铺门口跑过的时候，她饱看了一场。谁知都督也把她饱看进心里了。都督回府之后，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

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请她进宫。你说，那老板是怎样的答复？他很鞠躬尽瘁地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愿尽义务。"

就这样这"愿尽义务"便成为了成都人的话柄。这位尹将军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现还不仅这一点。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杨素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见他唱戏的时候，怕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他还是在唱闺门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炙手可热的。有过一位总督很喜欢他，他时常出入公门。在那时的司道府县的大小候补官员没有一个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也看上了这位老天才。他真异想天开，公然叫他扮成女眷进他的都督府。

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进都督府门的时候，却闯着了那位号称张三爷的杨总监，把他破获了。这件事情便闹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们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诏，把杨总监褒奖了一场，似乎是称他为"铁面御史"。

中国的旧社会实在是一种怪异。象尹昌衡这些行为，真是够荒唐了，而在一般人看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三妻二妾是几千年来的"礼法"，愈见是大人大物，他的妻妾便可以愈见多。当事者自以为荣，而旁观者不胜歆羡。就象尹昌衡这一个例子，他自己就丝毫没有甚么内咎的。不，不仅没有内咎，他反而在自己夸奖自己。有一次我听见过他在成都青年会演说，他的题目是"英雄与好色"。他的演说我没有听完，只是有

一个很有趣的三段论法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里。他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断）

我不是来讲逻辑的，他这个三段论法究竟犯了逻辑上的那一条错误，我现在不管。总之你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地自我陶醉！他既自封为英雄，所以我在这儿把他的佳话记述一些出来，我不是在揭发别人的阴私，我是在描写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在他的治下，那位以杀人成名而绰号“屠户”的赵尔丰终竟被人屠杀了。

快到阴历年底了，赵尔丰依然住在总督署里面。

外边对于他造了不少的谣言，说总督署里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几架机关枪陈列在大堂上，想乘机攻打出来。新政府屡次想要解决他，终不敢轻易动手。

快要到阴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许也怕是想立出一项功业来挽回他的名誉罢？他终竟派了三营人把旧总督府包围了起来。里面并没有甚么动静，他们也就攻打进去。衙门里面那里有甚么兵？大堂上面那里有甚么机关枪呢？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空得厉害的，是老卒残兵的影子都不见一个。

一直走进里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①，名叫陶泽锟。他最后终竟搜到了赵尔丰的寝室，他闯进门去，里面打了一发手

① 作者原注：相当于排长。

枪出来。

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称呼的，是否“蛮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就是这位蛮丫头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象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拖了起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斫了下来。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末路，却点缀了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

赵尔丰死后还有小小的一场波折。

陶泽锟杀了赵尔丰后，尹大都督立地升他为标统①。大都督自己把赵的首级提在手里打马出都督府，游街示众。

待他跑到东大街，从一家店铺的楼上“搭”的一声打了一枪下来，打中了他背后的一位马弁。大都督回马便跑，提着人头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

放枪的人，有人说就是帮助赵尔丰成名为“屠户”的那位傅华封。②他跟随赵尔丰一同进藏，赵在屠杀少数民族上，他

① 作者原注：相当于团长。

② 放枪的人是赵尔丰的镖客张得奎。后尹昌衡将其释放，用作卫士。

也帮了不少忙。

当成都围城时，傅华封忠于他的主子，曾率领边军救赵。但到了雅州，四川已经独立，他的部下因而溃散了。他被擒获后，尹昌衡要奖励“忠臣”，没有杀他，并把他聘为顾问。后来尹昌衡进藏，不用说傅又成为了尹的羽翼。他著过一部《西康建省计划书》，主张把四川西部和邻接地区划为“西康省”，就是要为新的主子拓土开疆了。

黑　猫

(1912)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上海《现代小说》月刊第三卷第一、二期。

一

一九一二年，这便是中华民国的元年。

这一年在我有两重的纪念：第一，不消说就是我们的中国说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结过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一场结婚的插话，现在要把它追述出来。这也是那过渡时期的一场社会悲剧，但这悲剧的主人公，严格地说时却不是我。①

我自己本来在十岁以前就订了婚。女家和我家并非亲眷，性质上完全是媒妁婚姻。但这场婚姻在未实现之前便已终结了，因为对方的女士在我十四岁还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她便死了。

由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为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在

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黑猫》初版本此段文字为：

"我自己的那场结婚的插话，现在要想起把它追述出来，那真是一场痛苦，一场耻辱，一场悔恨。我自己似乎犯不出要在这已经愈合了的伤痕上再来插进一刀。但这也是那种过渡时代的一场社会的悲剧，这悲剧的主人公，严格的说时，却不是我，我不过适逢其会成为了一位重要的演员，我现在以演员的资格来追述出那场悲剧的经过罢。"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如今本。

心中却隐隐感到高兴。在当时我已经读过一些新旧小说，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那是大有诱惑性的。那样的机会自然是水底月，镜中天，但在自己的心里不能否认总含有万一的希望。因此，我自从十四岁以后便不愿从速订婚。我的父母在这点上也很能体贴我。自小学而本府中学而晋省读书，在这期中每有婚事的提说，父母都征求过我的同意。我自己都以“不忙”二字推却了。起初的三两年，先后来提婚的有四五十处，就中当然也有门当户对的，也有的在我还是高攀的。同府同县的门当户对的人家，除掉了四五十家也就不会再有多少了。因而以后的三两年便不免“青鸾信渺”了。

一个人是经不得好几个三两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经满了十九岁。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母亲向我提起一件往事。

我们乡里有一家姓陈的，出身很有问题，因为煮酒和开药店，相当赚了钱，乡里人都把他当成暴发户。那家有两个儿子在高小时和我同过学，高小毕业之后又同过中学，暴发户渐渐变成书香人家了。当年的高小毕业生资格是“秀才”。一家出了两位“秀才”，那做父亲的当然很高兴，他自己便摆起了一副“老太爷”的架子，他并要求别人尊称他为“老太爷”。因此，乡里人便愈见恨他。

他有一位四姑娘。我们居处同街，在小时当然是见过的。不知道是有脑病还是前额骨患蓄脓症，平时在鼻下总爱挂两条碧龙。因此，我们小时候便叫她是“流碧姑”。

谁知那位姓陈的老乡竟看上了我，他要把他的“流碧姑”

仙子来许配于我。

我们母亲对我说："真是把娘气坏了，我的儿子就再没人要，就做一辈子的鳏夫子，也说不到他名下来；那姑娘你是晓得的呢。"母亲说着便把两个指头放在鼻下，我也禁不住发起笑来。"加以来说话的又是对门那位烂鼻子杨婆，——（那是杨三和尚的继母，梅毒到了第三期，鼻子已经没有了，母亲平时异常恨她。）——真把娘气得说不出话来。"

提婚已经是二三月间的事了，母亲说着都好象还有遗恨。

我说："这正是英雄识英雄，惺惺识惺惺，鼻子识鼻子呢。"

说得母亲也苦笑起来了。

在母亲的遗恨化成苦笑以后，第三段变化便转成了轻微的感伤。

母亲说："你太选严格了。你看这两三年已经全无消息，你不怕成为一个鳏夫子吗？"

"我怕甚么呢？"我说，"就当一辈子的鳏夫子也不要紧。"

我母亲说："你父亲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渐渐要长大成人……"

我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子，弟弟和大的一个妹子都已经订了婚。母亲的意思我很明白，她是想把我们弟妹的婚事及早完结，以了却一段心事。但我这位"寡人"却阻挡了弟妹的佳期。因此我说："早婚本来是不很好的，但弟妹的婚事也可以不消等我。"

这便是暑期中母亲和我的一段对话。

暑假过后回到成都，那时正是保路同志会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在铁路公司方面却在准备着办移交。我们那位在铁路公司做科员的三哥，就因为要制造种种表册，公务很忙，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那儿去帮助他一次。

是十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成都是在罢市期中，时候是在下午。天气是很阴晦的。我坐在三哥的办公室里，三哥拿了一封家信给我看。信上说，母亲已经给我订了婚。女家是苏溪场的张家，和远房的一位叔母是亲戚，是叔母亲自做媒。因为门当户对，叔母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① 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所以用不着再得到我的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这真是有点突然。母亲是那样爱惜我的，为甚么忍了四五年，在这一次却突然改变了方针？自己自然是出乎意外，但要说是绝望罢，却也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诚如母亲所说，远房的那位叔母是可以相信得过的人。她素来寡言笑，并不是专门做媒的那种人。叔母是知道我的，我的性趣，我们家里的习惯，她当然明了。女家又是她的亲眷，那姑娘是她的表妹，她为这场亲事还特地去看过人，那女子的性趣，女家的习惯，她当然也是明了的。据她说，她的表妹如到我家来，决不会弱于我家任何一位姑嫂，也决不会使我灰心。她是那样有信用的人，处事又那样周到，在母亲当然是可以不必再征求我的同意了。母亲怕我又和往常一样，一个不即不离的“不忙”便把这段天作之合的姻缘推掉。母亲自然也是出于爱惜我，她怕我

① 指张琼华（1891—1981）。

便真的成为鳏夫子，永远得不到一位女人来做配偶。母亲的心，我能够体谅。

说到我自己呢？人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动物。他总会有种种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在未订婚之前他有他的梦想。梦想的是几时当如米兰的王子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着一位绝世的王姬①；又当如撒喀逊劫后的英雄在决斗场中得着花王的眷爱②。这样高级的称心的姻缘就算得不到，或当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兰，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娱心适意。现在呢，婚事已经定了。怎么办呢？拒绝罢，③叔母是那样可以相信的人。她不是说过那苏溪场的姑娘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吗？你还要苛求甚么？她说不定就是深谷中的一朵幽兰，或者是旷原里的一枝百合。母亲的信中还说：叔母认为姑娘的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三嫂是家中最美的人，禁不住想到了年幼时在竹林下想去扪触三嫂手掌的那桩心事。是的，她或许就是理想中的人物，他们可以共同缔造出一座未

---

① 事见英国兰姆姊弟著、林琴南译《吟边燕语》中的《飓引》(通译《暴风雨》)。

② 事见英国司各特著、林琴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

③ “现在呢，婚事已经定了。怎么办呢？拒绝罢，”初版本中作：“在年青人的心境一般的梦想大都是这样。因为他自己的性格都还是一个未成品，所以他不能幻想出要怎样怎样的女子才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要怎样怎样的婚姻才是理想中的配合，那种抽象的悬拟他办不到，但他能置身在一些具体的传奇事体中，而把那传奇中的英雄来自行比拟。在年青人的心目中也尽可以说是没有理想的，他所期望的配偶，或者也尽可以把一个汛然无内容的美字来包括。要怎样怎样的美，他或许说不出来，但他总知道有这样一种对象，爱与不爱，他是所谓如水到口冷暖自知的。”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改如今本。

来的美好花园。

就这样要说是绝望说不上绝望，要说是称心也说不上称心。心机象突然取去了称盘座的天秤，两个称盘只是空空地动摇。动摇了一会之后自然又归于平静了。

二

年假回到乡里，回到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湾。沙湾有一种特殊的风气，便是家家的春联都要竞争编撰长句。街上将近有一二百户人家，而能够撰春联的却没几个人，所以结果这一二百户的春联，大概便由这几个人包办。在包办的工作中，我们家里的弟兄总是要占一两位的。在胞兄、堂兄们出了远门之后，我便继承他们的下手了。

这种工作在当时是很愉快的。别人把你请去编写春联，当成上宾一样看待，要留着你吃午饭，预享着乡里人过年用的腊味。

那一年是革了命的一年，在平常用惯了的“莺啼燕语”之外，又平添了无数的新的材料。我当年怕总共编了二三十副长联。我所最得意的有两副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员
幅竟入版图。

这就是我们当时一些少年人的心理。——我现在把这陈腐的两副对联写出，并不是想拿它们来寿世。要用旧式的有火候的眼光来说，它们当然也还没有寿世的资格。我把它们写在这儿，就只想借来作为表示那种心理的工具。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

命是革了。各省是怎样的情形，我不甚知道，请单说四川。四川自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在成都不久便起了兵变。兵变不仅限于成都，在四川省内凡是有营防驻扎的地方，四处都响应了。嘉定城是有营防驻扎的，当然也免不了遭受一次大劫。在我回家经过嘉定城时，是十二月的尾上，兵变后已经半个月了。不怕已到旧历年关，市面都还没有复原。

兵变的结果是快枪流散在民间。在所谓良民方面买来作卫身用的自然也有，但大多流落在土匪手里。四川的土匪自经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已经由秘密的集团成为公开的队伍；在宣布独立以后，更由萑苻余孽一变而为丰沛功臣。领导者既无真正的革命人材，现在又得到了快枪到手，四川的安宁，从

此便不可再问了。①

在嘉定兵变过后，快枪散到我们沙湾的也将近有一百来往枝，都是所谓五子后膛；有的是步枪，有的是马枪，听说都是从变兵手中买来的。买的时候起初是二三十元一枝，后来又卖到百元。以后大约枪也完了，人也没有再买了。在年假回家时，我们远房的一位么叔——就是那替我做媒的叔母的丈夫——他是讲江湖的人，是在执掌我们沙湾的码头。他向我

① 初版本此后尚有一段文字：

"但这些情形在当时都以为只会是一时的现象，特别是我们少年人，我们的兴趣决不是因为这样一点地方上的不安宁，过渡时代的不满意，便会把那醒狮怒吼的一场大梦容易幻灭了的。我自己在小时做文章，很得意的是爱学些子书的笔法，插用譬语。我记得在嘉定府中学堂时，先生出过一道国文题好象是'选举不必如官吏'。这是黄公度的在视察了日本初年的议会制度时的一句感想，而他这句感想在当时中国要变法自强的时候却是很大的一种阻碍。黄公度所看见的日本当年的选举是初由封建时代向资本制度的学步，所以完全呈出一种凌乱的现象；当时是所谓壮士横行时代，动辄便用刀杀人，以武犯禁。在封建头脑的黄公度看来，他的批评自然是有因的，所谓'选举不必如官吏'实即立宪制度的初期不如旧有的封建社会之有秩序与安宁。但我当时拚命的驳斥了他。我的文章里面有一个自以为巧妙譬语是，'譬之有人居处于茅庐陋室之中，屋虽颓败然犹勉强可以躲避风雨，一朝思毁此茅庐陋室而别建高楼大厦，则必毁此旧有之颓屋而重新搴积土石，奠定地基，鸠工庀材以事建筑。于斯时也，乃有不安之时期出现，其工程愈大，则其不安之时期愈久，使彼茅庐陋室之主人乃浩然而叹曰呜呼建筑之不必如茅庐陋室也，是亦愚矣。黄公度之言有类于是。'——当时文字的大意大抵是这样，我总之做的是翻案文章，对于黄公度是深加斥责的，很赢得了先生的一段好评语。这种在文章上可以发生的着想，在实际社会的批判上不消说也可以发生，所以革命过后尽管各处有兵变，尽管各处的土匪日渐猖獗，但我定要说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是毁坏了茅庐陋室，别建一高楼大厦时所必有的过渡时代的现象，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悲观，更不能够因此而诅咒革命。事实上我也不惟不悲观，不惟不诅咒，而且在那时候，我和我们乡里人还做过一些愉快的事体。"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说，想把场上的快枪通统集中起来组织一个保卫团，一方面可以保卫地方，一方面也可以预防地方上的青年拿着快枪更在别处去为非作歹。我便极力地怂恿他；不久这个计划也就实现了。

保卫团的团部设在我们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团长是旧有的团正，一位姓黎的武秀才；军师是旧有的保正，一位姓詹的文秀才；么叔便做了参谋。我们一些在省城或府城里读书的人便都做了文牍。场上的青年，不问有枪无枪，愿意加入的都做了团员。每天提兵操练，出告示，出招兵买马的檄文。檄文是我做的手笔，是四六体，倒亨不亨，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保卫团一成立有好几十枝快枪，有一二百名团员，这在乡中当然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因此邻近各乡遇着有匪难的时候便都来投报我们，我们也每每带领大兵去捉拿土匪，甚至于每每就地正法了。

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自然惹起了反感，主要就是我们村中的一部分土著。那为首的杨家，凡事都要和我们客籍人为难。我们组织了一个保卫团，他们便组织了一个保安团。枪枝没有我们多，但也有几枝。为首的叫杨朗生。这人并不是土匪，平常总爱仗恃杨家的势力侮辱客籍，久为人所侧目。他组织了保安团。显然和我们对立。我们预想到早迟免不了会有冲突的。当时也有不少的流言，说他要暗杀我们团体里的人，特别是么叔。但保卫团的人多，他也不敢轻易下手。

有一天吃中饭时候，杨朗生提着他的队伍气势汹汹地由下场走往上场。不一会他的队伍由上场又零零碎碎地搬运了

一些人家的家具下来，杨朗生在后面押着。在走过我家门口时，他朝天放了几枪。

他是往上场去抢了人回来。被抢的人也是他们姓杨的人，那是一位孤儿和寡母。因为那孤儿加入了保卫团，于是杨家便给予他一个严重的宗法上的制裁，叫他倾家破产。那寡母哭着到保卫团里来告，同时她的意思是叫她的儿子不要回家，怕有生命的危险。被抢时适逢其会她的儿子是在团里的。团里的人听着便再也不能忍耐了，顿时决议应战，便由么叔带领了二三十位团员向下场保安团的团部火神庙进攻。攻进火神庙时杨朗生已经走了，把被抢劫了的物品通同夺了转来，接着更进行第二段的应付。

杨朗生的家是在下场，离我们的家不远。有人说看见他偷走回去了。大家都认为一不做二不休，已经破了脸，这个祸根不除，将来有无穷的后患。于是当晚又去围攻他的住家。场上本有两尊大牛耳铁炮，是蓝大顺、李短􀀀“造反”时铸的。那是捍卫过乡梓的古物，但从好些年辰以来早已成为装饰品了。大家又把它们拿来活用。

两尊大炮架在杨朗生家的大门口。开炮时，一炮打响了，一炮倒灌出来，把半肚子的火药喷在两位年青的炮手身上。时候是在夜半，可怜那两位炮手就象乘着火云的哪吒，浑身都燃烧起来。两人都没有经验。如果当时倒在地上打滚，就受伤或许也不至于丢命。但他们只拚命地叫着乱跑，愈跑，火便愈猛烈地燃烧。当时大家都在专心捉拿杨朗生，还有几位攻打前门的人看见两位团员受伤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同跳进一个

"备而不用"的水缸里去，火算是熄灭了，然而人是要半熟了。

打进了杨朗生的家里，搜查的结果空无一人。大家愈见愤怒，牺牲了两位团员反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滑稽的结果。

杨朗生的父亲的老家是在场外的，在峨眉山的余势中，是一座四围有砖墙的孤独的大院子。那家的大门差不多和我们家塾的后门正对，相隔不上五分钟的路程。杨朗生既不住在他街上的家，那必然是藏在他这老家里了。

第二天规模更大地围攻他这座老家。一二百名团员总动员，远远向那院子包围。昨晚打响了的那尊古式大炮又抬去正对着大门安放了。这次有了经验，点大炮的人不直接站在炮旁，是用火绳来做引线的。布置就绪了，只等大炮一响便一齐进攻。

在这边大炮未响时，院子里先放出了几声快枪。大家愈见踊跃起来，知道是杨朗生藏在家里的证据。大炮的威力究竟不错。轰的一声，那院子的木门便是一个大窟窿。于是大家蜂拥而上，一阵的乱石便把大门打破了。打进了一排快枪之后，大家当心着涌进院子里去。

这是自有天地以来的一个奇景，在那峨眉山下、大渡河边，一个小小的乡村中会有后膛五子连珠和牛耳大炮的明火接仗！场上的人和乡里的人都忘记了当前的危险，簇拥起来观看热闹。还有乡里的农民平时受尽了杨家的剥削的，也都拿着梭标、牛角叉之类的武器前来助战了。

杨朗生躲藏着了。一个院子并没有多么大，从正午搜到午后两点钟光景，终竟在一处的地板下面把他搜索了出来。

农民们欢天喜地，当场要求，提到大渡河边枪毙。由峨眉山麓押解到大渡河边，中间要横过街面，曲折着走去可有一里路以上。在这一里路长的途中，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

杨朗生的个子很高，在一般人中他真要高出一个头地。此时他已面无人色，剪了的头发乱蓬蓬地披着。左额上因为受了一刺刀伤，有血在流。他的头是埋着的。因为人高，大家都容易看见。谁也不觉得他可怜，不少的人还在指着骂他。

大渡河边上有一株槐树，在四面渺茫的沙原石碛中单独的有这一株槐树。杨朗生被绑在槐树上面，在噪杂的人声中，怒吼的水声中，对着他尖锐地响了七枪。

三

反正以后土匪日见猖獗，乡里有钱的人渐渐感觉到生活的不安了。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甚么叫“反正”，甚么叫“共和”。一省的总督变成都督，一国的皇帝要变成“大总统”，毕竟是破天荒的怪事。大家都以为天下决不会太平下去，至少总还要大乱四五年，要乱到有“真命天子”出现。

老人们既预感着有方来的大难，在未雨绸缪中所必须完结的一段心事，便是成年儿女的婚嫁。特别是有女的父母，他们的期待尤其急迫。怕的是大乱到来，就如象中国旧式小说所爱描写的那样，女子的贞操很难保全。

在我年假回家之后，苏溪的张家便有信来，希望在一两月内便行婚礼。这次我在家中，父母是征求了我的同意的。我

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我反正是订了婚的，我自己不曾挂过独身主义的招牌，早迟免不了的一关便是结婚。她不是人品很好，又在读书吗？她处的是乡僻地方，就说读书当然也只是一些旧学。但只要她真正聪明，旧学也有些根底，新的东西是很容易学习的。我可以向父母要求，把她带到成都去读书。我也可以把我所知道的教她，虽然说不上是有爱情的结合，我们的爱情不是可以慢慢发生的吗？——是的，这点便是我的机会主义。① 成都人有句俗话："隔着麻布口袋买猫子，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才是黑的。"万一是黑的你怎么样？难道把它杀掉不成？所以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②

我赞成了结婚。结婚的日期我已经不记忆了，好象是阴历正月十五前后。那时的清廷还没有倒。虽然已经是民国元年，但我的结婚仪式一切都依照旧式。只有我自己的衣服很简单，一项便帽和长袍马褂。

结婚的仪式别处是怎样我不清楚。我们四川人结婚一般是要费两天工夫的。头一天是男家打发花轿到女家去迎亲。这一天是女家忙，男家除在白天接接客，晚来有花宵要放烟花

① 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也怕是一般的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国民性，简单一句话，便是机会主义的结晶。但那机会主义的培成，我想这媒妁结婚便应该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② 初版本此处尚有以下文字："两千年来中国人便困顿在这两重的软禁之下，不是把所有的民族的菁华，或者是人性的菁华都消磨殆尽了吗？"收入《沫若文集》第六卷时删去。

火炮之外，比较清闲。第二天是新娘到门，结婚的最高潮便在那夫妻的交拜。不消说这一天的男家是十分烦杂的，遇着客多时，还要闹你一个穿夜。

苏溪离嘉定城有二十里路，离我家有五六十里路。时在春初，新嫁娘第二天上午要赶到沙湾，在头一天晚上必须走点夜路。路途不清静，事实上的红叶——我们么叔，便特别从保卫团里派遣了二十个人，背着五子后膛护送花轿前去迎亲。原始时代有所谓掳掠结婚，我想那打花轿去接人大约就是那种婚姻的孑遗，而我这一次更有“武装同志”帮忙，我真好象是那一族的酋长了。

本来是杂乱时候的草率结婚，除掉自己的家族和街坊邻里之外，没有什么来客。头一天我很清闲。晚上闹花宵也没有甚么可以记述。花炮、蛇须箭，放了不少。烟火树也有两株。

晚上我在母亲的房里，父亲在外边照应。母亲在替我收拾一些换洗衣裳。我在前一直是睡在和母亲的房间相联的一座厢房里的，我的换洗衣裳都放在母亲房里的衣柜里面。

母亲说：“你这些衣裳明天就该拿过你自己的房里去了，我替你收拾好。”

“妈，你没收拾，我看我是不拿过去。”

“你不拿过去？那怎么行？娘已经管了你二十年，你现在已经有人服侍了。”

母亲的声音不知怎的，听来总觉得有几分伤感。是的，古人说过：“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①

① 语见《孟子·万章上》。

更拿俗话来说："结婚以前是娘的儿，结婚以后是婆娘的儿。"做母亲的人临到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了，一方面自然觉得她尽了哺养的责任，乐得儿子已经抚养成人，但同时在事实上她的儿子就如羽毛丰满了的雏燕，是要离开她了。这却认真是无可挽回的一种悲剧。

我沉默着了，母亲也沉默着了。默坐了一会我打了几个呵欠，母亲叫我到厢房里去睡。母亲说："你早些去睡罢，明天你还要劳顿一天，说不定晚上都不能睡觉。"

我迟疑了一会，母亲又催促了我几番，我也就起身进厢房里去了。

厢房里有两尊床，一尊是我兄弟睡的。南面有一堵方格纸窗，窗下有一张方桌，桌上堆着一些我们平时喜欢看的书。那时候我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①。我特别喜欢《庄子》。我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古今无两。

窗子的西边一堵粉壁上挂着一张死了的五嫂的画像，那是五嫂死后五哥在成都找人用铅笔画的，在前本挂在他自己的房里。但不久五哥便续了弦，新五嫂怕看见死人，五哥便把她取来挂在这厢房里了。画像相当朦胧，总带着十分凄凉的情调。

我进厢房去，在昏黄的菜油灯光中，又望到那张画像。五

① 严几道（1853—1921），名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天演论》译自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前两章。《群学肄言》，即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的译本。

嫂的样子依然十分凄凉，眉目颦蹙得更加厉害。

我把衣裳脱了，顺手从案上拿了一本《庄子》来，倒睡在床上。翻开《齐物论》来读。——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偶。

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者也。……

泛泛地读了一阵，心境不定，又把书抛开了。

突然想起了五嫂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两年半前的暑假，在一个月夜，就在这厢房的南窗外对我说的。"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无端地有点凄凉，我是感觉到好象失掉了鼓舞的力量。

眼泪不知不觉地涔进了眼里。

四

第二天上午，结婚仪式渐渐在达到高潮。每来一次客，厅里的吹鼓手便呜迭哇呜迭哇地吹打一遍，雇用的一两名水烟师就象鹦哥一样，死命地高叫："有客来了，装烟倒茶！"人愈来得多，那原始的音乐、原始的宣传便愈见频繁。四围的人声和呼吸凑成了"热闹"。

第二进的敞厅上是供着家神的。厅前一直到临街的几重门户把门扇门框都卸下了。在神龛面前平摆着两张方桌，系上一条长桌帷。上面放着一对高大的红烛。这桌面是预备来陈设礼品的。台桌前面在地上敷着红毡，下面掩着两个蒲团。

十一点钟左右，有先行的跑回来飞报，说花轿只离家四五里路了。一切情形自然更形活动，我的表演也就开始起来。一位伯母，她引导着我在那红毡的沿边上，从左踏去一步一步地踏它一周。这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都不能理解。

左旋右转地敷衍了一会，在不很远的下场口轰撞统的三声铁铳。大家都齐号叫“到了！到了”，一家的男客女客都从四处迸射了出来，把礼堂、礼堂下边的天井、天井上边的两厢，和第一进的中堂，两边两岸都塞满了。邻近四街的人男女老幼也都簇拥了来，聚集在大门前，有的更涌进了第一进的中堂，达到天井沿边。

轰撞统——更凶猛的又是三声铁铳。两队吹鼓手，迎亲回来的和坐镇的，一齐都在呜迭哇东匡地吹打。鞭炮声、叫声，轰隆隆震天价响闹。

花轿临门了。在进门之前乡里人有一种习惯，要由一人（有时这人就是新郎）提着鞭炮在花轿周围环绕三遍。——这或许也是古时掳掠结婚时，把女子抢来后，男子的示威或自鸣得意罢。但在乡里人是说，为了避邪。因为新娘是别家人，怕有别家的邪神邪鬼附在她的身边。

花轿抬进了前堂，放在礼堂下的阶沿边上了。在这儿要行一次拜轿的手续，是要由男家的一个小辈，有时是新郎自己，向着轿门拜三拜。拜了之后，新娘才肯出轿来。在新娘方面对于拜轿是要预备拜轿钱的，在她出轿之前要先把拜轿钱抛出。——这一种习惯乡下人没有别的解释。我想，怕又是母权时代的孑遗，男子要向女子低头，女子要给男子以给养。

花轿是用重重的装饰帷幕围得水泄不通，拜轿之后，轿门才打开。轿里怕要闷得半死的新人被伴娘伴母几拖几扯，才扯起了身来。我看见了有一只脚先下轿门——“啊，糟糕！”我自己在心里叫了一声，因为那只下了轿门的尊脚才是一朵三寸金莲！

新娘的一身是通红的凤冠霞帔，脸上在几层盖头之上更罩上一层红的盖头。那新娘的眼睛不消说是完全被蒙着的，她的一切行动便要全靠着伴娘和傧相。新娘和新郎并立在神桌面前，由一对证婚人把桌上一对大红烛点燃。有人在赞礼。新郎和新娘转身过来先拜天地，回头又转身过去再拜祖宗，接着是两人相对作一夫妻交拜。这一交拜过后夫妇之道便算成立了。这自然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神前结婚的遗习。古时的所谓神就是生殖器，所谓神前结婚就是在神前交媾。交媾过后自然男的便成为女的的人，女的便成为男的的人。但其后人文进化，多费手续，由交媾变相而为交拜。于是乎枉矣冤哉，说那样一下两人便成了夫妇！

交拜过后是入洞房。这入洞房的一幕很有趣。分明是在白天，新郎一只手要掌着一盏烛，一只手是牵着新娘头上盖着的一张黑色的纱帕。不消说新郎是在前面走，蒙头盖脑的新娘是由伴娘和傧相及其他的人簇拥着跟在后面。这个情景令人怎样也不能不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那蒙头盖脑的新娘被新郎牵着的，不正是才由异族得来的女俘虏吗？结婚的寝室叫作“洞”房，进“洞”房时白天都要点烛，那不还表示着一个穴居野处的风习吗？

洞房的设备那又是一个时代。一切的大小器具都是女家运来的东西。这不消说又是母权时代的局部再现。

新郎和新妇进了洞口，并坐在一座牙床上，要吃“交杯酒”。——是由第三者端两杯酒来，让新娘和新郎各饮一杯，但只各饮一半，余下的又由第三者交换到两人手中，让两人各各饮下。这种仪式或者也怕就是接吻的转化罢？喝了交杯酒之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对面的仪式是由新郎把新娘头上的脸帕揭开——事实上是已由伴娘揭下了好几层，只剩着一张黑色的纱帕了。我被人指导着去把纱帕揭开。——“活啦，糟糕！”我在心中又是一声喊叫。我没有看见甚么，只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

真是俗语说得好，“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

以后的情形我不甚记忆了，只记得有一人把那新娘头上的黑巾揭下来揣在了我的怀中，我便走出洞房。——这或者怕就是刚才牵着走的那张黑巾，女奚奴归顺了，系囚用的绳索当然要由男子来收藏了。

象这样，全部旧式婚礼都是原始时代的孑遗。在一天半日之中，人类的子孙把他们的祖妣要经过几千年或者几万年的野合时代、母权时代、寇婚时代，交错地再演出来。这些古习并不是说因为它们原始，因为它们蒙昧，便可厚非，所可厚非的是再演出的这些古习仅存其残骸，遗却了它的精髓。野合时代的结婚、母权时代的结婚，是双方合意的。就是掳掠结婚，在女子自然是不公平，但当时的社会已成男性中心，至少

也还有男性的片面的选择。能够占有俘虏中最美貌的女子的人，必然是战胜者中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所以结果还是美人良士成为配偶。但到婚姻只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后，男女双方便都是“隔着口袋买猫儿”了。一错铸成，终身没改。男女双方的一切才能精力便囚系在命运的枷锁之下长此活埋。中国人的民族性日趋偷懒，日趋虚伪，日趋苟贱贪顽，日趋阴贼险狠，难道这种婚姻制度不正是一个主因吗？

我总之是结了婚了。以后还拜了父母宾客，磕了无数的三跪九叩，稽首顿首。我昏昏蒙蒙地也就到了晚间。我说我头痛，倒在我照常睡惯了的厢房里的床上睡着。别人要去闹房我也不管，我只是死闷地睡着。

聪明的母亲是明白的。尽管父亲在担心着，要来看看我的舌苔，审审我的热候，怕我又得了甚么急症；然而母亲是明白的，她三番两次地走来，坐在我的床边。母亲对我说：

“八儿，你这样使不得。你要晓得，娘是费了一番苦心。你么婶的话，我是信以为真的。谁晓得她看错了人呢？”

母亲暗暗地也在埋怨么婶。她说么婶看错了人，这是忠厚的原情话，或许也怕是真实罢。

“脚是早迟可以放的，从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虽然不如意一点，但你一个男子不能在这些上就要灰心。你看你的大嫂怎样？你的前五嫂和新五嫂怎样？不还是一些平常的面貌吗？你大哥、五哥也不见说闲话。诸葛武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丑陋的妻子吗？你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够在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点，只要性情好，只要资质高，娘

一面教她些礼节，你自已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诗书吗？”

我始终沉默着。

母亲最后又责备说我不孝。她说到父亲为我经营治婚的费用和一切的准备是怎样地操心，单这两三天的奔走应酬又是怎样忙碌。安排这样，又安排那样。事情妥当了，刚好松得一口气，我又来做过场，使他苦闷。我这不是做儿子的行为，也不是做人的行为。

是的，母亲的责备对我那时的麻木是顶门一针！我自已已经陷入了命运的网罗，我何苦要把这种无聊的苦楚，还要移加到已经劬劳了一世的二老身上？这不能怪别人，这悲剧也只是我一个人在演。于是我又挣持起来。母亲怕我明天不去回门，我也答应去。我母亲也才放了心，她大约以为我是有意效法诸葛孔明了。

五

别处的风气是怎样我不知道，在我们乡下结婚之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是要“回门”的。所谓“回门”就是新郎跟着新娘回到女家去，在那儿应酬一天。女家在那一天是特别热闹的，就如男家迎接到新娘的那一天一样。

很高兴大家的闹房。自己自暴自弃地喝得一个大醉，第二天清早头昏眼花地要陪新娘和昨天新娘家里来的人一同坐船到苏溪。苏溪不在大渡河边，船到水口场，在那儿登岸再西走，还要走十来里路。水口场、苏溪、嘉定城：恰好构成一个等

边三角形。苏溪本是手工业有名的地方，嘉定的大绸出产在这儿。这儿又因为是苏东坡到过的地方，所以才有苏溪的名号。据乡土学者的诠索，苏溪是应该写成“苏稽”的。

我本来是有些晕船的人，又有宿醉，一上船被河风一吹，我便呕吐了起来。新娘在这时已经就在执行她的妇道了。她听说我在呕吐，便打发她的伴娘来问我，送了一些蔻仁来。好意我当然接受了。新娘是吃水烟的人，回头她又把她的水烟袋送到我的轿里来，这就不能不婉谢了。

船动身得太迟，到中午过后才赶到了苏溪。女家在场外，是张家一姓聚成了一个村落。在一处古老的松树林中我下了轿，由一个石阶上被人引进了一家院子。院外是一面的砖墙，进门去便是一个很大的四合天井。我被引到靠下墙的一间客厅。客厅当中一个圆桌，左右两排茶几坐椅，正中的壁上贴着一幅锺馗的画像。起初是把我插在这儿，不一会又来一位有一脸麻子、一脸烟屎的人，有五十上下的年纪——这后来我才晓得便是新娘的父亲，——又把我引进左手的耳房。这儿一进门也是一张大圆桌，靠侧壁也是一排茶几坐椅。是一间长条耳房，左手壁底有两尊卧床相对，中间夹着一道小小的窗眼，是嵌在院墙上的。窗下一个小台桌，上面放着几管旧式的前膛枪。铺上有四位人在对靠着抽大烟。右手靠天井的一面是三堵方格窗，都是向内推开着的。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段有一带耳窗。窗下有一张长书案，案左靠壁一个书橱，也有一些书籍。

那位丈人把我引到靠壁的一只坐椅上坐下。他替我倒了

一碗茶，回头便进内堂里去了。我便一人坐在那儿，在两尊床上抽大烟的也没有人起身来管我，我也没有打招呼。窗外有不少的人簇拥着偷看。

窗外天井中的吹鼓手在不断地吹奏，也同样地听着些水烟师在招呼客人。

闷坐了好一会，里面的准备好象已经停当了，便有人来招呼我进去。穿过天井走向对面的内堂。天井中的吹鼓手大吹大擂起来。内堂内外都拥挤满了男人女人的头，都带着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在等着看我。我自己觉得好象在唱猴戏。但我这匹猴子所见世面究竟太小，我被人看得有点惊惶，头也不敢抬，眼睛也不敢邪视。内堂里面的布置和家里差不多，拜客的仪式也相仿佛。究竟拜了多少久，磕了多少头，我弄不清楚。

好容易拜完了，又退回到对面的耳房。圆桌撤去了，摆着了两座方桌，桌上已陈设着酒席。接着有不少的男客进来，每来一个人和我招呼一下便走到桌上坐下了，想和我谈一两句话的人一个都没有。外观上象学生的也没有一个。我自己怀着一腔的闷气，但也正乐得没人来和我谈话。我所希望的是早点开饭，开饭过后或者能够优待我，引我到一个偏僻的房间。我并不是肚子饿，我是想倒在一个可以睡的地方去安放我这一个不容易支持的身子。等到上灯的时候饭才开了，那四位烟鬼起来和我同席，也彼此都没有打招呼。我胡乱地吃了一些，又去闷坐起来。别的人猜拳赌酒地闹了好一夜。

席散后又摆上圆桌，这次拥挤了不少的人进来在圆桌上

开起“红宝”来了。——所谓“红宝”，在乡里人又称为“四门滩”，有甚么青龙、白虎一类的名目。铺上抽大烟的人又在腾云驾雾，桌上赌红宝的人真是如冈如陵。我一个人恰好象流落在一个沙漠里的乞儿一样。我闷坐得不耐烦，便大着胆子走出耳房，耳房外的客厅中也同样挤着一大堆人在赌红宝。——“啊啊！糟糕！”我自己心里禁不住又这样叹息了一声。

我依然折回耳房来。这次那书架上的一些书又钻进我眼里来了，我起了一个好奇心，想去检查一下那是些甚么书。除掉一些旧戏本、旧小说如《天雨花》①之类，以及八股时代的参考书之外，却寻着了一部古版的《文选》。这好象在千里之外遇着了故人。我禁不住把灰尘蒙紧了的书从架上取了下来。我想这家人大约也是所谓旧家，看那院子的结构很古，房屋很低，而在书架上又有这部《文选》。可怜的这部《文选》，却被博徒和烟鬼抛撇在尘垢中，有谁来过问呢？

我把江淹②的《恨赋》翻来读了几行，窗外又突然听出一片嗤嗤的女人的笑声。但昭明太子总算解救了我的苦境，他怎会料到，他的《文选》会在这样的情景之下陪我半夜呢？

主人家里没有钟，我自己也没有表。夜半过后怕已经有好一会了。那始终靠在床上抽大烟的人大约已经把瘾过足了，有两位起来伸了懒腰。有一位喊道：“喂，该没事情了？我们想赶回城里去啦。”

---

① 一说清陶贞怀（女）著，一说浙江徐致和著。

②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南朝梁文学家。有《江文通集》。

他们又抓着了一位赌钱的说："你们那一位走进去请一位主人来，说我们要回城里去。"

回头我那位丈人公才走了出来。那四位烟鬼已经揹好了他们的前膛枪，准备要动身了。他们一看见丈人公出来，便一同打拱。

"哦，张大爷，今天打搅了，我们想不会再有甚么事情了。我们要赶回城里去。"

彼此谦套了几句，那烟鬼们也就走了。我很怀疑，那是几位县城里的"差班"，怎么会到这儿来当成上宾看待？丈人公送走了差班，又进来把赌博的人叫散了。他来招呼我，要我到一尊床上去靠。我倦得已经没法，管不得甚么干净不干净，便依着他的劝诱，走去靠在一边的烟盘子上。这回是他睡着抽吸起来了。他自然也和我客气了一番，也向我问了一些省里的情形，他连连地在叹息，说反正过后世道愈见乱了。

我这时候冒着胆子问了他一句："刚才走了的四位是甚么客人？"

果不出我的所料之外，他说："那是城里的差人呢。"

——"是亲眷吗？"我又问。

——"哦，"他惊愕着回答，"不是的。是我们请他们来的。"

——"请他们来的？为甚么呢？"

——"唉，"他一面开着烟，一面慢慢说，"前天多蒙姑爷家里费心（他称我是姑爷），派了二十只后膛枪的队伍来接我大女儿。我大女儿的福份真然不小。不过这近处的一些

'二五'①，一看见了眼便红起来，在外边放出谣言说要来抢枪。我想万一今天姑爷来，遭到了这样的事，那可不是小事。所以昨夜才连晚派人进城去请了四名差班来保护。幸好今天姑爷来没有带队伍，今天看来，不会再出事情了。"

主人这样的关心，不消说我也感谢。我想那四位烟鬼一定使他破了不少的费。别的且不说，便单是大烟来说，恐怕也饱吃了一二十两罢！不过我也在想：万一真有"二五"要来抢枪，我倒不知道那四管枪，抵得着甚么事？

主人还和我谈了不少的话，好象谈过当年的收成，又好象谈到过大烟的涨价，更好象谈过一些真命人主的待望。……我起初还在勉强支持，后来我实在支持不住，各自睡熟了。他把瘾过足了是几时我不知道。他把我摇醒了，叫我起来把衣服脱了打横睡。我模糊地起来，看见对床的帐子下了，帐内有好几种鼾声在作战。圆桌上也摊睡着了好几个人。等主人走了，我刚好睡下之后，圆桌上睡着的人一连走来了三个，那是来宾或用人，我分别不清楚。他们一来，便一同倒在我睡着的床上。我以后便再也不能睡了。我索性又起来穿好衣裳，摊开昭明太子的《文选》，读到天亮。

六

我的结婚受难记在这儿便可以结束了。但在第二天回家，

---

① 作者原注：大约是土匪的别名。

才知道乡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就在我去回门的那一天，城里也有一队差人到了沙湾。他们带来两件知府的公事：一件是命令把保卫团解散，另一件是传票，传保卫团团长黎武秀才、军师詹文秀才，还有我们么叔，进城去过堂。

原来是打死杨朗生那件事情发作了。杨朗生的父亲杨敬臣，在他是杀子之仇不能不报，他在城里告了状。府县的知事那时都还是旧人，知府姓李，是云南人，和城内一家姓李的豪绅认了同宗，而这豪绅李家恰好和杨家是有亲谊的。就由这样的因缘，那知府便准了状子，保卫团的人事实上便成了罪人。大家很愤慨，尤其是我们年青人。有人坚决主张，倒不如率性带着八九十只快枪上省去成军，八九十枝快枪包管可以成立一营的。么叔很有赞成的意思，但无奈那名目上的首领黎团长詹军师却一致反对，他们认为事情并不那样严重。城里我们也有熟人，而且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靠背，便是我们的大哥在成都当交通部长。所以他们说，文有文干，武有武干，这一次要进城去文干一下了。

文干是怎样的呢？一方面自然是托人疏通，另一方面也来讲究法律。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制造一个事实来遵照法律。于是乎我们因公愤和众怒打死了一个万恶地主，而在法律的要求之下，便不能不变形为杨朗生的保安团和我们的保卫团冲突，不免互有死伤，保安团方面死的是杨朗生，我们这边也死了两个（就是那点大炮误烧死了的两个）。这样一添改，就如象一首自然诗添改成了一首试帖诗一样，表面是

很循规蹈矩的，然而诗却到那儿去了呢？

方略是决定文干了，大家依然怕有甚么差池，所有保卫团的重要分子都自愿随着三位首领下城。假使府官不讲理时，大家便要一齐请求连坐。

包了三只大船靠在大渡河边，就在我结婚后的第五天上，一同准备下城。其中有一只是我们家里自己包的，因为我们的大嫂也要上省，我和我的一位兄弟便担负着护送的责任。

母亲是不愿意我们这样快便离家的，但我的借口是一方面不能不跟着保卫团的朋友们进城，另一方面是省城的学校也快要开学了。由于我的坚持，所以大嫂们的动身也提前了一步。

母亲大约是看见我默默寡欢，她也很明白我急于要离家的心事。当我们清早上船时，母亲戴着一顶红风帽，携着我们一位小妹子为我们送行。走出场口之后河风很大。母亲拄着一根五哥由东洋带回来的手杖。河风阵阵吹来，每每使她不能不伫立，或微微后退几步。我便倒退着在母亲面前走，希望可以挡挡风头。母亲是把口掩闭着的，沿途都没有说话。由家离河岸大约有半里路的光景，走到河岸时各船都已经上好，早在等着我们去开船了。母亲已来不及上船，只立在河边上向大嫂吩咐了一些，回头船也就开了。母亲最后在岸上呼唤我：

——“八儿，你要听娘的话。娘已经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罢！”

船上的大嫂听着哭了起来，我也禁不住眼泪潸潸的。我

只是说：请母亲莫担心，请母亲回去。船开后，母亲立在岸上总是不动，一直等到船远远地转了一个湾，我们才看不见了。

大嫂在船上还哭了好一会。她也带着眼泪劝我说："八弟，你当真不要到远方去好呢。"——一个男子在女性的眼中看来，好象是多生了一对翅膀，只要一想到远方，一翅顺风便可以飞去。其实在我心里反在为这件事情焦愁。我就想到远方，却怎么能去呢？不过母亲的悲伤我是始终受着感动的。那时我在船上做过几首诗，有一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
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下船之后在城里耽搁了两天，保卫团的事情果如詹大军师所料，用文干的方法来了结了。剩下的责任是护送大嫂上省。在那两天之中大嫂向城里的亲戚处都去辞了行，同时上省的走法也决定了。由嘉定上省陆路只要三天半，自然很快，但大家认为路上不清静，走陆路不好照料，恐怕会发生意外。于是便决计走水路。走水路是由府河溯航，要费十天半月，谁也不能预定。水小船多，有时遇着过滩，狭窄的水津只能容下一只船，那时便要轮班，几十百只船挨一挨二地轮班过去。象那样，过得一滩要费你一天半日，或三天两天都说不定。愈朝上去，这种滩口愈多。但好处是同在一只船上易于照料，而且每晚落宿处都有无数的邻舟，这于防范匪患上是要方便些。

结果是走了水路。

女性的虚荣心，在我看来，似乎是要强些的。大嫂在城里做了一对灯笼，一边写着“四川军政府”，一边写着“交通部长郭”。白日夜晚她都要打在船头。我很反对她，说这样反遭人注目，但总不能把她说服。在她的意思，认为这是一种护符。每天在船上都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特别是在晚间．在那时以为是可以保险的邻舟却好象是一只一只的贼船，使你怎么也不能放心。上水船大概都是一些货船，搭载客人的很少，护送家眷的更是没有。那些船上的水手一个二个都好象是《水浒传》上的阮小二、阮小七。有一天晚上，船到了彭山，在夜空中突然听见了几声枪，大家都有点不寒而栗。隔不一会有两只县正堂的灯笼打到岸上，来人是几名差役。他们拿了一张县正堂的片子送上船来，我到船头去应话。他们问明了是护送家眷的船，便又各自走了。回头那几位差人又来传达那县正堂的话，他说地方不清静，官家的势力薄弱，希望我们不要点灯，怕的匪人以为是解送银杠的船，失了事他不能担戴。这回却把大嫂也骇着了，她不能不把她的灯笼顿时收拾了起来。

在路上足足担心了十三天，倒还好，船到了成都。在这时另一悲剧又发生了。

大哥回到成都已经一年了，起初的半年是住在皇城里的一处公家的地方，“反正”后因为皇城要改成军政府，他便搬进了青石桥街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在成都虽然同住了一年，除掉礼拜日去看他一次和他每礼拜到分设中学的甲班来讲课

一次之外，他的私人生活我是不大清楚的。

大嫂的上省，他本来早就要求过，但家里的二老不允许。足足隔了一年，他做了部长了，在这一次又才达到了目的。

原来在那青石桥街的公馆里，我们大哥才已经有了一位新的爱人。那是很美貌的一位下江女子，一般人称为李五太太。听说是从前某一位道台的遗妾，那公馆本来是她赁居着的地方。

大嫂动身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去通知。她存心要使大哥于无意之间得到她的到来，可以加倍地使他感受着喜悦。她一来便落到青石桥街的公馆里，在大哥方面是不曾早作准备的。这自然就免不了的有一场遭遇战了。

开始便是上下房之争，大嫂要争住上房，而那位本来住着上房的李五太太却不轻容易屈服。这使我们的大哥自然为难不少了。但我们大哥到底是一位大政治家，在我们下一个礼拜日去看他的时候，老大嫂已经好好住在上房，而那位新大嫂移居在下边的耳房里去了。

那位新大嫂的李五太太，是很会拉弦子的。以后凡遇着礼拜日去时，每每听见大哥的音声在和着新大嫂的胡琴低吟浅唱。唱的多半是川戏的《唐明皇惊梦》，是那“贤妃子比从前花容稍减”的一节，或者便是《赵太祖斩红袍》，唱那“孤王酒醉在桃花宫”。我们路过耳房窗外时便要先叫一声“大哥”，接着他出来便跟我们同到上房去。那时大嫂总是在床上闷睡着的，大哥不怕我们在面前，也要去抱着她亲吻。

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大哥不知道几时公然吃起了鸦片烟来。这项，他也没有向我们回避的气色。一等大嫂起了床，他便把烟家具来摆在床上。我有一次也实在忍耐不住了，问过他一句："为什么要抽大烟呢？"他答应我说："你那里晓得！成都的官场抽大烟当于在吸'三炮台'①！"

是的，中国说是反了正，我自己默默地也就无话可说了。

七

反正后，成都的学界也焕然改观。最可注意的是一座成都城有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数，学生也愈见多。那时候真可以说是做官欲的洪水时代！中小学堂的学生都受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因而父子同学的佳话，甚至祖孙同学的美谈都有出现的。

分设中学是被裁撤了，剩下的两班人归并进成都府中学。

那时候所有稍微出色一点的旧教员大都去做官去了。留下的一些残渣剩滓，那真是犯不着要再费笔墨来形容。当时凡是诚实一点的学生学无可学，事无可做，大都迷失了方向。据我所知道的，比较好的学生有两条路，一个是进存古学堂，一个是入南门外的华西大学。因为前者还可以学些旧学，后者至少可以学几句英文。

说到我自己呢，我是经过了重重失望的人，我差不多是甚

① 作者原注：一种纸烟的牌名。

么希望也没有了。我有一个唯一的希望便是离开四川。然而连零用钱都不能不仰给于父兄的人，你怎么离开呢？在这时是我最危险的时候。我拚命地喝大曲酒、打麻将牌，连夜连晚地沉醉，连夜连晚地穷赌。那时的学校是不住堂的，上课也很自由。我有一次连打过三天三夜的麻将牌，打到后来几乎连坐都坐不稳了。不打牌不吃酒的时候便是看京戏（革命的结果把京戏输入了四川），学做成都的所谓“弹神”①，总是要坐在戏场中的第一排，对于自己所捧的旦角怪声叫好。比这些稍微正气一点的便是学做歪诗；不是用杜工部《秋兴八首》的原韵拟出一些感时愤俗的律诗，便是学学吾家景纯②做几首游仙或者拟古。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点肉麻。然而在那时候的青少年，你要他的肉不麻，那就只好叫他自杀了。

那种自暴自弃的肉麻生活，我在成都足足过了一年半的光景。大哥也很不满意我，他有时间接向人说，我年纪青青的便沾染着一肚皮臭名士的怪脾胃。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也和我的批评他一样，彼此虽然晓得了彼此的坏处，而彼此都不曾推察到致坏的理由。

大哥做的是交通部长，所当管辖的自然要包含铁路上的事情。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四川的反正，乃至中国的反正，是起源于争路！那么一反正过后，照理第一步所当积极进行的，不就是修路的事吗？然而反正过后，四川的铁路学堂因

① 作者原注：不良少年。

② 即郭璞（276—324），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著有《尔雅注》、《山海经注》等。所作《游仙诗》今存十四首。

为没钱经营已经停办，川路公司也无形解体了。我在当时还不曾弄清楚除开清政府和旧时封建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大怪物，使你中国的铁路乃至其他的产业都无法经营，使那经营铁路和其他产业的人都不能不腐化。我只以为这是我们大哥耽溺于腐化的生活而遗误了国家的大业。我们的脑筋实在单纯，竟不曾深入地想一想，就是大哥所吸的那鸦片烟，本来是从那儿来的？

二月尾上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各省军政府改部为司。不久又缩小范围，除民政、财政、司法、教育四司存留之外，交通司也被裁撤了。在这时有所谓征讨西藏的问题发生。

西藏在英人的觊觎之下，在清朝末年早就有脱离羁绊的危险。前有赵尔丰的武力坐镇，毕竟也并没有甚么根本的措施。反正的结果屠户的赵尔丰遭了屠杀，他留在川边的残部因而更勾结藏人作乱，时时有内侵的形势。

当时天下的豪杰差不多都以自请征讨西藏为荣，而终竟担负了这个荣誉的是四川的大都督尹昌衡将军。

尹昌衡大将军，那位自称为"好色的英雄"，就因为好色的结果，弄得来在成都的声名一败涂地。同时省内本是有两个军政府存在的，重庆的一个是民党在主持。这两个军政府，也就和我们的两位大嫂一样，时常争持不下。正在那西藏问题紧急的时候，重庆方面更有以武力来袭取成都的形势，成都的民党在准备内应。在这时，那进退维谷的尹昌衡才利用了征讨西藏的名目，作以退为进的应付。

这个策略在尹将军是收到了一时的大成功。他博得名震

海内，俨然象是诸葛武侯复活——这自然是指“七月渡炉”①的一节。民党分子震于他的美名，便不好过分露出争权夺利的锋芒了。于是，尹昌衡便把都督的位置暂托胡景伊②代理，而成、渝的和平合并也就成立在胡景伊的手中。

尹昌衡出师西征的一天，那在四川恐怕是自开辟以来的第一个盛大节日。誓师的地方是南门外的武侯祠，满城的官绅商学各界都出城送行，特别是学生，听说是有好几万人（我自己实在罪过，当时并没有去送我们这一位爱国将军）。在武侯祠附近都站立着女学生，等尹将军一到，便一齐成了散花天女，满天满地都散着通草花。

这个光景大可以说是千秋盛事了。不过要晓得，那花有一半是尹将军自己命人办的！还有一半呢？还有一半是商会的义捐。成都的商会有那样的爱国至诚吗？你假如要这样去称赞他们，那商家一定会笑你。他们会告诉你说：“先生，你太年青了，我们玩不出那样的花样。你要晓得自反正以来，成都城里平空地添了几十万军人，而这些军人们都使用钞票，小店主们实在吃不消。如今尹都督要带领大兵去西征，这是何等的功德，所以要备点香花来送神。”

是的，成都实在就为军队和钞票苦得要命。那时的带兵官还没有甚么地盘观念，他们都想住在那锦绣的“小巴黎”，不

---

① 尹昌衡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出师西征，驻军打箭炉，作者谑称为“七月渡炉”。

② 胡景伊（1877— ？），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人。曾任四川陆军军团长，一九一三年七月任四川总督。

想移到地方上去驻扎。怎样使兵队分驻也是当时大家所焦头烂额的问题。尹都督西征一举的确是附带着解决了一项困难。然而商家的打算也依然错了。他们没有想到兵是可以增加的，旧的去了，新的会源源不绝而来。四川在反正时有十四五万大兵的，后来不是增加到了四五十万吗？

在尹昌衡西征以后，不久大哥便失了业。他也就步了尹昌衡的后尘前往打箭炉。大哥这一去也解决了两位大嫂的一场纷争。象打箭炉那样偏僻的地方，加以又在军事期间，两位女将军不消说是不能同去的。旧大嫂很不弱，她决心坐镇成都，新大嫂的李五太太便被送回嘉定城去别营菟裘①。但随后这位新人不知道又跟着那一个先生走往那儿去了。

我要再来谈谈尹昌衡去后的后事。

尹昌衡所寄托的那位胡景伊，是四川最初派遣的日本留学生，是由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他这人以前有怎样的功德我不知道，但在他代理四川都督以后，他真可以称为四川的小袁世凯。他人矮胖和袁世凯相仿佛，就是行事的手腕也很有一种奸雄的本色。他接事以后便雷厉风行地施行高压政策，在短时期间把四川的军民财政等权几乎全都弄到了自己手里。他的高压政策，可以把杀死朱山一事作为一斑。

朱山自从保路同志会在铁路公司开成立会的那一天、他一拳打破了一个茶碗以来，由川东的争路游说员一变而为铁

---

① 语出《左传·隐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幕僚。在端方死后，他不知几时又回到了成都。那时正是胡景伊压迫舆论最厉害的时候。他是写了一封给友人的信，发了几句牢骚。有"方今武夫专横，非我辈所能容喙"等语。这信不知怎的又落在了当局者的手里。当局者就以这样一点小小的事情把他枪毙了①。

朱山临刑时有别妻、别女、别友等几首诗，在当时很脍炙人口。我记得他那别友(大约是刘申叔② 罢?)的一首是：

去年谈笑曾分手，地狱天堂两自由。
惟有人间留不得，一分颦笑见恩仇。③

在武夫专横之下，人的生命便寄系在一分颦笑之间。诗情的确是很哀婉的。

胡景伊一方面高压民众，一方面尽力效忠于袁世凯，于是乎袁世凯一道命令下来便实授他为四川都督，而把尹昌衡任命为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川边经略使。这在胡景伊自然是踌躇满志，而在尹昌衡则会义愤填膺了。

尹昌衡的出征西藏本是一管花枪，那本是他卖名缓冲的政策。他的私心是等到相当的机会还是要"复辟"的，而胡景伊却巧妙地夺取了他的江山。冒失将军一得到这个消息，便带领着大兵又由川边回来，要和胡景伊争夺都督。

是秋凉的时候，住在成都的人谁都有点人人自危。胡景

① 朱山被胡景伊斩首于成都至公堂外摩诃池畔。

② 刘申叔(1884—1919)，名师培，江苏仪征人。有《刘申叔先生遗书》。

③ 此系朱山临刑前的别妻诗，题为《别妻马兰君》。

伊虽然没有多少兵马，但实权在他手里，大家以为他一定会背城借一，这一回的成都真又要遭一次浩劫了。然而等尹昌衡到达省城的时候，胡景伊才单人独马到武侯祠去迎接他。尹昌衡也就飘然改变了过来，命他的军士离城十里扎营，只他自己进城住了几天，又退回打箭炉去。

这一幕简直象在演戏。尹昌衡表演得那样出奇的单纯，胡景伊表演得那样出奇的老狯！幕后一定还有些什么经纬的，我不知道当时的内幕是怎样。但我知道他们两人后来都一样地失了脚。我们试问：他们在煊赫的时候，对于革命，对于民国，对于四川，对于四川的人，究竟有了甚么贡献？

初出夔门

(1913)

一 初出夔门

一九一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风云酝酿着的时候，天津的陆军军医学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揭晓是在七月中旬，六个人限于八月初十在重庆取齐，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乡，向我的父母亲族告别。在七月下旬由嘉定买船东下，直诣重庆。我的五哥翊新有公干要往泸州，他便和我同船，更兼带着照管，要把我送到重庆之后再折回泸州。

在夏天的洪水期，船走得很快。由嘉定解缆，途中只宿了两夜，在第三天的清早便到了宜宾。在这儿我领略一次有生以来的大惊愕。

在未到宜宾之前，江水是带着青色的。江面的宽度和一切的风物与故乡所见的并没有怎样的悬殊。然而一到宜宾，情形便大不同了。宜宾是金沙江和岷江合流的地方。船过宜宾城的时候，远远望见金沙江的红浪由城的东南涌来，在东北角上和比较青色的岷江江水刀截斧断般地平分了江面。江面增宽了一倍，青色的水逐渐吞蚀着红水的面积，不一会终竟使红水从江面上消灭了。

青水虽然得着全面的胜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觉着它

的掩藏得煞是费力的恐慌，就象怀着绞肠的痛苦的人，勉强在外面呈示着一个若无其事的面孔的一样。船愈朝前进，突然在横断着江面的一直线上，品排着涌出三两朵血样的红花。奋迅地一面喷涌，一面展开，而随即消灭。愈朝前走，花开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声地唱着花啦——花啦——花啦的凯歌。江水逐渐地淡黄了，橙黄了，红黄了，俄顷之间化为了全面的血水。

花已经不再喷涌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却起着巨大骇人的漩涡。横径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断地，无秩序地，令人眩晕地，在江面上漩着，漩着，漩着。……但深幸水漩的回旋和前一段的血花和喷涌所取的是反逆的进程。愈朝前走便愈见减少，愈见缩小，愈见徐缓，终于是浩荡的红水获得了它的压倒的平衡。

就这样两种水势的冲激在宜宾城下形成着一个惊人的奇迹。这在我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还和昨天所见的一样新鲜。宜宾北岸骈列着一些红砂崖的浅山，山上多无草木被复，那崖肤的红色就好象剥了皮的肉色。那也好象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来，作为那个奇迹的背景，以增加效果。

更似乎有意要凑趣的一样，是我们所乘的那只木船。那是一只中等大的半头船，载着“油枯”，载子有些不平。尽管我们搭船的两弟兄总是坐在右边，但船身总是略略向左侧倾斜。在未到宜宾之前，因水势平稳，倒还没感觉着什么，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后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阵的驽马一样，在水面上

罗唣起来。跟着金沙江一道飞来的南风又有意地调侃我们的驽马，当着它拦腰一拍，跛着的左足便落进漩涡里，咕噜噜地打一个风车。刚好出了漩，不让你把提着的一口气放下，接连着又打一个，又打一个，又打一个……。全船的水手都惊惶失色，掌舵的艄工连一动也不敢动。五哥，他紧紧地盯着我，一只手指着右侧船舷上的樯桅。我了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万一落水时，快把那樯桅抱着。

惊异早被打倒，是恐怖抬起头来支配了一切。

我实在是没有想出，我们可以安全地渡过那难关。这儿的契机不能不说是偶然。我们偶然搭着了那载子不平的船，使我们受了那样的惊险，也偶然赖那载子还没有跛到使船漩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着了我们兄弟两人的乘客减少了他的载子的不平。假使那载子的左边在上载时偶然地多放了几片"油枯"，那满载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脚的马驮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去吗？

难关是幸而过了。在年青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觉着自己真真是离开了故乡，真真是窜入了红尘，真真是踱进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过了险难之后，那因循苟且的船夫们把载子整理了一次，以后算平稳地到了重庆，在途中记得是只宿了一夜。

到重庆的那一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馆里向一位护送员的少将报了到。他同时却向我传达了一个消息，说成都有电来叫我们不要出发。他把电报也给我看了，电报的大意是说：天津来电，言第二次革命爆发，各省学生缓送，俟有后电

再策进行。

这个意外的消息，其实有一半已经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经爆发了，就在四川境内闹得也有点风声鹤唳，在熊克武① 支配下的重庆，在打箭炉怀着失位之痛的尹昌衡，都有响应的形势。而我们在那样的形势之中到达了重庆那座山城，那就是行将爆发的活火山。

护送员在把消息传达了之后，叫我们各取自由行动，赶快离开重庆，他说重庆的形势十分危险。因此就在到了重庆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五哥同时起身，他往泸州，我和一位同考上军医的姓胡的人由东大路同返成都。当时的东大路是要经过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鸡公车、肩舆和溜溜马。回到成都要费十天工夫。我们在到了荣昌的时候，便在报上看到重庆独立的消息。原来重庆就在我们离开它的那天晚上便宣布独立了。城内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枪杀，被拘捕者中连护送我们的那位少将也在内。愈朝前走，途上兵马的输送愈见倥偬。永川、荣昌、安岳、遂宁一带不久便成为了战场。

我在考上军医之前是已经进了成都的高等学校的，是临着南校场的王闿运掌教过的旧尊经书院②。那儿藏的古书

---

①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曾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第五师师长，二次革命时任川东讨袁军总司令。

② 一八七五年创建，王闿运、宋育仁等先后任主讲或院长；一九〇四年改为四川高等学堂。

颇多。回到成都以后，学校已经放了暑假，但仍然可以寄宿，便搬进学校里去住着。一天没事便跑向图书室里去翻阅古书。那时是喜欢骈四俪六的文体的，爱读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① 的《哀江南赋》——那在《离骚》以后的第一首可以感动人的长诗。我觉得他那“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的几句，真真是切中目前的时弊，每天总要讴它几遍。讴起来总不免要一唱三叹地感慨系之。然而一位讴《哀江南赋》的青年也不见得是怎样高华的志士。讴书之余他要和同学们在寝室里打麻将。有一次打输了想捞钞，愈捞愈输，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领得的旅费输得一个精光。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文庙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馆里去和嫂侄们同居。

天津有电来，第二次又由成都出发，已经是九月中旬了。省内的军事刚好告了结束，同县人的王芳舟② 因镇压革命有功，做了重庆镇守使。他的大哥做着川东省视学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时的先生，乘着机会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五哥是王芳舟在武备学堂和留东时的同学，当时适好回了成都，他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两位长者同行。因为军事初停，东大路的匪风甚炽，便选了小川北路，由简阳经过乐至、遂宁、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庆，也同样费了十天。

在镇守使衙门里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齐了，便乘着当时川河里所有的唯一的一只轮船“蜀通号”东下。这

① 庾子山（513—581），名信，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北周文学家。有《庾子山集》。

② 王芳舟（1886—1967），名陵基，四川乐山人。四川军阀。

次我们几位没有专置的护送员，只由一位护送着一批娇小的清华学生进京的吴老先生，兼带着照拂的责任。就这样，我们，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来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轮之船，而且是在这火轮上当着游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继着“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后而为四川都督的是尹昌衡。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将军在成都的皇城里做了半年的“土皇帝”，政绩却不大芬芳。在民国元年的春夏间，受着重庆的压迫，为缓冲而兼卖名起见，便出兵征讨西藏，把都督的位子让给胡景伊将军署理。胡将军的本领却不弱，乘着“土皇帝”把御位移到了打箭炉的期间，他却和北京的袁世凯拉拢了，不久便被实授为四川都督，使“土皇帝”只落得一个川边经略使的虚衔。这把我们的皇帝气得暴跳，从打箭炉率领着大兵回来，在武侯祠的庙门前演过一次《空城计》中的司马懿。那时是在秋冬之间，成都城内并没有兵，我们住在城里的人都在替胡将军危险，以为他如不准备巷战，便只好逃跑。但谁知这位胡将军的本领还在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轻骑简从地先跑出南门去迎接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样的按摩术，竟把皇帝肚子里一鼓所作的气，化成了从后门阴消下去的瓦斯。可爱的皇帝下出了御旨，命自己的三军离城十里安营扎寨，自己也轻骑简从地同胡将军并辔进城。据第二天的报纸和官方的告示，原来尹大将军是回来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将军又率领着三军回打箭炉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毕竟是事实，而攻打西藏也本来

是枪花，于是乎陷在打箭炉的将军便弄得来进无所往，退无所归。将军之烦闷，将军之愤懑，是谁也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酝酿、爆发、余波的期间，打箭炉和重庆将同时响应的消息或空气，早就四处传播着。然而省外的革命运动逐次镇定了，重庆的独立也遭了失败，尹将军却始终没有响应。他在革命平定之后，却打了一个电报进京，要面陈方略，袁世凯一个回电也就欢迎他进京。尹大将军于是乎便有北上之行。在将军还未到重庆之前，他有两班人的卫队做开路先锋，已经先到了重庆，而且真是千载一时地竟和我们同船。可怜那“蜀通”轮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两旁的廊道上的统舱铺位是有限的，一半的铺位被那两班人占领了。我们的一批和清华学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为了轮船上的游神——游神者四川话之流氓也。

但当了游神却不能说不是走了神运。因为我们没有铺位，便可以不陷在那又窄又热的统舱里，并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舱的甲板上去游览，三峡里的风光便是在那官舱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们是被关在那统舱里，我相信所看见的光景，怕只有从那圆窗眼中所窥出的一圆崖壁罢。

中国的地方我走过的可不算少，象三峡那样的风光我实在没有遇见过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一幅伟大的杰作。它的风韵奇而秀，它的气魄雄而长，它的态度矫矫不群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经很模棱了，只记得进了瞿塘峡时是清早，我是站在官舱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着微微的雨。有名的滟滪堆是一个单独的岩石，在峡口处离北岸不远，并没有怎样的可

惊奇，可惊奇的还是那峡的本身。峡的两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样。峡道在峭壁中蜿蜒着。轮船一入峡后，你只见到四面都是岩壁，江水好象一个无底的礁湖，你后面看不见来程，前面看不见去路。你仰头上望时，可以看到那两岸的山顶都有白云叆叇，而你头上的帽子可以从后头梭落。天只有一小片。但等船一转弯，又是别外的一洞天地。山气是森严缥缈的，烟雨在迷蒙着，轮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烟雾随着蜿蜒的峡道，在山半摇曳，宛如一条游龙。这些，自然只是片段的峡道，在某一个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所剩下的记忆却是以这些为代表。片段化为了整体，一瞬化为了永恒。

在轮船上当游神的人，夜间自然没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却很特别。川河里的轮船，因为水险不开夜班(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记得离开重庆以后，在未进峡前宿过一夜，在出峡后宿过一夜。在未进峡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轮船的买办在停轮后替我们雇好了民船，让我们下去过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轮船。在出峡后是在岸上的一个农村里过夜的，下榻处是一家酒店。听说那儿已经是湖北的秭归县境了。

就那样在神韵缥缈中，不知不觉地便出了夔门。

二　幻灭的北征

轮船过了秭归以后，没两点钟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轮的终点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见了有好些外国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仿佛而全身涂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触角挺出着的，不用说是在照片和图画中所认识的军舰，更不用说都是外国人的军舰，那儿插的旗帜有些是画一个太阳，有些是象一个“米”字。初从山里出来的人仿佛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这儿可不就是尼罗河、恒河吗？……中国的干城们，一遇着国内有异己者出现，立刻便要提刀上马的，对于这些有触角的水栖物，他们是没有看见的吗？……中国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内好撑船”，好撑外国人的兵船。……)

这些所谓“幼稚”的感慨在胸里萦回着的时候，却到日本邮船会社去买了当天午后要开赴汉口的XY丸的统舱票。当天下午，十几个小川耗子就跟虾蟹一样，一个二个被那从黄海以外凫来的庞大的水栖物吞进腹里去了。

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的确是成了虾蟹。在船后的统舱里，虽然选着了靠着北侧的上层铺位，时而从那圆窗眼中去窥觑船外的风光，然而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记得船过了鹦鹉洲之后，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战役时赫赫有名的龟山和蛇山，曾经特别跑到船尾上的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却没有看见可以称为“山”的甚么存在。这也是难怪的，因为在初出夔门的人，他的观念中的山是海拔几千丈的峨眉、雪岭、邛崃、青城；象在汉阳江边踞立着、在武昌城里匍匐着的那些营养不良的爬虫，夸张一点说，实在是要用显微镜来才可以看得见的。它们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们的环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过了汉阳，横陈在汉水和长江合流处的东北角上，革命战役时冯国璋① 所留下的德政——并无必要地所烧毁了的汉口市上的几千家民房的遗址——在脑中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叠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码头时客栈的接客先生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先生们之勇猛，真是足以惊人。在船离岸还有三二尺远时，他们便争先恐后地跳上了船来，手里各各拿着一面小旗子，口里不断地叫着。他们和争着要涌下船去的乘客，在狭凑的舱口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涡。那俨然是两队排球选手的龙骧虎斗，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为了被人争夺着的皮球。

汉口的江心是陈列着有好几艘外国军舰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没有怎样的发作了。只记得同路的一位比较老成的人说过一句也算“幽默”的话：

——“外国人真是热诚，要远远地来替我们举行观舰式。”

在汉口的客栈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门车站，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北上。和火车见面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论理应该有些新奇的记忆，但无论怎样的搜索，所能记忆的却只是过磅时的麻烦，车站上的杂沓，车厢中的污秽。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车行中所接触到的窗外的自然。

车入河南境内以后，车道两侧所能望见的大抵是衰黄的枯草。间或有些毫无草木的砂丘。听人说那些砂丘是北风由

① 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武昌起义爆发后，任清军第一军总统，镇压革命军，攻陷汉口、汉阳，威胁武昌革命政府。

蒙古的沙漠地里卷来的，可于一夜之间积成，也可于一夜之间被风吹去。得着那些见闻，在当时竟感伤得涔过一些眼泪。

——（这儿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吗？怎么竟这样地萧条，这样地凄凉，这样地行将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时令的交冬诚然是助长了这些令人幻灭的景象，然而中国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实。封建制度下的农业文明早经超过了它的极致点，原始的旧式的耕种法在长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几无余剩了，即使没有带着沙粒来的蒙古风，土壤本身是已经在向着沙漠进军的。

北地的建筑在初出夔门的人看来也不免要唤起坟墓的联想。夔门以内因为多山多木，建筑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坟墓是用砖土。因此，北地的多用砖土造成的农家或村落，便只好象是坟墓或坟墓的集团了。

——（沙漠化的进行曲，坟墓的进行曲，颓唐了的大地的葬歌。——呜，呜，呜呜……火车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

路过黄河桥的时候是在夜间，窗外缤纷地已经在下着初雪。曾把车窗略略向上推起，借着铁桥上的电灯光，俯瞰过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经激减了的黄河。时间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见了那滔滔荡荡的浊浪，或许也可以鼓动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桥下的旷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湿润的黄土。有些水脉东鳞西爪地象蚯蚓一样在那里蜿蜒着。

我们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车，和往北京的清华学生的一批分了手。在保定的客栈里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无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专往天津的火车出发。这一趟的车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车，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时候比动的时候多，动起来也好象是沙漠中的骆驼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车站上接受了由吴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栈的招单，六个人把行李票交给了那接客先生。他要替我们雇东洋车教我们先往客栈里去。六个人不约而同地觉得这好象是一场骗局，谁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说：要等行李一道是还要等好一会儿的。但我们总不理会他，总说要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们没可奈何。

客栈所接着的客不仅我们六个人，等了怕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骡马大车上所堆积的行李，几乎有车站的屋檐一样的高。行李积齐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们雇东洋车，但我们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议的结果是大家来坐在那大车上的行李堆上，我们要死守我们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总不能抵敌过我们六个人啦。攀着大车的轮子，更脱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头，六个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顶。

接客先生和御者并坐在御者台上，骡马走动起来了。

嗗吒，嗗吒，嗗吒，六个活的行李在骡车顶上颠簸着，成为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宿在天津市一条很长的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栈。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个字）和客栈的名字我都记不起了，只记

得是在楼上开了邻接着的大小的两室，我和一位比较意气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这一个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间。当晚两个人把夜饭吃了之后，便跑到一家戏园里去听了一晚的京戏。去的时候坐的东洋车是客栈替我们讲好了价钱的，回来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戏园门便跨上车，叫拉回客栈。原来天津的东洋车是要先讲好价钱的，回到客栈照着去时的车价给钱时，车夫们哗噪起来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杠，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车钱。

第二天到军医学校去报到，一位只有三十来往岁的年青的校长，穿的是军服，在会客室中接见了我们。校长的态度是和易近人的，听说他是段祺瑞①的女婿。我只记得他姓李。他对我们说，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内便要到齐，到齐后要复试一次，便正式开学。所说的话不外就是这些。事实上在四五天后学校也果然复试了一次，但我在未经复试之前，早就发生了离开天津的念头了。

我自己本来没有学医的意志，我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医人，也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糊口。那样踏实的想头，在当时的我，是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门以内时只因为对于现状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但要离开四川却难得有那样的机会。要自费出门，家庭的经济状态是不许可的，年纪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远离，因此在中学校的五年

①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一三年代理国务总理。

和高等学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烦闷的时代。已经进了高等而犹决意投考了同等学校的军医，只是视为一种方便。那是因为医学校是官费，连旅费也不让你自己出一个钱，好借此以离开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见得比四川进步得怎样。而在种种的观感上，反在不识不知之间引起了对于故乡的孺慕。故乡是要更美丽一点，故乡更少外来的刺激，故乡似乎更可以有为。而在根本上使我动摇了的，尤其是对于学校本身的不满。

在未开始复试之前，对于学校的情形也略略调查了一下。据见闻所得，知道在革命以前学校里的教习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后大多是用的本校的毕业生和少数的东西洋留学生了。但那些先生们在当时的中国的医学界上却大多是没有名望的。青年人最重虚荣，我，品评一个学校的高下是以外国教习的有无多寡为标准。连中学校的物理化学都须得聘请外国教习，至少也得用外国教本。一座堂皇的军医学校竟没有一名外国教习，竟没有一位大有名声的中国教员，这还成什么学校呢？幼稚得可怜的我，就因为这样一点无聊的虚荣便看轻了那座学校。

我想离开天津，是想往北京去。因为我的大哥橙坞那时住在北京，在替川边经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这样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觉得一到北京总会有更好的出路了。

——(我何必一定要学医，更何必一定要学军医？军医的前途顶高不只是中少将级的军医总监吗？学医，又何必一定

要在这儿？……)

存着走的心事但也还在游移的时候，学校举行复试了。百无准备地也跟着大家去应试。人材不可谓不济济，二十几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学方面的题目已经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终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国文题，叫做

——“拓都与么匿”。

这五个字实在令我摩不着头脑。我自己不记得糊里糊涂地写了些什么东西去缴了卷。在出场后谁都在叫苦，说莫名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孙山，被送回故乡去没有面目见人。

——“拓都与么匿”！

这样神妙的几个字，我想就是现在的读者，能够懂得的怕也不会有好几个罢？但在我们四川的六个人中有一个人却是懂到了。他对我们说：

——“这是 total and unit 的对译，是严几道的译语。”

这个人的姓名我忘记了，他是在四川六个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经读过严几道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说：“拓都大约是指社会，么匿是指个人。”我的妈！这样伟大的一个难题，实在足以把人难倒。这同时也逼得我这个“么匿”没有胆量等待揭晓，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号——便乘着火车要赶往北京去了。

在天津车站上为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个人，他是凄凄凉凉地怕要被送回四川。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们是很难堪啦。”

——“万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来罢。在北京总会有方法

想啦。”

——“假使都没落第，你又怎样呢？”

——“我是决不想再回来的。”

——“我们还有毕业文凭啦，万一学校不肯退还，又怎样呢？”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中学毕业文凭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邮送到了学校的，假使文凭被学校扣留了，要想考别的学校却是一件难事。

——“请你临机应变地替我帮一下忙，我们随后时常通信啦。”

就这样拜托了熊君，把天津那个“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后去了。

在北京的正阳门车站下车，有从四川跟着大哥一道进京的跟人来迎接着我。我才知道大哥并不在北京。他是在夏天往日本、朝鲜等地漫游去了，一直还没有回来。同时那跟人又给了我一个注意，说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时，定要叫我就在车站上更换一下。那时我是照着我们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蓝色的华丝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鸡血红的银绸夹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质的大襟马褂。他对我说：北京人穿衣，穿棉袍就敞穿棉袍，穿夹衫就敞穿夹衫，夹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伧”。听了他的话向周围看时，的确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自己顿时便感觉着了所谓“寒伧”的意义了。照着他的劝说，在车站上真个把穿法改换了一番，然而“寒伧”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约是因为冷

的原故罢，衣袖之长几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马褂又都是对襟，我的大襟马褂，短袖长袍，是怎么也没法改换过来的。忽尔间才觉悟到在天津看戏时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剧之所以失败的来由。

我被引到的是住在吹帚胡同的一位同乡京官的寓所。京官是同县的举人，也是在日本留过几个月学的，在做着高等审判厅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就寄寓在他那儿，是在正院外的一座南屋子里面。一列三间，正中是客堂，左边是内客厅，由花格门与一道折腰红布帘，和客堂隔着。右侧是书房，京官的一位在法政学堂里念书的兄弟住在那里。进了内客厅看见在靠墙的一张木炕上陈着大哥所留下的寝具。那儿暂时便成为我的下榻处了。

在吃中饭的时候，京官回来了，京官的兄弟也回来了。京官还不上四十岁，身体颇高长，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与他哥哥成一个对照，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的光景，身材削小，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尖削而枯黄的脸上冒着一脸的烧疮，有显明的雪花膏的痕迹。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冷静态度中也含着淡淡的一丝暖意欢迎着我。他听我说不愿意进军医学校，他是极端赞成的。他说年青人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学军医是没有什么“发变”的。他听到“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尤其认为胡闹。

我得到了京官的赞许，自然更把决心坚定下来了，决计住在北京等待着大哥的回来。虽然在不两天之后，熊大中由天津来信，说复试已经揭晓，各省的人没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几位

还很高列；又说学校限我三天之内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挂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学毕业文凭，并追还旅费。但我已经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记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

三 北京城头的月

在京官寓里住着，不知不觉便过了三四个礼拜，大哥依然没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积雪一样一天一天地浓厚了起来。

京官一早便要去审判厅，在中饭时回来一次，午后要到晚上才能回来。他的饭食是在内院里用的。在法政学堂的预科的京官兄弟也是一早要出去上学，虽然中饭和晚饭是陪着我在外院里用，但在午后放学回来之后，他大抵是出外访友或玩耍去了，在家里的机会很少。

礼拜日，京官是要叙他的天伦的，京官的兄弟却爱去照顾所喜欢的落子。我时时要求他把我引去看看万牲园、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的废迹，又或者如天坛、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总说：“天气冷，没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开春去。”因此我虽然到过一次北京，而且滞留得也相当久，除开由吹帚胡同走出正阳门、由正阳门走回吹帚胡同之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栅栏附近的茶园里去饮茶，落子也跟着去听过一两次，但在去过一两次之后，觉得百无聊赖，因此就在礼拜日也多是一个人留在寓里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并不松懈。正在春情发动期中的他的兄弟，脸上多有烧疮，因此便爱用雪花膏来掩饰。一天洗三四次脸，总要涂抹三四次雪花膏。又因为爱吸纸烟，他左手的中食两指总是染得焦黄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惯他，不论什么时候，见着了他总是要骂：

——“一个脸就象个奸臣，一双手爪就象屎橛头，老三，你要这样干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但是这样的骂却什么效果也没有，京官愈骂，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识地和他反抗。脸上的雪花膏愈见厚，手上的烟垢愈见浓。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学的。他时常对我辩解。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强不得。我自已是火性。北方的气候干燥，不涂雪花膏脸皮要皱，不吸香烟不能够润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烟子当成着水蒸气的。

老三在背地里也爱骂他的哥哥，他要骂他官派十足，并不高明地总要撇一口京腔。——其实到京才两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约是自信比他的哥哥更加高明。他骂他一妻一妾，时常不和睦，连妻妾都管理不了，满有本领来骂自己的兄弟。这些话，他几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说一两次，我是不好作左右袒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对于京官的敬意，我说他为人严正而有操持，别人都在花天酒地八大胡同① 里醉生梦死，而他没有那样的恶习。但就是这样的话，老三都要采取否定的态度。

——“哼，严正！一个有小老婆的人会严正？他是因为有

① 作者原注：当时北京妓院集聚的地方。（八大胡同地处北京前门外珠市口西大街一带。——注释者）

我和大嫂的监管，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为不能够放肆，所以他总是在我头上出气。”

京官对于他的严格被解释成为了性欲不能满足的报复。这样的精神分析怕有点冤枉罢。

老三是最重视英文的，他的预科科目中有好几点钟的英文，他说只有这门功课有趣，而且有用，将来无论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国人办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读的课本有一种是嘉本图的《欧洲游记》(Carpenter «Europe»)，在他没有那门功课的一天，我在家里替他查字典，把生字用铅笔来注在书的旁边。这层是使他对我生出友谊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问过我：

——“你们在中学堂里学外国文自然好，但要学什么几何、代数，声、光、电、化，那有什么用处？一位木匠师傅并不懂几何，一位糟房老板并不懂化学，而你们懂得的也只有那么一回事，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委实是把我问穷了，我们在中学堂里学习的初步的课程，其实只是科学的一点“人之初”，那里就会懂得它的应用上来？然而在低级的生产与高级的技术联接不上来的社会里，就到现在也还有好些从外国学回来了的专门学者，在苦于“所学非所用”与“所用非所学”。二十几年前的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那里窥察得透学与用之间的关系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并不亚于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间每到书房里来，看见我们在查英文字典，他总爱说：“你们的时代比我们好，我们要学洋文，年纪已经太

大了。”他在高兴时也偶尔要谈谈他做法官的经验。据他自己说来，他所经手过的离奇案件，如果写出来，是可以抵得过一部《福尔摩斯》① 的。他所讲过的案情有些的确离奇，但我通同忘了。我只记得一件不甚离奇的小小悲剧。

他说，还是他在地方审判厅任事的时候，有一次审理过一件盗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别人东西。法庭判决了他三个月的有期徒刑。那时候是在十月，犯人听了宣判，把手指屈起来数了一下，说："青天大老爷，请你开恩，监我五个月罢。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边又冷，我又找不到饭吃。”京官没有读过安那托尔·法朗士② 的作品，这段故事不用说完全是出于他的经验。他把它看得也很严重。他说："在一个社会中的自由生活还不如在监狱里受刑，国家设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儿呢?”京官只是叹息，但也没有说出究竟该怎样的所以然来。

在京官寓里不知不觉地便住了三四个礼拜，京官给与我的印象虽然仍是一尊有点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对于我似乎暗暗地有几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仅时常爱批评他的兄弟，而且有时还要批评我的大哥。他说我的大哥是过于“大气磅礴”了。一抵京，向总统府报了到，便跑出去游历，一直没消息回来。总统府来召见过两次，都只好回说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机宜。他有时又劝我读他书房里所有的一部陆宣公的奏议

① 即《福尔摩斯探案集》，英国柯南道尔(A. Conan Doyle, 1859—1930)著。

② 安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法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波纳尔之罪》、《当代史话》、《克兰比尔》等。

集①，他说将来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议实在令我发生不出趣味来，我也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将来还有使用“奏议”的必要。

是在第五个礼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盏洋灯光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读着在琉璃厂花了一块钱买来的《胡刊文选》②，读着我所嗜好的魏晋人的诗。因为我不高兴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来之前，炉中我没有让人生火。房中的空气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静无声，突然在窗外的阶沿上发出了一下清脆的象玉簪跌碎的声音。那是屋檐口的冰柱积长了坠落了下来。百无缘故地眼泪在眼中涔涔了。把书掩着，立起身来步出书房门去，迎头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砖面上。中堂外的积雪放着皎洁的银辉，天空中的一钩上弦月报告着是旧历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诗样的兴趣悠然来了，折回书房去，顺手拉了一张信笺来，写出了几句即兴诗：

天寒苦昼短，读书未肯辍。
檐冰滴有声，中心转凄绝。
开门见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诗写好，返复地念了几遍，刚好把来叠在书里的时候，忽然有人把门帘打开，是京官走进书房来了。

---

① 陆宣公，即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卒谥宣。有《翰苑集》，或称《陆宣公奏议》。

②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重刻南宋本《文选》，世称《胡刊文选》。

——"你一个人在家吗？老三那家伙，怕又窜进那儿的落子馆里去了？那家伙天资又钝，又不肯用功，真没办法！你怎么没叫人生火啦？"

——"我因为不高兴那煤气，弄得头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来约你去看电影的。我平常很忙，今晚才得了一点儿空。"

我当然是只有唯命是听的。

跟着京官由吹帚胡同走出大街，经了些转折，穿进了中华门① 内的宫墙。一片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议。皎洁的新月和几点明朗的疏星，就象是镶嵌在那儿的一样。毫无吝惜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石板面就的广漠而寂寞的宫廷上面，好象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过的一片大湖。我在中华门前留连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脑子，自己的一切，都象是澄澈了的一样。

走出了正阳门，进了一家在大栅栏附近的电影馆。馆子是旧式的戏园，一张白布张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杂乱地坐满了无数的观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条在楼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会卖戏单的人走来了，周围的人都争着在买，京官没有动。卖戏单的竟抽了一张来递给他。

——"戏单，买么？两个铜子儿。"

——"咱们用不着啦，咱们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说，"是懂英文的啦。"

---

① 原位于正阳门、天安门之间，现已拆除。

嗳呀！这样一句话弄得我顿时不安起来，原来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带去做翻译的。真是要命，一个才从四川那样偏僻的省份出来的中学毕业生，读嘉本图的《欧洲游记》那样浅显的书都须得死抱着字典，那里会有本领充当英文的通译呢？诗的感兴、月光的陶醉、看电影的愉乐，不用说都通同被骇跑了。我就好象毫无准备地坐在讲堂上要受试验的一样。或者说得要更贴切一点，就好象一个罪人坐在法官面前听候宣判。

戏园里灭了灯了。毫不容情的电影机劈头在银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国字，而那外国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来更多生了一些角，不仅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一个个的字母都象是初次会面。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啦？”京官质问起来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说认不得，只说收得太快，没看清楚。委实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内行，他说前几面的字幕都是戏名和演员的名字，是不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戏中插的字幕，那是帮着戏情的说明。开首的几张字幕过后，戏影来了，好象是那一国的皇帝出殡的光景，银幕上现着送葬的行列，有无数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来了，而且很长，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连字母都还没看清楚的时候，一晃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京官的发问。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该怎样的回答，银幕上现出的又是一些轻气球队，接连着两三片好象是在举行阅兵式。一晃，又是

很长的字幕。

——“这回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妈，实在连字母都认不准确。在中学堂里学了四五年的英文，妈的，怎这样不济事呢？）硬着喉咙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银幕又变成了非洲的热带地方，许多黑人赤裸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鸭嘴还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两个大圆盘。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现了。

——“这回可看清楚了吗？”京官的问话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讥嘲。

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迁延，回避，已经是没中用了；“偶尔该有一两幕可以认得的罢”——那样的机会主义也达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时候了。但自己又有几分不甘心，只好没有十分把握地游移着说了一句：

——“那好象……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诧异地说，他以后便没有再问了。

照现在推想起来，那些片子大约是德国的或者俄国的所谓“消息片”，是报道着当时的重要的世界新闻的，所以各张片子毫无连络，而字幕的说明也不是英文。但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你怎么能够使京官相信呢？在当时，京官苦了我，我也苦了京官，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怀着满腔的希望，以为我将来

会成为陆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为曾纪泽①，然而谁知道第一次来试验我的英文程度，就这样落了第？京官可能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学过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懂，也当认得一半或者几成。然而却和他一样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不认识便坦白地说不认识，或者京官也能原谅，但我始终是游移，推诿，最后是并无把握地回答说"不是英文"。——"这孩子真是虚矫得有点程度啦！"京官的心里不会在这样的作想吗？

——"咱们回去罢，"银幕上的消息片接着还放了几则，但还没有放完的时候，京官突然地这样说，"今天演的片子，毫没味儿。"

我受着了无言的判决，跟着我们的法官回到了吹帚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实在想哭。这一次的试验比天津的"拓都与么匿"还要来得绝望。天津失败了有逃到北京来的出路，这一次的失败简直是无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连从京官的寓里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没有钱。

——（我为什么要跑到北京来呢？不要那样地高傲，降心相从地住在天津的学校里岂不甚好？弄到现在来毫无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终竟是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厅，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在晚间总免不得要见面，能够把这晚间避过便是绝妙的出路。因此我一

①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清末外交官。有《曾惠敏公全集》。

到晚间来便借口头痛，受了煤气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一出去，地点便是中华门前后的宫廷。夜夜都是皎洁的晴空，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议的高深。镶嵌在那儿的新月一宵圆过一宵，星点逐渐地疏减了。广漠的宫廷依然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的大湖。伫立在那儿，假使没有那透彻全身的冰感，没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气，尽可以比成为尼罗河畔的斯芬克司①。

四 世间最难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刚好把饭吃完，我又准备着要向中华门附近去逃难的时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毡高领的大斗篷突然回来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惊的，与其是我，宁是我的大哥。大哥离开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曾经考上天津军医并逃到了北京来。他穿的依然还是和服，待他在寝室里把行装解了，我才详细地把近况报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丢掉军医学校为然，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长我十四岁，在我未有记忆时已经进了学，榜名叫开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号叫成五。但他这号却经过了两次的奥伏赫变②。第一次是在科举停止的一年。在最后一次的秋闱不第，大哥考上了当时在成都新成立的东文学堂，学

① 斯芬克司(Sphinx)，即狮身人面像，古埃及的一种石雕像。

② 奥伏赫变，德语 Aufheben 的音译，扬弃的意思。

满一年便要由省费送往日本留学。当时的国是，是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于是大哥的号便由成五变而为崇武。近年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罢，不知几时崇武又变而为橙坞了。他由东文毕业之后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学的并不是军事而是法制经济。盛清逊国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个法科举人，在司法部做过一向小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后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绅班法政的两个学堂里担任过教授。革命以后做过几个月的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来交通改局，他便进了打箭炉。不久便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名义驻扎北京。但他可以说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游历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时候，我还是中学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学毕业后进法政学堂，将来可以作为他的帮手。但我违反了他的意旨。我说我厌恶学习法政，而且厌恶学习法政的人，在中学毕业后便进了成都的高等学堂。在当时维新变法的过渡期间，大家秉着“学优则仕”的古信条，学习法政，是成为了风尚的。辛亥革命以后因宦海中起了新陈代谢的宏波，于是法政风更成为了狂风。在民国元二年间，单以四川的成都一个省城而论，私立法政学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学乃至祖孙同学的佳话都时有所闻，在当时大有“法政不死，大乱不止”的神气。

大哥是宽宏大量的人，我比他虽然要小十四岁，但他从不曾严厉地责备过我一次。我在前虽然违抗了他的意旨拒绝学习法政，而且毫无忌惮地说厌恶学习法政的人，他也毫不介意。这次我由四川出来，中途把天津的军医学校抛弃了，在我

的私心以为大哥是一定赞成我的，他一定会和我们的居停主人同乡京官一样，即使不说出口来，也要暗暗地赞许我的志趣远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满不以为然。

——“学军医，既兼实用，又是官费，真是很难得的，你怎么把它抛弃了呢？”

他的声音并不严厉，态度也依然是和缓，但仅此已经是对于我的一个棒喝，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我实在是太孟浪了。我毫无把握地干出了这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来。但大哥在说了那几句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看见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铺去，花了五十几块钱替我买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当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觉着温暖的。当天他在外面访问了好些旧友，晚上很迟地才回了寓，看他的态度是很不得意。

当然是没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后要进京面陈方略，他的开路先锋的两排卫队在九十月间已和我们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头，经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个公电给四川的同乡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份发挥得真是十足。那电文是“昌衡此次晋京，欲学秦庭七日之哭①，所有同乡亲友，一概免见。”这样一个电，把同乡中的大小京官弄得众口哗然，没有一个不骂声“昌衡这小子猖狂”。同乡京官中有施某和顾某在当时是炙手

① 秦庭七日之哭，典出《史记·伍子胥列传》。

可热的人，而为尹昌衡所杀的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又是袁世凯的“商山四皓”①之一，于是乎土皇帝一晋京便被京皇帝软禁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哥的处境不用说是很困难的。

寝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杨妃椅，自从大哥回京以后，我的寝具便移在杨妃椅上去了。椅和炕之间相隔不过三尺，靠着东手的壁次有一个茶几，上面点着一盏洋油灯。

有一天晚上，大哥坐在炕上很沉闷，我坐在杨妃椅上也找不出话来说。大哥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他突然对我说：

——“我今天替你把学校的情形打听了一下，年假中各处都不招生。听说只有法政学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你又不愿学。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

这些消息我本来早就打听到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觉得除学法政而外，没有什么专长，早已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不好说出口来。

大哥看我没有回话，他又接着说：

——“学法政也真是没有着落，天下大乱实在是病在于学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学军医，怎样呢？学校方面没法挽回吗？”

——“假使早得两个礼拜或者还有办法，听说已经挂了我

① “商山四皓”，典出《史记·留侯世家》。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二十日发表申令，尊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作者戏称之为袁世凯的“商山四皓”。

的斥退牌。”我这样说本是照着事实回答的，但好象把责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真的，我该早回来几个礼拜。……照着目前的形势看来，恐怕我们兄弟两人在这儿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我真是想哭出来了。我一直凭着自己的稚气在那儿冲动，全不曾顾念到“生活”这个严重的问题。经大哥这样一说，就好象从梦里醒来了的一样，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停了一会我决绝地说：“大哥，我决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么呢？”

——“我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

大哥没有置可否，停了一会只说了一句：“等到明年开春，看看情形再说罢。”

我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象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验过的。

自从大哥回京之后，京官寓里的客日渐加多了，尤其在礼拜日，每每有唱双台的时候。因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国会议员。自从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实行“苦推打”①，把国会解散了以后，那些国会议员无事可做，似乎是把访问这件事作为了消磨时间的专业。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选出的议员来访问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谈了一番国政之后，听说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学堂，便难兄难弟地称赞起来。接着

① 法语 Coup d'etat 的音译，一译苦迭打，意为政变。

又说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华学校的中学部，将来是要留学美国的，真真是他们一县的“空前绝后”的人材。大哥隔着布帘听见，悯笑了一下，低声地说：“空前有之，绝后则未也。”但我却愈见地难过，觉得我这个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长争气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这个日期我是没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张次瑜，来访问他来了。适逢京官有客，我们便退在寝室里谈话。

次瑜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大哥的东文同学，后来同留学东京，同在成都任教职，革命后曾任四川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他在成都时就是认得我的，一看见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了他，最后是说到没有出路，不知道该怎样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学呢？能够的时候我可以帮忙送去啦。”

国会被解散以后，所有旧国会议员每人是照原薪支给三个月，发遣回籍的。张领到了这三个月薪金，便决心往日本去游历，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观望一下中国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号便要动身，特别走来向大哥辞行。

——“我也想到这层，”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没有收入的人。”

——“日本留学不还有官费吗？考上了官费不是就不要你供给了吗？”

——“官费是诚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东京的一高、高

师、高工，和千叶的医专，但都很难考的。而且高师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叶是六月，连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学费我现在的力量都供给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够了罢？”张说，“我从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带去的，起初是我自己一名官费由弟兄两人合用。我们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医专，便也补上了官费，仅仅费了七个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们的脑力强，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够了罢？”

大哥听了这一番话，好象深深地受了感动，他回头来问我：“怎么样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领，能够费半年工夫考上官费学校，半年的学费我是可以维持的。怎么样呢？有把握没有呢？”

大哥问着我，但我实在回答不出来。日本我没有去过，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费学校，我自己实在不能保险。如果据我五哥的先例看来，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五哥由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后因不喜军事要改学科学，但住了两年终竟没有考上官费学校便回国来了。五哥费了两年没有成功，要限我半年，我怎么能够说得出一句有把握的话呢？

——“怎么样呢？有把握吗？”大哥接着又问我，但他看见我迟疑着不能回答，最后是他放下了决心：“我看，你去罢，先去住半年来再看。半年之内能够考上官费自然好，如不能够，或许到那时我已经有了职务了。我就决定你去，没有游移。”

就这样我的大哥便决定了让我到日本去留学。今晚说好，

明晚就得动身。当时大哥手里没有现钱，他只有几只由打箭炉带出来的金条子。他当晚同张次瑜讲好，要把一只金条给我，让我拿到日本去换成钱。因为日本的金价要比中国贵些。沿途的车费和到日本后的短期间的费用，希望由张暂时垫借，到日本把金条换成钱之后，由我偿还。次瑜不用说是完全答应了。我自己就好象突然由一十八层的地狱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顿时勃勃了起来。

次瑜的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车站，停不一会次瑜也到了。东站是很宏敞的，因为买票和种种手续还要费些时间，和我十分惜别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厂里处处巡走。

——“你真好，”他很羡慕地说，“你有那样好的一个大哥。我自己的大哥总是时常苛刻我，没有把我当成兄弟看待。”

——“其实你的大哥也很关心你，不过性情稍微严格得一些。”我这样安慰他。

——“那里，他是恨我监视着他，不能够自由罢了。”他依然是颇有偏见地作这样的揣测。“你想去万牲园，可惜我也没有把你引去。那儿看门的两位长人，恐怕你没有看到的机会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两个人说着些无足轻重的话，在站厂上穿来穿去地走，穿走了一会，正打算回到待车室去的时候，我的大哥和京官两人带着很着急的神气，迎头跑来。

——“啊，你们跑到啥地方去来？车快开了，赶快！”大哥喘着气说。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头路时，又责骂起他的兄弟来，“你真是不识世务！险些儿误了别人的大事。”

其实时间并没有那样地迫促，上了车后，隔了十分钟光景又才开动了起来。

临别时大哥没有说什么话，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尽从车窗口上伸出头去，看见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隐没了去。我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地发着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五　乐园外的苹果

有一位旧时代的犹太人说过：“有钱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①

我现在却可以说：“象我这样的一个无产者，要想进‘王道乐土’，是难于一个锈了的针要想穿进钢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几年前初来日本时，竟偶尔取了陆上路线，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火车上穿过了一次“王道”以前的“乐土”。

---

① 语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晚车离开了北京之后，在第二天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关。那儿的形势的确是很险要的，一边临海，一边负山，高峻的城墙在万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经略，熊廷弼、袁崇焕①诸公何以一遇着索虏来攻便要退守此关的战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当有过效用来的这个关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没中用了，无边的"乐土"正浩浩荡荡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关以后，在京奉铁路沿线上的印象却什么也没有。大约是在未成"乐土"以前的关外自周秦以来早就是受了汉化的，和关内并没有什么区分，因而便不能得到新的印象罢。只是记得沿线的地面都复着冰雪，没有看见过一条河，当时颇为诧异。靠着同伴的张次瑜告诉我，北地的河川都是冻结了的。他还指着一位赶骡车的人正横过着一处洼下的地面，对我说："那儿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从前读过的地理书上连黄河在结了冰后都可以通车。

但车一到了奉天之后，便完全换了一个世界。

到奉天时是在晚间，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国客栈的接客先生们通同拒绝了，接了一张日本客栈的招帖。乘着有轨马车到南满车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车站前租界街道的宏阔——

---

①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末将领。任辽东经略，屡抗后金（清），后被魏忠贤冤杀。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末将领。曾任辽东巡抚、兵部尚书等职。屡败后金（清），获"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因崇祯中反间计，被冤杀。

怕有北京正阳门大街的四倍——才尽量地睁开了我惊异的眼睛。

次瑜对我说："这些地方正足以表现日本人的雄心，东京的最宽的街道怕也不过这儿的五分之一罢。"

旅馆是三层楼的洋房，我们被领到的是三楼上的两间房间，是面着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式的菜，第一次才吃到日本人所喜欢吃的生鱼片，觉得也还可口，连次瑜的一份都替他吃了。——生鱼片这东西，中国留学生都不大高兴吃，其实是传到日本的中国习惯，广东潮州一带喜吃"鱼生"，就是浙江的西湖里面也有一种菜叫"醋鱼带柄"，是以鱼肉片生吃，以鱼皮骨为羹的一举两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后，次瑜叫馆里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们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飕飕的广漠的街道上走了一会，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还是出于次瑜的请求，他一引便把我们引进了一家朝鲜堂子里去。一进门去，看那堂子是呈着L字形，对面和向左侧弯转进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炕，炕下是生着火的，许多朝鲜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儿斜横着。进门的左手角上是一间应接室，邻接着和墙炕相对的是一带的小房间，那些房间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当我们一进去，炕上的姑娘们同时发出一片娇声，大举地向我们蜂拥而来。我骇了一跳便只好朝门外退。不一会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来，背后只听得一片严厉的娇噪声。大约是那些姑娘们生了气，在发骂。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上车尤其使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车票是二等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由北京出发时所坐的京奉线的二等车，和京汉线的三等是毫无差别的。车厢既旧，又污秽，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车，就象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而一车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车坐错了，坐上了头等，上了车后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车上写的字，依然是在腰间的一条蓝带上写着白色的"二等"两个字。

安奉铁路最初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所修的军用轻便铁路。战后日人采取自由行动改修，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被迫才签订了一项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由中国赎还的条约。照约当于民国十二年满期。但这些条约不用说是已经老早拉进茅坑里去了。我经过那儿时，铁路竣工后仅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设备都还是新的，和旧了的京奉铁路比较起来，觉得中国实在是颓废得不堪。铁路沿线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给日本人，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早已经不是中国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发后整整费了一天工夫到达安东，在那儿因为是"国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经过税关检验。在安东换了车，车上大都是回国去过年的日本人，带着家眷的很不少。车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两侧横列相对者不同，是一侧横列相对，另一侧仅有一条座位沿列在窗下。我们把横列相对的座位占领了两个。有一位三十来往的日本人带领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很年青的夫人，在靠近我们的对侧找到了一个单边

的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话在和同车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愤恨地附耳对我说：

——“这家伙可恶，他在骂我们，说有讨厌的支那人同车，请别的日本人照应他的老婆。”

原来那日本男子是来送行的，回国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听见次瑜的翻译却没有愤恨到他所愤恨的那样程度。因为我那天整天都没有吃饭，肚子真是饿得没法。

次瑜本是做过大官的人，在火车上的餐事是要上食堂车的，上食堂车时是一个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线时，因为我身上还带有几个中国钱，我可以胡乱地在车站上买点杂食来吃。但一转乘安奉路，车站上卖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钱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上食堂。吃了之后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记了我不懂日本话，而且也没有日本钱。我看他没有把日本钱给我的动作，又有些胆怯不敢一个人去上食堂，因此我只好推说不饿。其实饿了一天，委实是有点难于忍耐的。

那位日本人把夫人寄托了之后，等车快开时各自下车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实有点姿首。一个瓜子脸，睫毛很长，眼仁很黑，只嫌粉涂得太厚了。穿著和同车的家庭妇人们也大有不同，大约是当时日本的摩登姑娘罢。车一开后，她的存在便成为了全车日本人的目标。男的以一种难于形容的眼光看她，时时彼此耳语，女的眼光大抵出于嫉妒。那女人用的东西，样样都比较精致。她的丈夫所拜托过的那位男

子是坐在我们的邻席，满嘴的络腮胡，人很壮，有点象老熊。他对于她的态度，最令人刺目。因为他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过头来看她时便无从掩饰。他的掉头是很频繁的。他又爱借故去温存她，或者送些报纸去，或者送些苹果去。但那瓜子脸却不大理会，颇有点鄙屑他的神气。

瓜子脸的座位是在我的左侧，和我最相近，我每一侧目不免要和她打个照面。起初她的眼光还有点回避，我一掉头过去，她要把视线埋下去，让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帘。但不三两次之后，她那一对紫苑花不再掩闭了。她每爱把手箧打开，取出镜面来照，又爱拍拍粉扑。一切的举动都有点故意矜示。

夜境渐渐深了，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横了起来。有些带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箧之类的行李来砌在两个对向着的座位之间，便敷成为一个临时的寝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脸取出了一个气枕来，吹胀后也在座位上打横起来了。她的脸朝着我的一边，在脸上蒙了一张大的白绢手巾，不时地揭开来看看。

朦朦胧胧地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天已经发亮了。火车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鲜的旧京汉城。令人惊异的是汉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来朝鲜的旧制要有官职的人才能盖瓦屋，不然便尽管富裕都只得用茅屋。这不用说是后来才得到了的知识。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食堂车的仆欧拿着菜单来散，车里的日本人便都络续走进食堂车去了。瓜子脸的丈夫所拜托过

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脸同去，但她没有同他们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行李，自己去上食堂车。于是一个车厢里面便仅仅剩着我和瓜子脸两人。我看她几次很有意思要向我说话，但看我不肯先发（她当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话的），便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会之后，又才向食堂车走去，走到快出车门时特别回顾了一下，意思大约是邀我也去罢，她当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个日本钱也没有。次瑜吃了转来，他叫我去，但他依然没有把钱给我，我也就照旧推说“不饿”。他说：“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饭都不饿。”我的天，我何尝怪起来呢！日本人吃了饭的都转来了，瓜子脸转来的特别迟，转来时给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说：“你真怪。”

车中是有暖汽的，因为天晴，便感觉着有充分的暖意。在将近中午时分，我便率性把狐皮袍子脱了，仅穿着一件湖色的单绸衫。两朵紫菀花向我开得愈见鲜明了。但那有意识的花是全车中人的目标，花的意识是容易被人踪迹的，惹得把视线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来。视线的丝网在全车中织就了不整的六边形。她自己似乎也觉察到了，率性在座位上打横起去，但和晚间所睡的位置掉换了，头睡在脚的旧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样便和我隔离了。但奇异的是取了一面镜子来凭在面前的天鹅绒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对着镜子赏识自己的可爱的面庞，还是取着那样的体势，好毫无顾忌地偷看别的什么呢？想起了罗美沃与朱丽叶的故事来，但可惜，罗美沃的肚子正饿得发慌。

大约她也觉察到我是不懂日本话的（因为凡是茶房来办

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话)，又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了，早饭时的一幕又重演了。大家都进了食堂车，车中又只剩下她和我。她整饬了一下妆饰，也要进食堂去了，却从枕边取了一个苹果来，含着微笑地递给我。那苹果，我知道她是在早餐时，由食堂里拿来的。我只好接着，用英文说了一声："Thank you!"①她笑着，放快脚步地走了。这次却没有回过头来。

苹果，红得放着光辉，香得激涌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没有人，便把这自亚当以来所被人爱好着的爱的赠品送到最前线上，和我身内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饥饿作战。啊，奇怪！苹果是那样的清甜而脆爽！本来我们四川也是有苹果的，但只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时就和嚼木屑一样，毫无风味。有一种可吃的，而且是孩子们所爱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红"，但那比普通的苹果要小七八成。苹果而有花红之味的，我自有生以来才尝到第一次。真真是名实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饭转来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说不饿。但我把苹果的一件事告诉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说：

——"你们在那儿眉来眼去，我早就晓得了。但你替我们报了仇，昨晚她的丈夫临走时说了我们的坏话，今天她老婆却把你当着潘安②。"

——"我并没有潘安那样的美貌。"

——"其实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啦。"

---

① 作者原注："多谢你！"

② 潘安(247—300)，名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西晋文学家。少时多才美貌，每外出，妇女遇之，常投以果。有《潘黄门集》。

次瑜和我开起玩笑来，但我的心里却隐隐地在恨他：你既有这样的俏皮之才，为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饥饿，不肯先把几个钱给我呢？

在午后又有些日本客上车，把车位占满了。茶房来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来给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门次堆满着许多行李的座位上的一隅。原来日本的头二等车，每个车厢都有茶房的，有经验的乘客，一上车便要把三五块钱的外水给他们，他们便招呼得很周到。我不用说是没有经验的，而且又是中国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们的欺负。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脸。因为我被移徙动后的座位和化妆室相近，她一个下午便向化妆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实在是饿得没法，我很想到晚餐时破一个脸，向次瑜要钱。但谁知等到天黑却没人去用晚餐。后来才知道，到了釜山后在联络船上是有餐事的，船上的餐事照例不另取钱，故而车上没有设备。

到了釜山，天已经黑了。瓜子脸先下了车，在擦身过时她那两朵紫菀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儿的无言的寒暄，是说："我们在船上再见。"然而，惆怅！她那里知道我们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时的呢？

釜山的中国领事柯荣阶是我们四川人，也是大哥和次瑜的东文同学。我们是要落在他那儿过年的。那晚刚好是新历的除夕。

苹果的滋味虽然还是很鲜，但"乐园"是已经失掉了。

〔本卷注释者：谭洛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一卷　沫若自传　第一卷　少年时代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３６１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８／ｄｉｓｋｅａｈ／ｅａｈ８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第十一卷目录

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

序
我的童年
反正前后
黑猫
初出夔门